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69）

熊丸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三井

紀錄：李郁青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弁 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籌備時期，即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為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為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為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紀錄或語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尚祈讀者賜函指正。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 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

目 錄

弁言

第一章 家世背景與早期教育	3
壹、家世與背景	3
貳、川地二三事	5
參、小學教育	9
肆、三三一慘案	10
伍、初中教育	11
陸、四年高中生活	16
柒、一段奇緣	22
捌、中學時代京滬文化概況	23
玖、中學時代校園政黨活動	26
第二章 大學時期與醫院實習	29
壹、入同濟大學醫學院	29
貳、由同濟到華西	32

參、重返同濟完成學業	36
肆、蜀道難於上青天	40
伍、戰時蜀地軍閥割據	42
陸、在重慶武漢療養院實習	44
柒、回同濟任助教	45
第三章 入委員長官邸	47
壹、進入官邸始末	47
貳、侍從室編制解說	49
參、第二處風雲榜	55
肆、委員長夫婦家居生活	59
伍、抗戰勝利	63
第四章 蔣公下野與政府遷臺	67
壹、蔣公下野	67
貳、溪口歲月	69
參、輾轉撤退	72
肆、剿共失利因素研判	74
伍、政府遷台	77
陸、來台工作情形	78
第五章 漫談蔣公與蔣夫人	85
壹、漫談蔣公	85
貳、漫談蔣夫人	97

參、蔣公伉儷感情生活	112
第六章 蔣公的醫療與健康	115
壹、蔣公的醫療系統	115
貳、陽明山車禍	117
參、蔣公去世	121
第七章 漫談經國先生	129
壹、經國先生其人	129
貳、經國先生的健康	143
參、經國先生與蔣夫人	144
肆、經國先生與章亞若	145
第八章 漫談孔二小姐與圓山	147
壹、孔二小姐其人	147
貳、孔二小姐與蔣夫人	151
參、孔二小姐與我	157
肆、孔二小姐與圓山	159
第九章 我的家庭與幾點感想	163
壹、我的家庭	163
貳、半生官邸心得	166
參、幾點感想	168
第十章 漫談幾位人物	171

附錄一：熊丸先生履歷	183
附錄二：財團法人台灣省敦睦聯誼會捐助 暨組織章程修正總說明	185
附錄三：財團法人台灣省敦睦聯誼會捐助及組織章程	199
索引	205

訪問時間：民國八十五年五月至八十五年九月

訪問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董事長室

訪問次數：十五次

訪 問：陳三井

紀 錄：李郁青

第一章 家世背景與早期教育

壹、家世與背景

我幼時生長於四川省石碭縣西界砣。這地方乃當地山上經水路而下的必經之地，故聚集了一些人。西界砣位於川東忠縣與石寶寨間，即在萬縣上游，離重慶滿遠。實際上，我們祖先原籍江西省南昌府鄆城縣，爾後才移居四川，迄今百年有餘。當地本無人居住，今之居民都是由外縣市搬進去的；且四川那地方很奇怪，其地域很大卻語言相通，少有方言；不像浙江雖小，^①卻有很多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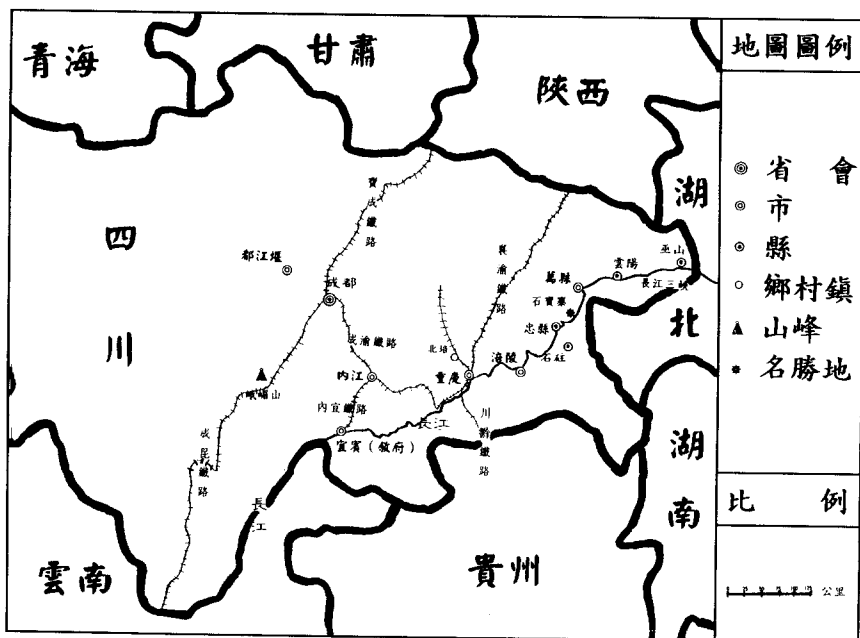
我的祖父早逝，祖母一直寡居，獨立撫養獨子（即家父熊福田）長大成人。當時到國外留學的人很少，祖母便把父親送到日本明治大學修讀法律，與張群（岳軍）同屬一個時期。家父在日本與張岳公很熟，回國後在四川歷任法官、庭長及審判長等職務，後來才到省議會當祕書長，以後到雲陽縣擔任縣長。

我的祖母姓秦，乃明朝女將秦良玉的後代。在我的家鄉，若要問人家裡有幾位女孩，通常都不說：「你家有幾位小姐？」而是：「你家有幾位女將？」小時候我們不懂為何要稱女孩為女將，後來才知道原來祖母是秦家世家出身，家裡還有秦家留傳下來的戰袍。

^① 四川約有七個浙江大。

秦家還有個特點：女孩們時興讀書。那時四川女孩都不讀書，我母親也沒讀過書，但祖母小時候卻讀過書。祖母不僅會讀書，還曾請先生到府裡教彈琴與作詩。她也看過《隨園詩話》，小時候常講故事給我們聽，並教我們讀詩，我對這些事印象十分深刻。也正因為祖母的出身背景，所以她才有送家父到日本留學的眼光。

我在西界砣長大之後，便因家父在成都擔任庭長，而舉家遷至成都。^② 西界砣與成都相距極遠，我記得當時到成都，得先坐船到重慶，再由重慶坐十天滑竿^③才到得了成都。



四川省地理位置簡圖

② 又稱「錦城」、「蓉城」，因城裡芙蓉花很多。

③ 一種簡式轎子，以兩根竹子中間抬一個人。

我家共有八個孩子，在我之上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下有四個妹妹。大姐熊盛鴻目前還在大陸，已九十餘歲，師範學校畢業，曾當過校長。她本來還是個地主，後被共產黨清算，沒了地產。二姐熊化蓮則已過世，她乃之江大學文學系畢業，後因二姐夫在倫敦工作，故一直住在倫敦。四個妹妹中，有兩個尚在大陸，另兩個則分別在香港與美國。父親還曾另娶姨娘，是個滿清旗人，生了六個孩子，男女各半。後來姨娘與父親一起留在四川，我則把母親帶到台灣，以後父親過世，我們與他們也沒聯絡了。

貳、川地二三事

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廿日，因日軍持續西進，國民政府發表宣言移駐重慶，大批人民隨之移居後方四川。當年四川省內也如同今之台灣，有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省籍情結存在。當時四川人稱山下的人為「腳底下人」，因四川乃山省，很多人都住在山高頭，相對應地便稱呼住在山下的人為「腳底下人」，取「山下住的人」之意；四川人又稱外省人為「下江人」，意思是「長江下游來的人」。這兩名稱均無傷人之意，但在外省人聽來，便覺極為刺耳，省籍玩笑也因此產生。

四川人與外省人也因語言上的隔閡，而產生諸多誤會。例如江蘇、浙江等地稱呼老年人為「老太婆」，此乃正稱；但在四川稱「老太婆」，可就是句侮辱人的話，老年人的正稱應是「老太太」。因此外省人來到四川，稱呼老年人為「老太婆」，在四川人聽來便覺刺耳。

抗戰時外省人西撤至四川，向四川人租房子，四川人把在平地的房子租給外省人後，便因害怕空襲而跑到山上住。我家當時還算有錢，在汪山有棟別墅，所以全家都住到山上，把重慶的房子租給外省人。

當時政府規定的統一租金價格十分便宜，且不許漲價，但外省人給的租金非但總是不夠，而且還把房子轉租當二房東，收的租金還比我們高。此外，外省房客竟把自己平常花錢的帳目，全記在我家牆壁上，把整片白牆都塗黑，門檻也弄壞了，一點都不保養房子，所以當時租房子給外省人的四川人，對下江人便無好感。綜合諸多語言及生活上的誤會，便造成四川省內的省籍衝突。

我還記得當時流傳一個笑話：有天有個人到館子吃飯，剛好那兒有個四川人及一個下江人，下江人看四川人不慣，便叫堂倌替他買包四川牌香菸，堂倌一聽便回答：「先生，我們這兒香菸有很多牌子，但就是沒有四川這個牌。」那下江人便說：「有呀，金鼠牌香菸就是啦！」因為四川多鼠，所以他挖苦四川人是老鼠。那位四川人在旁聽了，覺得很不舒服，便也叫堂倌道：「堂倌你來，替我買包下江牌香菸。」堂倌一聽便也回答：「先生，我們什麼牌的香菸都有，就是沒有下江牌。」四川人便說：「怎麼沒有？強盜牌就是啦！」那時市面上有一種強盜牌香菸，四川人以此暗諷下江人爲強盜。這件事成了當地的一個笑話，但在省籍間卻產生諸多隔閡，發生許多衝突。

然而儘管如此，當時四川人與外地人通婚情形還是很多，不過那時四川人仍會盡量阻止自己的女兒嫁給外省人，因為害怕一旦勝利後，外省人會把自己的女兒一起帶回鄉，是種捨不得女兒遠嫁的心態，倒不反對兒子娶外省媳婦。抗戰時有所謂「抗戰夫人」或「重慶夫人」出現，便是因當時有很多男人原在家鄉早已成婚，但戰時未將太太帶出來，故到了四川便又再婚，等到抗戰勝利後男子回鄉，那些在四川與他們結婚的女子，便成了所謂的「抗戰夫人」或「重慶夫人」。不過據我所知，這種情形並不是很多，只是偶而有之。

抗戰使得四川與中央間的關係更爲密切。當時政府的兵源乃就地

取材，所以軍人大部分是四川人。當時張岳公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成都行轅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與四川省保安司令，一直跟著蔣委員長。他是真正的四川人，講得一口道地四川話，其人非但沒有省籍成見，且為人十分公正，故大家對他都不排斥；反而是戴季陶（傳賢）先生，一下子說自己是四川人，一下子又說不是，但實際上他確實是四川人。^④

戰時四川處於軍閥割據時代，根本不聽中央的命令，也因此，四川有句俗話說：「天下已治蜀未治，天下未亂蜀先亂。」當時四川乃由劉文輝（自乾）佔據成都，且擁有自己的造幣廠，可自造銀元、自己發行；重慶則由劉湘（甫澄，劉文輝之侄）佔據，他在那兒有個兵工廠；楊森（子惠）則佔據廣安（即鄧小平故鄉，在川北）；另外還有好幾個小軍閥。四川那時還流傳有「兩個半人才」之說，其中一個人才是劉航琛，另一個是盧作孚，最後半個則是何北衡（曾任四川省建設廳長），這三人在當時是非常出名的人物。

四川由於物產豐足，所以當時有很多有錢人。其中有個抗戰時期的故事，我本人並未親眼看到，卻時常聽聞。故事內容是這樣的：潘文華（仲三）乃劉湘旗下一名師長，也割據了一塊地方，所以非常有錢。此人之弟潘昌猷（文義）也十分有錢，他在重慶開設一家重慶銀行，這家重慶銀行在當時等於現今台灣的第一銀行，規模也很大。當時因戰時撤退，上海有許多人都搬到重慶，杜月笙先生那時也在四川。有一天，潘昌猷請杜月笙吃飯，用很好的菜招待他，旁有陪客數人。潘昌猷極好賭，他因聽說杜月笙在上海很善賭，卻又自認自己在四川也是一把手，所以吃完飯後當大家興緻高漲時，潘便邀大家來賭一賭。

④ 戴季陶原籍浙江吳興，但生於四川廣漢。

杜月笙聽了便笑說：「好，你有興致我便奉陪。」於是幾個人就開始賭了起來。

他們玩的是梭哈，剛玩的時候因賭得很小，所以每個人都來。後來愈賭愈大時，旁人均紛紛退出，只剩下杜月笙與潘昌猷兩人。不料賭到最後潘昌猷輸了一點錢，於是他便愈賭愈大、愈叫愈大，叫到後面仍不服氣，便對杜月笙說：「這回我賭整個重慶銀行，你得拿相當於重慶銀行的錢來賭。」杜月笙這個人也很有錢，他便問道：「你的重慶銀行估計值多少？」潘昌猷把錢估算了一下後，杜月笙便開了一張與潘昌猷說的價錢等值的支票，兩人便開始賭了起來。發了三張牌後，由於潘昌猷作莊，他向杜月笙說：「你敢不敢讓我看？」杜月笙笑笑說：「讓我考慮考慮。」於是杜看了看自己的牌說：「好吧，你要看可以，不過看了就是重慶銀行的數字喔！」潘昌猷說：「你不要嚇唬我！別以為我會害怕而不敢！就這個數字，看牌吧！」杜月笙說：「看牌？好呀！莊家先來。」於是潘昌猷把牌一攤，是三個K，這已經是很大的牌了，所以他認為杜月笙一定輸，不料杜月笙也把牌一攤，竟是三個A。當時潘昌猷的臉都白了，但因事前早已言明，所以潘昌猷也無話可說，便把重慶銀行的支票往杜月笙手上一送，杜月笙接過支票便笑著說：「謝謝！謝謝！」又說：「好吧，今天大家就到此為止。再來聊聊吧！」此時潘昌猷已經輸得沒心情聊天，便拿著香菸猛抽。杜月笙本來不抽菸，但看到潘昌猷猛抽菸，於是也拿了一根菸說：「來，我也陪你抽。」有了香菸但是沒有火，潘昌猷因是主人，便馬上拿打火機來為杜月笙點菸，不料杜月笙竟把那張重慶銀行的支票，往點著火的打火機上一放，整張支票便燒掉了。潘昌猷一看道：「你怎麼把支票燒了？」杜月笙只笑著說：「好了，今天就到此為止吧！」這件事傳遍了整個重慶，大家都說杜月笙的確見過世面，做得漂亮，也交到很多朋友。杜月笙

後來在重慶北碚修了一幢別墅，以後孔祥熙先生就住在那棟別墅裡。

參、小學教育

我在成都唸的是西城小學，西城小學後來改成市立第一小學，又稱市一校。長大後我亦曾在成都唸過幾年華西大學，那時由於抗戰，很多大學都搬到後方四川，所以單是成都便擁有好幾所大學，包括齊魯大學、金男大、金女大、中大、華西大學，以及川大等。當時有兩句聯很有意思，上聯是：「金男大金女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齊大非耦」；下聯則是：「市一校市二校，一校在南二校在北，兩小無猜」，一語道出當時成都學校的景況，十分有趣。

說起對聯，我還記得在成都時，父親為討祖母歡心，在祖母五十八歲生日時，提前為祖母過六十大壽。現代人活到六十歲並不算什麼，但在當時六十歲已是大壽。那時候，祝壽場合中通常都會有人送對子，而且是自己作詩自己寫，我還記得祖母過壽那天，整個客廳掛滿了對子，廳正中央掛了一個大「壽」字，是用針線手工織成，那次的祝壽場面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成都讀完初小^⑤後，我家又由成都搬到重慶。父親到重慶後改執律師業，他的生意很好，所以後來他又自己開了一家法律事務所，而且只接大案，小案子還不接，因此別人都說：「熊律師不是律師，而是『推事』（看到事情便往外推）。」父親那時的業務真的非常好，我們每天都跟著父親在外頭轉，所以也曉得訴訟狀子怎麼寫，受其薰陶很深。父親很會寫字，很多人都請他寫對聯，每次他寫對聯時，我們都

⑤ 當時的教育制度，小學六年共分兩階段：初小四年，高小二年。

要替他磨墨、牽對紙，然後站在一旁看他懸筆寫字。寫錯字時，他都
用舌頭舔掉改寫，否則不用舌頭舔，紙上的字是弄不掉的。那種紙是
一種特別的光紙，如今在故宮還看得到。

肆、三三一慘案

高小時，我在重慶唸模範小學，那時發生了一件「三三一慘案」。我那時實在不曉得慘案是怎麼發生的，只記得民國十六年三月卅一日當天早上，父親忽然告訴我說：「你今天不准上學。」我說：「今天不能不去，因為全校要到較場壩集合，有很多學校的學生今天要在這裡聽演講。」但父親卻說：「不管是什麼地方，你都不准去。」那時我心裡實在納悶，所以央道：「不去不行啊！學校會記過！」父親竟說：「記過也不准去。」原來父親已事先知道將出事的消息，而我當時因不敢不聽大人的話，所以便沒去。那一天較場壩果然出了事，許多小學生到那裡以後，主席演講才數分鐘，便從講台後面跳出一個人，一棒子把主席打了下來。之後便有許多士兵由四周進來，拿起棒子便一陣亂打，打得學生們四處亂跑，場面十分混亂。短短時間內便死了七、八個學生，我們學校也死了一個，我後來還看到屍體。所幸那天沒有人開槍，都用棒子打，否則傷亡將更慘重。

這件事後來被稱為「三三一慘案」，事件主謀王陵基（方舟）當時乃是由劉湘部所改編之國民革命軍第廿一軍第三師師長，並兼重慶衛戍司令。王方舟因曉得較場壩的那場集會乃共產黨反政府集會，卻無法叫學生們不要參加，故派兵來打散那場集會。事前王方舟曾下令士兵不許帶槍，只能帶棒子，把學生們趕走就好，不料在這一趕一打之下竟鬧出人命。事件過後第二天，重慶各報上均刊登此一慘案相關新

聞。若干年後，我在廬山總統官邸擔任醫官時曾遇見王方舟，當時他已是四川省主席，我問他：「『三三一慘案』時你為什麼要打學生？」他答道：「唉！是那些兵不聽話，我曾再三交代他們只能驅趕不能打，且不准帶槍，但那些兵說趕不走學生，只好用打的，然而下手又太重，導致有些學生被打死，有些則是跌死的。」我說：「那為什麼要打散那場集會呢？」王方舟說：「因為那是共產黨的一場集會演講，我奉劉甫澄之命去驅散他們。」

伍、初中教育

父親在重慶的律師處業務蒸蒸日上，我們這些孩子也開始一個個在重慶讀起中學。我讀的是巴縣中學，中學時代完全不懂得唸書，一天到晚只喜歡打籃球。那時我的個子不高，卻偏偏喜歡打籃球，而且興趣濃得很。然而當時我們那兒的籃球場很少，整個重慶約只有五個籃球場，所以每當我一聽說有人在比賽籃球時，便趕快去看，等別人比完後，自己再下場投球。我平常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抱著一顆籃球到處找球場，這也是我當時最大的樂趣，有時上課還偷溜出去打球，書根本讀得馬馬虎虎。

不料在我初中畢業那年，教育局突然下了一道通知：「今年開始，重慶市的初中都要舉行會考，不及格者不得畢業。」於是我們成了第一屆要以會考決定能否畢業的中學生，對此大家都十分緊張。我原先便沒好好讀書，臨時更不知從何讀起？但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故多少準備一下便去參加會考。

我記得那次考得真是一蹋糊塗，什麼題目都做不出來，於是便亂做一通。考後一個禮拜便放榜，榜單發放在重慶孔廟長長的紅牆上，

市內各校應屆畢業生的名字全在上頭，由第一名開始排名起，一直排至最後一名不及格者，因此榜單上及格者全在一邊，不及格者全在另一邊。放榜那天我心裡是七上八下，覺得自己很難考得及格，一去到孔廟便不敢從前面及格者開始看起，所以由後面不及格者開始看。看完不及格的全部名單後，竟然發現沒有我的名字，當時心裡好高興，於是跑到前面從第一名開始看起，不料看了半天仍然沒有我的名字，最後好不容易終於找到，因為我考了及格者的倒數第七名。當年考取第一、二名的同學，都是贛江中學的學生，我還記得第一名的學生姓童，第二名姓熊，看到別人成績那麼好，使我心中產生一種十分羨慕的心理。

通過畢業會考後，我心裡非常高興。那時四川有個風氣：只要家裡有點錢，或還算過得去的人家，都會把孩子往南京、上海或北京等地送，而不留在四川。我家當時算是中等以上家庭，父親原本就答應我，如果我通過會考，便送我去上海，考不過就乖乖再回學校讀書。於是初中順利畢業後，父親便打算送我到上海就讀高中。當時我自己一人不敢去上海，家兄熊鼎盛當時已在北京讀師大，父親便要他回家帶我出去。然而我畢業後的前半年，因哥哥尚未返家，當時重慶有所新辦的益州高中，不用怎麼考便可入學，我便先去那兒讀書。

進了益州高中後，我的讀書心態產生極大轉變，因我甫入學時便認識一位王心滌同學，我和他非但同班且同寢室，而他和會考第二名的熊同學則是好友。王心滌對我很好，每天半夜都把我從床上叫起來讀書，他說：「男兒讀書，要在夜半雞鳴未叫時起床，書才讀得好。」所以從那時起，我便開始讀《古文觀止》，一篇篇地讀，而且還得背。

王心滌常在晚間十點熄燈後，自己拿著書到廁所讀，因為廁所的燈是不熄的。此外，他不但晚上叫我起床讀書，早上還打拳練身體，

我便跟著他讀書打拳。而贛江中學那位熊同學經常來看王心滌，我因很佩服他居然能考第二名，知道他《古文觀止》背得多，數學也很好，故由那時起，我便開始發憤讀書，並曉得要上進。

跟著王心滌讀書三個多月後，家兄已由北京回來，於是我便離開益州高中，跟著家兄一路由上海到南京，因當時家兄已由北京師大轉學到南京中央大學，在中大讀地政系。^⑥但我在南京沒地方住，於是便和家兄一起住在中央大學第一宿舍。那宿舍很妙，一個大房間可住八個人，先來的先找位置，找定後便弄個帳子再弄張床，圍成一個範圍後住在裡面，其他人不得進來。我和家兄就住在他的範圍裡，同睡一張床。那房間也很有趣，八個範圍中，有些地方經常整理得乾乾淨淨，桌面整齊，東西放得好，衣服也弄得十分整潔，還在旁邊掛了對子。尤其工學院的學生特別愛乾淨，文、法學院的學生（如家兄）便把範圍弄得亂七八糟，早上起床鋪蓋也不摺，桌上的書也亂丟一通。

我在那兒雖只是借住，但有的同學對我還滿好。當時南京一帶有很多好高中，其中最好的是揚州中學，其次則為蘇州中學和南洋中學。當時我很想考進一所好高中，於是一天到晚都在讀書，把投考指南中的考題翻來翻去均做遍。不料一陣子後，中大的宿舍管理突然嚴格起來，規定外人不能住校，我便搬到中大前方的石婆婆巷。當時我年方十四，一個人在那兒租房子，實在很可憐。我住的屋子外頭是一片田野，周圍平房都沒人住，只有隔壁屋子住著一位生病的小姐，她一天到晚呻吟喊叫，我剛住時晚上真是怕得要命，後來慢慢聽慣了，也就

⑥ 哥哥唸完中大後，又在南京讀政大地政系第一期，他曾擔任湖北省地政局局長，一直跟著地政界的老前輩蕭錚（青萍）。蕭錚對家兄很好，一直提拔他，所以家兄後亦曾任台北市地政處長，及中興大學主任秘書。

無所謂了。讀書之外，白天我偶爾會跑到街上買油雞和香蕉充飢，晚上再用鋪蓋蒙著頭睡覺，因為心裡還是很怕周圍會有「鬼」。

尚未進高中時，有一次因南京城外有好幾艘日本軍艦，其砲口都向著南京，情勢十分緊張，我和二姐、大哥為安全起見，便一起回四川。記得當時我和姐姐、家兄，及家兄工學院的同學羅成中，一起在下關租了旅館置放行李，預備第二天便坐輪船離開。然而就在那天晚上，日本軍艦突然開砲轟擊南京，雖然後來發現都是空砲，但我們仍在下關看到火光，也聽到砲聲。由於沒人知道那是空砲，下關居民都開始逃，整條街上都很亂。我記得那天我們幾個人手牽著手在下關逃，由這個巷子逃進去，再由那個巷子逃出來，最後仍在同一個地方。那天晚上，大夥兒就這樣糊里糊塗地逃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才由南京搭小船到浦口，之後搭大輪船經漢口回到四川。

我記得在回家途中，已經到四川境內過了萬縣時，突然船又調頭回去停在萬縣。大家都覺得奇怪，便問船長為什麼要在萬縣停船？船長說：「南山那邊有旗號，要我們的船靠岸，也不知是什麼原因？」船靠岸後，上來幾位雲陽縣政府的人，原來父親刻在雲陽縣任縣長，他由雲陽通知萬縣，要萬縣攔下我們這艘船，叫我們到雲陽與他會合。雲陽縣在萬縣以下、巴山以上，在四川屬於中等的縣，不能算大縣。縣內有座很大的張爺（張飛）廟，許多文人都在廟裡題字，是個文風鼎盛的名勝之地，我們在那兒住了一個多禮拜。回到重慶後，因上海與南京並未出什麼特別的事，所以我和哥哥便打道回南京。

我在南京住約半年，一天到晚都在讀書。有一天，哥哥突然看到上海同濟大學附設高中也在招生，便對我說：「只考南京的學校恐怕太少，上海學校多一點，我們再到上海考，只要抽得出時間的都去考。」當時同濟算是非常難考的學校，所以當我想報名同濟時，哥哥說：「算

了，不要考同濟，一定考不取又何必花那個冤枉錢？」當時羅成中也陪著我們一起去，他在一旁對大哥說：「唉，你讓他去試試看嘛！」於是我便到同濟報了名，也去考了試。

加上同濟，我一共報考三、四間學校，但同濟最早放榜。放榜前幾天，因為沒事可做，家兄提議到上海逛逛，於是我們便到上海大世界去。大世界那兒有個輪盤賭，把錢丟進一轉，有時一塊錢就變成好幾塊錢出來。大哥看了有點興趣，便說：「我們去丟丟看！」於是我們把錢丟進去玩，剛開始還贏了兩、三塊錢，以後便全輸光，待回到旅館時，竟連飯錢都沒了。於是大哥要我和羅成中住在旅館裡，他則到南京去找二姐，當時二姐就讀南京女中，她那兒有錢。

哥哥走後的第二天早飯時，我們肚子當然餓了，可是沒錢買東西吃，羅成中便問：「你身上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典當？」我說：「我只有一支派克筆(Parker)，是我臨出門時父親送我做紀念，並要我好好保存的。」派克筆乃當時最好的筆，所以羅說：「那支筆可以拿去當啊！」我說：「這怎麼可以，這是父親給我的東西耶！」羅說：「當了還可以再取回來嘛！怕什麼！不然我們沒東西吃怎麼辦？」於是我們便拿著那支筆到當舖去。我還記得那當舖的櫃臺很高，我完全看不見裡面的情形，櫃臺上的人看過我的筆後，竟說：「五塊錢。」我心想：「五塊錢就五塊錢嘛！」於是當了五塊錢回來，兩人買了好幾塊麵包充飢。

吃了兩餐麵包後，家兄終於由南京回來，也帶回一些錢，他把他由旅館贖出，並把我當的那支派克筆贖回。事情全解決後，哥哥說：「好啦，回南京啦！」我說：「不能回南京，明天同濟要放榜！」哥哥說：「唉呀，考不取的啦！算了，不要看榜了，我們回南京去，南京有個青年中學，校長和我同學的爸爸很熟，只要說一說應該就可以進去。你乾脆就去唸青年中學好了，你在四川也沒好好讀書，同濟一定考不取。

走吧！」羅成中聽完哥哥的話後，便替我幫腔道：「既然要走，不如我們先到同濟招生處問一聲，他們明天放榜，也許今天就會有些消息。」我聽了立刻說：「好好好，我們就去問問。」於是我們便到同濟招生處，將我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問道：「我知道你們明天才放榜，但能不能請你幫我看看榜上有沒有這個名字？」那個人一看到我的名字便說：「這名字很怪，好像有哦！」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於是我便對哥哥說：「不走了，我們再等一等吧！」第二天我們再度去看榜，果然讓我考取了。

父親知道我考取同濟後，便給了我四百銀元以資獎勵。當時四百銀元是很多的錢，可是大哥說：「你哪裡用得了那麼多？」於是便拿走兩百銀元。爾後姐姐也說：「你用不了那麼多。」於是又拿走一百銀元。最後我只剩下一百銀元，但這一百銀元對我來說也很足夠了。

陸、四年高中生活

過去由於德國想和中國做生意，很多機器打算外銷到中國，故很希望中國人能懂德文，才能使用他們的機器。因此，德國人主動花錢在上海興辦中德文化協會，再由此協會成立一所中德文化學校。爾後因學校辦得不錯，教育部將其收編改為國立大學，此即同濟大學之由來。此後同濟大學也成了中德文化交流之集中地，許多德國人到學校教了幾年書後再回德國，而中國學生也可直接到柏林大學進修。

因同濟乃德國學校，故學校裡只讀德文，不讀英文，且每屆只有四班，每班錄取三、四十名學生。我記得高中時，德國老師們每隔兩、三個禮拜便帶我們出去野餐一次，一路上用德文講授一些生活知識，德文訓練十分嚴格。同濟校區位於上海吳淞，師資良好，且學生淘汰率很高。我們每天上午要學四小時德文，一年兩學期中，每學期都有

考試，考兩次不及格便留級，留級兩次則開除。所以在我們畢業時，原本四班的學生只剩兩班，其他學生均遭淘汰。

我在同濟頭一學期的學業成績不怎麼好，運動成績倒很不錯，因為我本來就有點運動基礎。後來我想到王心滌的話，便覺得在學校應努力讀書。同濟有位數學老師唐堅，是我們班的導師。我從四川出來的時候，父親曾訓示曰：「你們對師長要很尊敬，看到師長要行禮表示敬佩。」所以有一天當我在教室門口遇到唐堅先生，不自自主地便向他一鞠躬。記得那天唐堅只看了我一眼就走了，不料幾天後下課時，他無意中在班上講了一句：「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很不錯，像 Herr（即英文 Mr.）熊就很不錯。」其實我的成績老考在中間，根本無任何不錯的地方。當時我心中蹦蹦地跳，心想：「這下糟糕，我以後要考不好，怎麼對得起他？」此後我便開始拚命讀書，王心滌所言：「半夜三點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也成了我當時的座右銘。

同濟的制度很好，每週均要考試，考後發卷均由第一名開始發起，但只發到第三名為止，其他同學則自行將考卷取回。那時我的成績已有進步，經常第三個拿到考卷（即考第三名），覺得是種榮譽。以後又慢慢由第三名到第二名，再由第二名到第一名，之後便一直保持第一名。高二以後我的成績便一直很好，當時陶百川擔任上海國民黨黨部主任委員，他特別為上海市高中優秀學生舉辦一場聯誼會，而代表同濟出席的學生便是我和徐君憲，使我覺得十分榮耀。同時，我每年都參加學校的足球代表隊，也在乒乓球隊擔任隊長。由於乒乓球賽我打到分組冠軍，所以當時學校對我的評語是「成績優異，體育又好」，此後我更是拚命讀書。

高中時代我的榮譽感很高，晚上代表學校出去打球，上海的各種學術會議也都參加。那時學校還出了一本德文月刊，我是編輯之一，

常寫一些德文文章，請老師看看便登上去。由於大家平常使用的都是德文，所以英文幾乎忘光了。學校當時還辦了一份名叫《芥舟》的刊物，因我擔任學術股長，故亦負責辦《芥舟》。我自高二正式接手此份刊物，後來有好多成員不再管事，只剩我一人由邀稿、校對、複校、發行，甚至拉廣告，樣樣自己來。記得當時我去找教務主任請求津貼補助，教務主任說：「唉！你這份刊物辦得這麼辛苦，還繼續辦做什麼？」我說：「我已經辦了四期了，不能不繼續下去，等我畢業後還得移交下去！」教務主任沒辦法，便津貼我五十塊銀元。《芥舟》我共接辦兩年四期，內容包含科學、文學、詩與短文，有時自己也寫。

自小父親便要我學醫，當我考上同濟後，因同濟醫科最好，父親更是堅定要我學醫的信念。但我對中文很有興趣，看的小說也多，對冰心、魯迅等人十分崇拜，常自己一人躲在圖書館看書。高二以後，我曾悄悄地寫了一篇文章名「峽門」，投稿到《申報》。當時《申報》有三種副刊，其中《現代文學》屬學術性刊物；《春秋》則專出精緻小品文；另一份就是我投稿的副刊，內容較雜。當初學校裡的國文老師曹聚仁乃相當知名的文學家，他常鼓勵我，說我的文字不錯，要我好好寫幾篇稿投到報上試試。投稿之後，我便天天看《申報》，但看了幾天發現根本沒登出來，所以也不敢告訴曹老師此事。三個禮拜後的某天，有位同學突然很興奮地跑來告訴我：「喂，你的文章在報上登出來了！」我根本已忘了這回事，便問：「我有什麼文章會在報上登出？」他說：「你看，我都給你帶來了。」我一看，才知「峽門」已獲刊登，心裡無比高興，同學們也十分羨慕。

爾後我獲得稿費廿塊銀元，是筆不小的數目。當時我們和一些家境刻苦的同學都一起省錢，平常足不出戶。加之學校伙食費每月只要

八塊銀元，^⑦廿塊銀元便可以吃好幾個月。且那時學校對考前三名的同學有免學費的獎助，還有廿塊錢的獎勵，如果再加上一些稿費，生活已是天上人間，過得非常舒適。所以那時我幾乎不必向家裡拿錢，而能學習自己獨立，有種苦學的精神。

「峽門」之後，我陸陸續續又投了好幾篇稿，篇篇都上榜。我還記得有篇投到《春秋》的文章名「北川之墓」，內容講述我們由吳淞學校回來的路上，往往會看到一個寫著「北川之墓」的日本人棺材。「北川」是日本人的名字，我們問當地人「北川之墓」的典故，他們答稱：「傳說那是個很殘暴的日本人，死後人家把他埋在這裡，因為大家都恨他，所以把他的名字寫在這兒，人人經過都會罵他兩句。」

以後我對寫作興趣更濃，自己也很得意，便寄了其中一些回去給父親看，希望得到他的獎賞。不料收到父親回信，卻在信中被他大罵一頓。他說：「叫你學醫，你不好好讀書！搞什麼文學？寫什麼文章？快給我把生物和物理好好讀，不要再浪費時間！」這封信對我而言，真如一盆冷水澆上心頭，不過自己想想也對，為著將來讀大學計，也應該多加努力才是。於是從那時起，我便停止寫作，用心讀起科學範疇的書籍。但我對文學仍有很濃的興趣，常利用暑假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書。

高中時代同學彼此間競爭得很厲害，因為當時學校為鼓勵學生，故提出「前三名免學費」的方案。當時我們的學費是十塊銀元，足夠一、兩個月的伙食，考第一名者除了不用十塊錢學費，另外還有廿塊錢獎學金，夠三、四個月伙食，因此大家均十分競爭。此外，學校的

^⑦ 學校會給飯票，早上用的是麵票，中午和晚上則各用一張飯票。但我們那時因要省錢，故常早上用一張麵票，中午的飯錢就省下，晚上再用一張飯票。

社團活動（如學術演講）均會招待前幾名同學參加，因此大家都希望成績能好一點，以免費參與各項活動。加之德國人對成績好的學生態度也不同，所以大家彼此間便形成一股讀書風氣。當時同濟離上海市區很近，附近復旦大學的學生，週末都會到上海過夜生活（如吃西餐、跳舞等）。但同濟學生卻一直保有一種節儉作風，不管是不是工學院學生，大家都一襲工衣，從不穿西裝到上海，省下來的時間便是讀書。

上海十分提倡體育，常有很多校際比賽，同學們也都在體育方面儘量發展。當時上海籃球最好的是暨南大學，足球最好的是滬江大學，同濟只拿了一屆乒乓球冠軍，其他運動都不及別校好。然而學校仍會儘量找優秀學生組成代表隊，若能成為代表隊一員，學校便免費供給運動服，且比賽時有專車接送，另有諸多招待，十分榮耀。我當時在籃球與足球方面都是學校代表隊，乒乓球則是代表隊隊長，所以在運動方面十分突出。白天穿起那身運動服，同學們都對你另眼相看，特別有種榮譽感。直到高中畢業，我都是很突出的學生，生活十分愉快。

我記得吳淞那地方週末並沒什麼地方可玩，只有可供散步、游泳的地方。我們騎腳踏車到寶山縣約需一個多鐘頭，每天中午三兩好友便騎著車子去寶山玩。其實寶山根本沒什麼好玩，那是個只有兩條街的小縣，且街道房舍的高度只要用手一撐便可摸到，巷道寬度也只有兩手展開一般寬。我們喜歡去那兒其實另有原因，因為那兒有個賣湯圓的，所賣的湯圓並不好吃，只不過賣者是個廿來歲的女孩，她長得雖然很醜，但大家也不管她到底美不美，故意形容她長得很美，還叫她「湯圓西施」。我們每天只管去寶山吃湯圓，大夥兒都拿她當目標。因為湯圓也便宜，所以每天去吃一碗回來，大家哈哈一笑，也成為一種樂趣。

吳淞位於海灘旁邊，海灘附近有個吳淞氣象台，只要一有颱風來，

氣象台就會掛上三個黑球以示警告。我們夏天常在那兒游泳，有位許同學還在那兒溺斃了。因為那兒的海浪打進來，退潮力道很強，在退潮時刻去那兒游泳，只要海浪一打上來，就會把人捲到很遠的地方而游不回來，因為在游回來的途中，第二個浪又會把人打回去，十分危險。後來我們知道只能在漲潮時去那兒游泳，退潮時千萬不能去，而學校也發現我們去那兒游泳很危險，便在學校裡建了一座游泳池，除了這座校屬泳池外，學校後面還有條河叫蘊藻濱，許多人也常去那兒游泳。

當時我們班上有位標槍好手並不會游泳，但他在蘊藻濱旁看我們游，心裡好生羨慕，又見河對岸離跳水臺很近，心想只要跳下水後用兩手一抓，就可以過到河對岸去。不料他一下水後就沒再上來，大家到處找他都找不到，後來還是學校附近一位擅長潛水的農夫找到了他的屍體，原來他仍在下水的原地，一下水後便昏迷，一步也沒有游出去。我還記得高中畢業時，我曾在週記上寫了篇文章悼念他，他真是個擲標槍的好手。

還有件很有趣的故事：當時上海另有一所德僑學校，也是德國人辦的。因為同濟也是德文學校，和他們往來很多。一回，那所德僑學校邀請我們到他們學校進行運動比賽，我校派出最精銳的運動隊伍前去參加。然而在標槍項目中，大家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當時雙方都派出精銳代表投擲標槍，標槍擲出都飛得很遠才落地，然而對方派了一名德國學生守在遠處，專門替我們把擲過去的標槍再擲回來，以利下一位選手使用。奇怪的是，他的「槍法」之準，可在遙遠的那邊隨手將標槍一丟，就正好丟在下一位使用者面前，大家都覺得此人很妙，卻一直等到比賽結束後，透過大會介紹才知道，原來此人正是當年世界標槍冠軍，難怪「槍法」如此神準，且不費吹灰之力。當時他正好

到上海參觀，德僑學校便請他來參與兩校的標槍比賽。

柒、一段奇緣

高中有一年暑假，我和同學到寧波佛教聖地普陀山玩，幾個人在普陀山伴山庵住了兩個禮拜，且每天都吃素。剛開始時因為平常很少吃到素菜，所以我們都覺得飯菜很好吃，但吃到第三天後大家都開始想吃葷菜，於是請問庵裡的大和尚哪兒才能吃到葷菜？其實普陀山上都是廟宇，是不准殺生的，根本沒有地方賣葷菜，連葷的罐頭都沒有。後來有個小和尚告訴我們：在普陀山山頂有座廟裡有葷菜吃，於是大夥兒都想辦法到山頂去。到了山頂後我們發現，那兒什麼樣的葷菜都有，香腸、滷味各式各樣，便高高興興地大吃一頓。

吃完之後，大夥兒想回伴山庵去，我提議每次都走同一條路很無趣，不如換條路走。於是我們換了一條不是很好走的路，那條路的半山腰便可看見伴山庵。普陀山上共有兩座大廟，一曰前寺，一曰後寺，伴山庵正位於前寺之旁，極為醒目，於是大家心想沒問題，便繼續走下去。該路很窄，所以大家僅能前後分開走，不能並排。然而走不到一半路程，路邊竟突然走出一位道士，髮長及地，他一出來便把我攔住說：「我攔到你便是與你有緣，現在你到旁邊我的庵裡喝杯茶。」當時我看此人外貌十分醜陋，不僅手腳很髒，一身衣服也破破爛爛，所以心裡十分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心想吃完一杯茶便走。誰知他只帶我一個人去，把同學全丟在後邊不管，我心裡雖害怕，也只有硬著頭皮前往。去到他庵裡，我發現他的庵很小，只有幾張竹凳子，還有一罐黑黑的東西，別無長物。他倒了一杯茶請我喝，我假裝喝了；然後又拿一些他做的糕要我吃，說是吃了他的「糕」，做什麼事都會「高」。

那時我心裡害怕，所以吃完糕便連跑帶跳地跑回去，回去後便遇到前寺方丈，那方丈已經聽說我被攔住的事，便問我是不是被一名長髮男子攔住，我說：「是呀，他把我攔住，還要我喝他的茶，吃他的糕。」前寺方丈對我說：「你很有緣，因為這個人蹤跡難定，何時出現沒人曉得。他現在想在山上修一條路，是個很神祕的人，誰也不曉得他何處來何處去，只曉得曾經有幾個法師跟他談過，發現他是個精通佛理與道理的人，大家都很樂意與他碰頭。但你想見他見不到，只有他想見你時才能得見，且他只見有緣人。現在你見到了他，還到他庵裡吃了茶和糕，所以你是非常有緣的。」

前寺方丈又接著說：「只是我不知道他為何會選上你？」我答道：「我也不曉得。」老方丈又問了半天才發現：原來我出生時曾拜過一位和尚，那時家裡信佛，時興生了孩子便送到附近大廟裡拜和尚，就像乾爸爸一樣。我記得那和尚還給了我一件黃馬褂，那位道士大概是因為這樣才找上我。此外，我的生日是在農曆四月初八，與佛教浴佛節同一天，算是很有佛緣。據說那次以後，那位道士便不會出現，他的庵也不見了，想修的路也沒再修，再也沒人看見過他。

捌、中學時代京滬文化概況

初中時代我開始看報紙，並對文學產生興趣。我記得那時所發行的藝文書籍，書邊都不像現在一般整整齊齊，那時候時興書不裁邊，書邊均參差不齊地露在外頭，每個人只要一買到新書，就得自己拿刀一頁頁裁邊，且每頁長短還得不一才是時髦。

我記得當時我最喜歡看冰心的小說，對魯迅、郁達夫、徐志摩及朱自清等人也十分欣賞。當時有兩本很小的雜誌，一曰《紅玫瑰》，一

曰《紫羅蘭》，兩本雜誌甫一上市總立即被搶購一空。其內容均以短篇小說為多，那類小說在當時被稱為「鴛鴦蝴蝶派」，專門描寫愛情、官府祕史，及偵探等故事，學生們都很愛看。我還記得《紅玫瑰》的封面正是三朵十分奪目的玫瑰花，小時候覺得拿到那本書的感覺好舒服，回去都慢慢看。

那時還流行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如何如何。只要有人要捧自己，就一定會在文章中這樣寫，因為大家都認為能和胡適（適之）交朋友，一定是了不得的人物。且當時報上經常辯論「知難行易」的話題，因胡適之認為「知難，行亦不易」，故兩派文章均流傳很廣。我記得當時大家都有很高的理想。

再高級一點的雜誌就是《東方雜誌》，內容多為文學理論、國際問題等，學術價值較高。當時王雲五（岫廬）的名字經常出現在上面，他在重慶經營一家商務印書館，乃苦學出身，雖沒上過正式學堂，卻擁有極高的學問，還出了一本「四角號碼」字典，大家對他十分佩服。除商務印書館外，他還有中華書局及開明書店，初中生常去那兒買書，人人趨之若鶩。

當時還有個張資平，他本人是地質學家，但文筆很好，專門寫長篇愛情小說，且裡面的主角都不寫名字，而採用「A愛上B，B又愛上W」的寫法，名字全以英文字母代替。但儘管如此，我們一群初中學生對他的小說都為之瘋狂，算是當時的一種文化。那時大家都很喜歡買新書，也很喜歡看報紙副刊。那時的報紙張數很少，大小正如今日報紙的半頁。當時也已有晚報，但晚報中只有一版是新聞，其他都是副刊，副刊裡寫的都是些文人逸事與新舊詩，尤其徐志摩的新詩受到許多人的喜愛。

上高中前，南京有本《生活雜誌》流行極廣，由鄒韜奮主編，特

色是沒有封面，像報紙一樣展開全是文字。三個銅板便可買到一本《生活雜誌》，且每週一上午甫上市便被搶購一空，晚一點就買不到。我還記得該雜誌首頁都是鄒韜奮自己的小品文，以評論政府的文字為多。鄒韜奮本人是救國會七君子^⑧之一，思想親共，但文筆很好。在那個時代，反政府言論最受大家歡迎，《中央日報》業已發行多年，但大家都不看。《生活雜誌》除了鄒韜奮所寫的評論外，尚有其他好看而有趣的文章，我那時除對經濟方面的文章看不太懂外，其他內容都讀得津津有味。此外，當時南京最流行的報紙是《上海時報》，該報專登體育消息，很像現在的《民生報》。且它的刊頭「時報」二字乃以紅字印刷，在當時可是難得一見的彩色印刷報紙。我記得那時我們看報都買《上海時報》，看雜誌則買《生活雜誌》。

真正進了高中後，我便開始看大報了。那時大家較常看的報紙有《申報》、《新聞報》及《時事新報》等，不過《上海時報》還是很受學生歡迎。文學方面，高中時代的作家以魯迅風頭最健，老師講課時都在講他。那時我們對魯迅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最著稱的幽默感，他有幾句話我很喜歡，且一直到現在還記得。這幾句話也很奇怪：「廟的門前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另一株也是棗樹。」其實這種寫法根本多此一舉，只要寫：「廟的門前有兩株棗樹」即可。我還記得當時還流傳著幾句話：「廟前有樹，眾人皆曰樹在廟前，余獨曰廟在樹後。」這雖然只是玩文字遊戲，但那時的學生們聽到這樣的話，均加以廣為流傳。

那時學校裡也常有文人演講，其中最著稱的當屬曹聚仁、葉聖陶

^⑧ 包括鄒韜奮、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等七名救國會成員，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二日在上海被捕，即所謂「七君子事件」。鄒韜奮於次年七月獲釋出獄。

及傅秉常，^⑨ 這些人的演講同學都聚精會神地聽。同學們最不歡迎的演講人就是政府主管，那時大家都存著一種反政府的心理，因認為政府不抗日，未對人民盡責。每回官方派宣傳部人員到學校演講，同學們都報以鞋子擦地板的聲音與噓聲，搞得政府方面的人很難堪。唯一一次例外，是當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衛之）到校演講，張道藩剛開始講時，同學們也都報以擦地板聲及噓聲，但張道藩不在乎，繼續講下去，大家擦了一陣地板後，覺得沒啥意思，後來慢慢有人不擦了，索性聽聽他在講些什麼，結果竟愈聽愈有道理。慢慢地整個禮堂裡的擦鞋聲及噓聲都沒了，甚至在他講完後，大家都報以熱烈掌聲。張道藩是唯一一位在同濟演講成功的政府官員，當時我對他的印象很深，覺得他真是口若懸河，懂得抓住學生的心理。

上海有很多文化活動，但到內地成都與昆明以後便都沒了。抗戰時紙質很糟，比現在極粗糙的衛生紙都還差，但大家也都不講究，每個人心中都懷抱著抗戰勝利的希望。那時物質生活條件差，不像現在還有咖啡喝。我還記得我吃的第一杯咖啡，是沈昌煥先生請的客，那是他從印度帶回來的咖啡。抗戰時我們雖然沒有真正的咖啡喝，但大家都把蠶豆拿來炒，炒好之後磨成粉，再將磨好的蠶豆粉煮成類似咖啡的飲料，大家都把那種飲料當成咖啡。

玖、中學時代校園政黨活動

抗戰時期，檯面上的青年黨與民主黨在活動力上始終不夠活躍，

⑨ 此人最著名的一句話即：「站在棺材上看風景。」當時大家總喜愛那些標新立異的語句。

我們對之印象也不深。共產黨平常雖較不敢露面，但活動卻最多，所以當時國內政黨仍以國民黨與共產黨為大，兩黨一明一暗相互較勁。容共時期，宋慶齡還與七君子等共產黨員在一起。我回成都唸華西大學時，由於讀書風氣很盛，學生們參加政治活動情形極少。但在課餘時間，同學們仍會分成兩派，一派組成青年軍，另一派則往延安跑，兩邊都不跑的人就自己好好讀書，而我就是屬於後面這種。

高中時也一樣。在上海，大家都覺得學生讀書就好，不要參與政治。那時，同濟是最少參與政治的學校，因為我們是醫、工學校，與政治一點關係也沒有。然而後來時局變化，學生參與政治的風氣慢慢也傳到同濟。我還記得當時學校的訓導主任常對我們說：「我看你成績不錯，要不要入黨？」剛開始時我都拒絕，因為父親曾對我們說：「最好不要入黨，等到書讀好了再入黨。」訓導主任也不堅持我們非入黨不可。但那時很奇怪的是：班上同學常到晚上便不見人影，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參加組織去了，問他們參加什麼組織，他們說是參加 CP（即共產黨）。這幾位參加 CP 的同學都是打球打得很好的，既會講話又十分活躍，平常在班上品行也好。後來他們還來找過我們，對我們說：「你們不要只光讀書，也該參加其他活動，我們有許多演講！」然後送我們幾本書，都是當時蘇俄的宣傳品。我們那時對共產黨並沒什麼反感，但也沒什麼好感，所以那些書總是放在一旁，不曾拿來看，故我始終也不參加 CP。

直到高中畢業那年，我們班上有位班長，平常成績不錯，很會講話，人也很好，我們對他都很敬重。一回于班長告訴我：「今天晚上，大學訓導長點名要見你。」那位訓導長叫什麼名字我已不復記憶，只記得他是市黨部的，因我那時參加陶百川先生舉辦的優秀青年活動，訓導長才點名要見我。我去了以後訓導長便對我說：「你加入國民黨好不

好？我們現在需要優秀同學參加。」當時我即答應加入，也寫了條子表示加入。然而加入後便有了麻煩，因為每星期都要開小組會議以交換情報，討論 CP 有什麼活動，我們要怎樣團結對付他們等等。那時我對政治並沒什麼興趣，所以不想參加這類活動，但已入黨又不得不參加，只好把由班上同學那兒知道的 CP 活動都告訴他們，他們也常要求我們去打聽 CP 的活動時間與地點。

由此可見，當時兩大政黨已相互爭鬥。但同濟已算是鬥得最輕的學校，那時同濟有位校醫名叫唐哲，他在醫學院以第一名畢業後，卻不開業也不深造，願屈就做一名校醫，大家都覺得奇怪。那時我們有位歷史系的彭老師，平常一有空便找唐校醫聊天，我們常納悶他倆為什麼那麼要好，後來才發現他們兩個都是共產黨員。大陸淪陷後，唐哲還曾擔任大陸華東區衛生部部長，原來當初是共產黨派他來學校臥底的。

當時學生們在南京遊行，完全是受愛國情緒鼓舞，旨在督促政府抗日，而共產黨便是利用這種愛國情緒鬥爭國民黨。我記得在重慶時，我們有幾位堂兄突然失蹤，後來才知道他們到延安去了。共產黨在延安提倡杯水主義，主張男女交往等於一杯水，高興吃就吃，所以好多人都到延安去，勸都勸不回來。延安那兒都是山洞，冬暖夏涼，不怕風雨，共產黨員都在山洞裡辦公，根本不怕飛機來炸。

第二章 大學時期與醫院實習

壹、入同濟大學醫學院

我於民國十九年入高中，民國廿三年高中畢業，隨後考進同濟大學，^⑩民國廿九年大學畢業。同濟大學只有兩個學院，一個是醫，一個是工，高中同學中較活躍的都進了工學院，沈靜一點的則唸醫學院。我因高中時成績不錯，運動也好，滿出風頭，所以被歸為活躍一類，大家都以為我會唸工，沒想到我最後竟選擇醫。

進大學後全部課程都由德國老師講授。早上八點，德國老師便準時進教室，且兩手空空什麼也不帶，一進來便侃侃而談，直到講課停止，正是八點五十分下課時間，一分一秒均不差。德國人準時的觀念讓我印象深刻，我受其影響極深，後來我在台北醫學院教了廿年書，每回上課也都是兩手空空，不帶一張紙、一支筆，連續講三小時，且一定準時上下課。這樣的上課方式，事前需有極完整的準備，非但需對上課內容極熟悉，且要有腦力記憶，十分費時費力。

大一時醫學院功課很緊，所以我丟下一切，全心準備功課。第一

^⑩ 庚子拳亂後，德國寶隆醫師在上海創辦同濟醫院；民國前四年創設同濟醫學院；民國元年，德國貝倫子教授來華創設工科，學校定名為同濟醫工學堂；民國六年歐戰爆發，學校由德國人手中轉歸國人經營，校名更為私立同濟醫工專門學校；民國十二年改為同濟醫工大學，由江蘇省撥款；民國十五年再改為國立同濟大學。

年讀解剖，在未進醫學院前，便得先想辦法把人類骨頭的位置，及其拉丁文名稱都背熟，甫入學頭一星期便舉行考試。考試方式是拿一塊骨頭問：「這是什麼骨頭？」有時還會拿馬或狗的骨頭來，要你分辨哪些是人類骨頭而哪些不是。考過者才有資格進醫學院，考不過便需回去重唸再考。

我記得那些骨頭的名稱與位置真是難背，尤其背頭骨部分真是令人苦不堪言！我們常得想辦法出去偷人骨頭，因為要有實際的東西看才讀得起來，於是我們偷偷跑到吳淞一些損壞的墳墓去偷人骨，把偷出來的骨頭用石灰煮得白森森的，然後放在床頭，睡覺前便看一看、背一背，如此才背起來。所以幾乎人人都有一付自備的骨頭，沒有的人就得去借。

德國人的要求很嚴格，教授也很神氣。我記得有位教授身後始終跟著一大群人，副教授和講師們在他講課時也都跟著聽。他講的話就像聖旨，沒人會有第二句話。我記得有一次在寶隆醫院病房，有位病人始終無法檢查出得什麼病，當時那位有名的教授正好回德國，有一天他終於回到上海，隔天即帶著我們查房，於是大家便請他去看看那位不知病因的病人。不料他甫踏進病房，便立刻說：「這病房裡有白喉病人。」仔細看過後，他便指著那位不知病因的病人說：「就是他。」於是大家問他：「您都還沒替他看病，怎麼知道他患白喉？」他說：「白喉病人有個特殊氣味，我一踏進病房就聞到了。」這時我們才曉得自己所有檢查都做了，就是沒注意到那個氣味。

醫學院初期所上的生理學、解剖學及動物學等，都在吳淞上課，後期的課則因戰亂而搬到上海上。後來寶隆醫院也被日本人拿去了。

民國廿六年升大二暑假，上海發生「八一三戰事」，日本海軍與陸戰隊向吳淞江灣閘北之我軍進攻，全面對日抗戰於焉開始。戰爭爆發

之前，二姐正好在南京之江大學讀書，和同班同學余宗玲（即余紀忠先生的妹妹）很要好，於是二姐跟著余宗玲一起到常州過暑假，並拜余宗玲的媽媽為乾母（常州當地時興收乾兒女）。姐姐寫信要我也去常州玩，因常州位於京滬之間，離我住的地方很近，故我也去常州住了一陣子。

到常州後，由於外面風聲很緊，軍車來來往往，一片風聲鶴唳，大家都曉得戰爭即將爆發。於是我們對余老太太說：「常州也很不安定，我們想回四川去，你們打算如何安排？」余老太太原本堅持不走，因余紀忠彼時人在英國，家裡只剩生病的余家大姐及三姑。但第二天，余老太太便表示要隨我們回四川，我們也答應了。於是我便到上海買船票，因那時父親與上海民生公司的經理很熟，我直接找那經理，他便給了我幾張房艙票與通艙票，就這樣一行人（除我之外全是女性）上了船，女士們全擠在房艙，我與另一位黃姓同學則待在通艙。

船由上海往四川走，一路上余家大姐不斷發燒，我們在武漢請醫生上船為她看病，拖拖拉拉地才由漢口換船到宜昌，再由宜昌換船到重慶，總算把他們一家人安全送抵四川。到了四川，因我家在重慶縣城有棟四層樓房，我們自己住一、二兩層，請他們住在三、四兩層，他們有了地方住下，生活暫時安定了，但中日戰爭也在此時爆發，一切都十分動亂。

此時正好二姐與她的同學何思可^⑪很好，兩人決定在倫敦結婚。但二姐此時人在重慶，何思可則在倫敦，所以何思可要我協助二姐搭水上飛機到倫敦。從前我家與余府的關係，因二姐認余母為乾媽，所以兩家較親密的聯繫都由二姐開始；如今二姐一走，兩家的關係好像

^⑪ 政大外交系第一名畢業，在倫敦任三等祕書，與駐英大使鄭天錫（荋庭）很熟。

就不夠了，故余宗玲建議我也拜余母做乾母，再把兩家的關係連起來，如此他們住起來也方便。我因與他們在常州很熟，所以便答應了。爾後余紀忠先生由英國回來，在西北胡宗南（壽山）那兒當政治部主任，便將余老太太和三姑一併接走。此時余大姐已經過世，就葬在我家附近。余家搬走後，我家還繼續待在重慶。

貳、由同濟到華西

當時同濟大學已遷離上海，移到金華、桂林與昆明等地，歷經多次遷移。我並沒有跟著學校走，而決定轉學到成都極有名的醫科華西大學繼續就讀。當時我由重慶坐車到成都，一路上車子不斷拋錨，共花了三、四天功夫才抵達華西。見到華西醫學院院長時，我表明自己曾在同濟唸過一年，那院長便立即答應讓我先在華西當借讀學生（temporary student），若成績好，便讓我當正式生；成績不好則只能借讀，待日後回同濟，照樣給我一張成績證明。

戰時後方都是幾個大學聯合上課，所以華西的教授群都是各校精英。我記得剛在華西借讀的日子很苦，因為從前在同濟讀的都是德文，英文已忘得差不多；但華西唸的是英文，所以頭半年我幾乎次次陪榜，直到第二學期成績才開始上軌道，到了第二年下半年，我的成績便很好了。

民國廿七、八年正是轟炸最厲害時，那時敵機天天來一、兩架，且由飛機來的方向判斷，大約是由武漢沿長江經川東而來。他們經常轉兩圈就走，但有時又會故意丟炸彈下來。轟炸機常在晚上來，故意擾亂大家的睡眠。那時我們一群同學常在躲警報時，約在郊外某個墳前聚會，在那兒聊天、吃東西。事後統計，我們聚會的時間多在晚上

十二點至一點，所以後來我們大概都知道飛機何時會來。我們幾乎天天有聚會，這表示幾乎天天都有飛機來。雖然躲警報成了家常便飯，但對我們的大學生活卻沒什麼影響。

成都和重慶完全不同：重慶是山城，可挖山做防空洞；但成都是水城，沒法子做防空洞，大家只能疏散到郊外。我們學校在成都西城郊外的華西壩，但因學校目標大、房子高，所以校舍仍不能用來躲警報，疏散時需至附近郊外的墳墓區。我記得有一次真的發生轟炸，那時有位個子高高、長得相當漂亮的女同學和我們一起躲警報，警報來時我們正好將抵目的地，那時我聽到附近有炸彈聲，她因平時很少遇到真正丟炸彈的情形，所以和平常一樣沒有警覺要臥倒，剎時只見一個彈片從她的頭上過去，女同學當場死在那裡。我們躲警報時，偶爾還可親眼目睹飛機低飛丟炸彈的情形，雖然當時我們還是學生，只把警報當成好玩的聚會信號，但那些警報與轟炸對整個成都還是造成極大影響。

當時我國空軍學校也搬到成都，每天軍校學生都穿著漂亮整齊的制服，且每個人的個子都很高，長得也很漂亮，因為他們都是經過千挑萬選脫穎而出的優秀青年。當時成都許多著名的女校（如金女大及其他大學）學生，都極愛慕欣賞空軍學校的學生，所以現在空軍有很多高級軍官的夫人都是四川人，正是因為當時每位四川女孩都喜歡飛將軍的緣故。許多名女校的「皇后」都嫁給了飛將軍，因為公家給予空軍的待遇不錯，而且他們人又長得帥。我們那時都笑稱是「空軍轟炸金女大」，因為空軍學校的學生總穿著空軍制服到金女大約女孩子出去玩，大家對他們都是既羨慕又嫉妒。

大學時候我曾和班上廿四位同學（男女各十二人）一起參加一個聖經班。有一回大家一起上峨嵋山，在那兒待了兩個禮拜。峨嵋山上

最著名的三景，要到山上的金頂才能看到，我們那次非常幸運，到金頂的那天氣候很好，三景全讓我們看到。其中第一景是「萬盞明燈朝普顯」（又稱「聖燈」）：晚上由金頂往峨嵋山下看，可看到山下寺廟點點燈火，猶如萬盞明燈，那燈火忽明忽暗，一閃一閃十分美麗；但次日早起再看時，卻又發現山下根本沒有任何寺廟，前夜所見萬盞明燈，其實都是虛幻。我想這可能與雲層厚薄及光線折射有關，但真正原因仍不清楚。^⑫第二景「佛光」（又稱「寶光」）：雨後在金頂上可看見天空浮現一道彩虹，彩虹中可以看到一個人頭，若將自己的頭搖搖點點，彩虹內的人頭也會跟著搖搖點點，這是十分奇妙的經驗。^⑬第三景「西藏雪山」則是真正的實景，由於金頂地居高處，我們竟可由成都峨嵋山頂，直接看到西藏雪山的雪景，十分壯觀。走路上峨嵋山金頂需花一天半的時間，且因地勢較高，往往在山下穿著薄衫上山，到了山上便得借一件厚棉衣來穿。

我在峨嵋山參加聖經研究活動後，開始每週日都會到成都參加禮拜。加之華西是個教會學校，屬美以美會，故我雖未受洗，卻深信基督教。我不受洗的原因是，如果受洗就不能有偶像崇拜的行為，我因為要拜祖先，所以並未受洗。不受洗比較自由，做什麼都可以，所以我平常若到教堂便作禮拜，若到寺廟還是會拜菩薩。台灣有很多家庭教會，就在家裡講道，這種情形我在大陸上倒不曾見過。

那時成都的治安還算不錯，前線傳回的戰爭消息也不多。因為當時還是學生，對戰事情況也不大有熱心知道。當時成都沒什麼遊行、

⑫ 經查此乃當地晚間山谷中的磷光奇景。由於山勢較高，空氣密度與平地相差甚多，故當空氣一流動，便會產生折射，使點點磷光搖晃閃爍，有如繁星。

⑬ 此虹乃陽光透過水蒸氣折射而生五彩光環，有如菩薩頂上的佛光。

集會等政治活動，因為全國上下都已全面抗日。基督教在當時很盛行，我們每週日早上都要做禮拜，聽學校講道。市面上還是很平靜，也沒有什麼動亂發生。

我在成都華西一直讀到五年級（一般醫科要讀六年，但華西要讀七年），生活過得很平靜。很多人唸完五年級便考了畢業考，但在那時我卻接到同濟寄來的通知，表示同濟已搬到昆明並正式復校，問我願不願意回同濟就讀，若我願意回去，則需於某月某日前到昆明同濟報到；如果不願回去，他們就要將我除名。我拿到通知後非常猶豫，不曉得該怎麼辦，因為若是回去，我實在捨不得目前這麼好的環境；但若不回去，又覺得自己在同濟由高中唸到大二，將來大學畢業後卻將不被視為同濟學生，覺得很對不起自己。最後我寫信回去問父親，父親要我自己決定，我便決定回同濟去。

回同濟之前，我先去見華西醫學院院長，向他表明回同濟的意願，他笑說：「其實大學都一樣，你讀同濟也好，華西也好，其實都一樣。如果你覺得你過去一直是同濟的學生，而希望回去同濟，那我們也不堅持留你。你在華西的功課不錯，我們承認你是華西的學生，你回同濟之後，任何時候想再回華西，我們都歡迎。」華西醫學院的院長非常大方，還把我在華西的資料都轉回同濟去。還有位教病理學的侯教授說他和同濟校長很熟，故給了我兩把自己做的牙刷，^{①④}要我帶到同濟送給同濟校長。

①④ 華西牙科十分著名，蔣中正還曾特地到華西診治牙齒。當時我們因未曾見過蔣委員長，所以偷偷站在遠處看他，但其實根本看不清楚。

參、重返同濟完成學業

我是坐飛機回同濟的，那時還有飛機由重慶飛昆明，而且還是軍機。到了昆明後我立刻向學校報到，學校位於昆明市的昆明湖，風景很像杭州西湖。我到那兒以後就住在學校安排的宿舍裡，並加入五年級開始上課。上課後才發現自己又得重新適應同濟的德文教學。德文我已經丟了四年，書本幾乎又快變成無字天書，上課時許多醫學用語因聽不習慣，彷彿都聽不懂了。我記得那時真的跟得很辛苦，不過還是努力地跟上去。

在昆明差不多讀了八個月就開始畢業考，大家都十分緊張，那時我和一位女同學徐國樂常一起準備考試，整整一個月的白天都在讀書，晚上也不睡覺。唸到想睡時，徐國樂會對我說：「等一下我要是睡著，你幫我看一下時間，給我十分鐘休息，十分鐘後再把我叫醒。」每天用這種方式唸書，唸到半夜才跑出去吃點東西，回來又繼續唸。

昆明當時的物質生活極差，我們在學校約八個人同桌吃飯，因那時每個人身上都沒什麼錢，所以伙食也開得很壞。八個人大概吃四樣菜，每樣菜都很小盤，故飯還沒吃一半菜便吃光了，因此大家常把盤裡剩的菜湯泡在飯裡繼續吃。不過最糟的還是飯，那時我們吃的飯並不是現在吃的白米飯，而是「年飯」。所謂「年飯」者，我們一般吃年夜飯時，都會拿一些紅色素染在米飯上，成了一顆顆的紅粒米，目的在討個吉利。但學校裡的「年飯」加的可不是紅粒米，而是一粒粒紅白色的小石頭，商人在米裡摻石頭，可以增加重量，多賣些錢。同學們由於沒多少錢可花在伙食上，所以學校買米的錢也不多，買不到白米，只能買摻有小石頭的米，才夠全校同學食用。我們平常吃「年飯」

時也來不及挑，因為等你把石頭都挑起時，桌上的菜也都沒了。

那「年飯」真是難吃，吃一口飯嘴裡經常卡卡響，加上菜也不夠吃，於是大家只有到外面買豬油及大頭菜，將大頭菜切成小丁，以豬油一炒，再用漱口盅裝成一盅，當成自己的私房菜。平常沒菜吃時，就把自己的私房菜拿出來配「年飯」。有點錢的同學會去買昆明火腿，同樣和著大頭菜與豬油一起炒。當時有好多同學都因吃了這種摻了石頭的「年飯」而得了胃病，故在飲食方面大家都十分清苦。

不過有時晚上大家讀書讀到肚子餓，還是會到昆明街上買一種最便宜的「餌餛」吃，那是一種將回麵拿到鐵箍上熱，再澆上辣椒、豆瓣醬、鹽巴等的烙餅，既可飽肚又有味道，而且十分便宜。

讀書閒暇時有兩項娛樂：一是看電影，二是追女孩。那時昆明電影院只有兩、三家，但昆明市裡卻有好幾所大學，學生很多。學生們下課沒地方去，都去看電影。當時的間諜片很好看，而且很少外國片，都是本土間諜片。我還記得那時買電影票的擁擠情形，因為賣票亭只有兩個窗口，大家排隊買票都要排好遠，如果遵守秩序排隊過去，是很難買到票的，所以那時大家都一直往前擠，甚至還有人從別人的頭上先爬過去，手往賣票窗口裡一伸就先買到票了。而大家對於自己頭上有人爬過去，也都不感到稀奇。

在當時，看電影是一種高級娛樂，難得一、兩個禮拜能看到一場電影，剩下時間我們都以追女孩為主要娛樂。其實所謂的追女孩，也不是真的追求人家，而是「跟」她們，我們稱為「吊膀子」。平常一下課，在還沒開始讀書前，我們會先到昆明街上去。昆明是個吃鴉片的地方，早上不到十點、十一點店家是不開門的；而晚上則到了一、兩點，店家都還在做生意，所以愈晚街上人愈多。我們晚上吃完晚飯到讀書前的時間為自由活動，這段時間七、八個男孩子便跑到街上「追」

女同學，純粹只跟而不上前打招呼。女同學走到哪兒，我們就跟到哪兒，有的女同學看到有男生跟在後頭，往往就會走得比較快，而我們雖然也走得快些，但仍保持一定距離，因為跟得太近便沒了禮貌，直到把女同學送到家，便調頭再找新的目標跟。男孩子們平常就把跟女同學當成一種娛樂，有時一、兩個人跟一個，有時兩、三個人跟一個，有時又七、八個人跟一個，十分好玩。有時跟熟了，哪位女同學幾點鐘會從哪兒出來，又幾點鐘會回到哪兒去我們都曉得。不過昆明的治安不像成都那麼好，所以有時運氣不好，在半夜巷弄裡常會出現一些雲南人，用棍子把男同學打暈，然後搶走同學身上的財物，有時男同學醒來，連身上的衣服都被搶走了。幸好我們總是七、八個人一起走，所以很少碰到這種情形。

昆明以農家爲多，氣候很好，四季如春，我在那兒住了一年多。當地有一種垂絲海棠，由樹上垂下，紅紅綠綠十分好看。特別是昆明還有個滇池，另外還有個翠湖，景色和西湖一樣美。所以昆明城裡可謂花開四季，滿城春色，景色與氣候均十分怡人，和台灣一樣無四季之別。但當地因地勢較高，所以空氣稀薄，我們剛去的時候都會流鼻血。當地軍閥也很多，還有金馬、碧雞兩座著名的城樓。但那時在昆明並無黨派爭執或政治活動，學生們都是各唸各的書。

昆明因在雲南，故有滇緬公路可通外國，舶來品很多。當時送禮，以外國香煙及絲襪最受歡迎。送禮給男性，就送外國香煙、襯衫、襪子及牙刷；送給女性，則可送絲襪。昆明比重慶來得資本主義化，各方面的生活也較奢華。不過那時的物資仍十分缺乏，大家還是過著清苦的日子。日常所穿的衣服都用一種名叫「陰丹司林」的布料所做成，這是一種卡其布料，男孩拿來做長衫，女孩則拿來做長裙。「陰丹司林」這種布料的好處在於永不褪色，所以當時我們都稱呼年紀大卻看不出

老態的人爲「陰丹司林布」，意指「永不褪色」。當時人們的生活都很清苦單純，不會有任何一個人笑別人的衣服穿得不好。

但在另一方面，當時由於歐戰亦正進行，且聯軍節節勝利，故每個人對抗戰勝利也都抱持著極大的希望。那時昆明盛行「演話劇」，大學裡較有天份的同學都組織話劇社。當時最有名的演員名叫白楊，她的話劇演得極好，人也長得漂亮，大家都很捧她，只要是她主演的話劇都很難買得到票。當時話劇內容均以愛國題材爲主，十分振奮人心。還有一種兒童話劇，由兒童們表演戰時空襲，日本人的殘酷，及小孩子如何受欺凌等故事，底下的大人觀眾往往看得眼淚漣漣。

當時的抗戰歌曲也很多，所以民生物質雖缺乏，但大家的精神都很高昂。尤其愛國話劇與愛國歌曲撫慰了許多人的心靈，給了人們無限的希望。大家最常唱的歌就是「長城謠」，以及東北歌「打回老家去」，和現在的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那時共產黨對組織話劇社、歌唱團等，均較國民黨來得積極，十分懂得組織團體。

距離畢業考兩個月不到，我們突然得知同濟又要由昆明搬到敘府（今之宜賓），並將在敘府舉行畢業考。那時的交通儘管不便，但同學們仍自動到敘府去。因我是四川人，回去很方便，所以得知此消息後，我便想先走。記得我還沒走時便生了場大病，病因是學校宿舍不夠清潔，以致被昆明苛蚤（一種會跳的臭蟲）咬到，故引發肺炎而住院。那時覺得在異鄉生病很可憐，病後我在醫院住了一個多禮拜才痊癒。

出院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館子叫份炒豬肝^⑮及兩碗白米飯（沒有小石頭）吃。我當時感覺已經好久沒吃到那麼美味的食物，於是自己一人吃完所有東西，覺得真是人間天堂，有說不出來的好。

⑮ 炒豬肝現在已沒人吃，但在當時，能吃到炒豬肝可是件奢侈的事。

肆、蜀道難於上青天

吃完東西的第二天，我便準備離開昆明。那時回四川已無軍機可搭，我只有攔住要往內地的卡車，給司機一點錢，與他們打交道，看有沒有空位可讓我坐。換句話說，就是「搭黃魚」（搭便車）。那時我是自己一人先走的，所搭的那輛卡車走不到一天便拋錨，修也修不好，我只好等下一部車來再買黃魚。買黃魚的錢通常都不多，我還記得那次我由昆明搭黃魚到四川內江，一共換了七部車子，經貴州走烏江路線，一路上還曾經過一處很大的瀑布。烏江是條險江，加上當時的滇緬路、滇黔路及滇川路都修得不甚好，車子性能更是不好，所以一路開下去，常有車子翻到崖下，或拋錨在路邊的情形。

當時我由雲南經貴州回四川，一路上車子所經過的路面土質顏色都不同。雲南的黑土較肥沃，可種田，草、樹均長得好。但貴州便很窮，土壤貧瘠，滿地沙土上看不見一株草、一棵樹，四處一片荒野。張其昀（曉峰）曾在地理書上寫：「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正是貴州的最佳寫照。車子過了貴州到四川瀘州市，便又可看到一片草地、紅土及村莊，一路上各省人文景觀盡皆不同。

由雲南昆明到四川內江，我們一共走了七天的路，非但吃了好幾天苦，還要討好司機，買飯給他吃。一到內江，我立刻住進一家旅館，安頓好後便到一家小館子吃飯，打頓牙祭。內江那地方產糖，所以蜜餞很多，我記得那裡有很多薑糖、棗糖及橘糖，分別是薑、棗子及橘子化糖加蜜製成。我記得那時我到一個小館，看到一種「夾沙糕」，這是一種用三層肥肉夾兩層豆沙下鍋油炸的食品，我看隔壁桌吃得很香，價錢也不貴，所以也叫一盤來吃，另外又點了一碗飯。那夾沙糕第一

口吃下去，又甜又油，好吃得不得了；但再吃第二塊時，味道便差了點，所以我吃得慢些；待吃到第三塊時便有些難以消受，因為吃甜食會悶，所以我勉強把第三塊吃了，後面的連看都不想看，還把它們推遠一點免得膩，然後把白飯也吃了。

我在內江住了一晚後，第二天就搭四川公車回重慶。當時四川的公車系統已很不錯，我回到重慶後便先回家休息，然而事實上我也不敢在家裡多待，便再坐船到敘府。敘府那地方十分富庶，城裡都是荷花池，農村裡的人都很有錢，只要有客人來，他們就會準備各式各樣的菜來招待。我住在敘府同學家，他們對我招待十分慇懃。

我在敘府和徐國樂一起準備功課，一個月後便開始考畢業考。那時大家都想考前三名，只要考到前三名便可留校在醫院當助教。我因原本成績還算不錯，可以拚一拚，因此讀書十分用心。敘府晚上要買東西十分方便，我記得那時半夜兩、三點肚子餓，都會到敘府街上吃「燃麵」，這是一種先用豬油過麵，然後再用水煮的麵，吃起來又香又甜，好吃又不貴。我和徐國樂每次都一人一碗燃麵，錢花得很少，吃飽再回房裡繼續讀書。

同濟的畢業考很嚴格，口試全用德文問答，由每位學生自己排定有空的時間，選擇同一時段的五人組成一組，一同應試。皮膚科及眼科每人答題約需卅分鐘，第一位同學答對即輪下一位，答錯便拿同一問題再問第二位同學，輪完一輪後再由第一位學生繼續作答。問答範圍包羅萬象，所以我們全部都得讀，實在很難準備。有的時候考試得碰運氣，但十題中若有五題不會便立刻被淘汰，並於規定時間內準備好再重考，重考一次沒過便不能畢業，得重新準備明年再考。至於內科、外科及婦科等主科，則每人問答約需一個鐘頭，這對口試來說確實十分漫長，因為老師一問馬上便得作答，沒多少時間思考，答錯也

沒法子更正。我認爲這很合理，因爲醫生的工作本需當機立斷，所以同濟採用口試進行畢業考，其實是很正確的。

徐國樂畢業考考得不是很好，不過因爲她是女生，不用擔心兵役問題，只要畢業就好。我便很用功，最後考了第二名，可以留校當助教，不需去當兵。我在畢業考時還佔了一點小便宜，因爲婦科教授是個很嚴格的老師，但他很喜歡運動，我因特別擅長乒乓球、排球及足球，而他也十分喜歡乒乓球，故考試時他只問了我五個主要問題，而我差不多都答出來後，他便說：「我知道你的成績和你的運動一樣好，所以你就考到此爲止。」那一科我就這樣過關了，還得了九十幾分，排在我後面的同學可就吃虧了，因爲愈到後面問題愈難，同學們都說：「你真是沾了光，好問題都被你答去了。」所以有時考運也很重要。

伍、戰時蜀地軍閥割據

戰時四川雖由外省搬進很多大學，但這些大學同時也引進許多有名的教授，加上四川本身原有師資，於是形成四川省裡的聯合大學，對四川文化極具交流與幫助作用。四川人因省內極爲富庶而十分好客，同濟後來搬到四川敘府，敘府又稱宜賓，便是因四川人宜於賓客而得名。四川人只要家中有客，便馬上把所有好吃的東西都拿出來招待，因爲他們覺得自己家裡東西太多，故喜歡邀請客人一同品嚐。

戰時的四川一方面很富庶，另一方面卻又飽受軍閥割據之苦。據說劉湘死時有個追悼會，許多人都做了輓聯拿到會場懸掛，其中成都著名的「幽默大師」劉師亮寫的上聯是：「劉主席千古」，下聯則是：「中華民國萬歲」。很多人都說這聯對得不對，因爲「千古」勉強可以對「萬歲」，但「劉主席」三字怎好對「中華民國」四字？於是劉師亮

便說了：「劉主席本來就對不起中華民國。」四川人喜歡咬文嚼字挖苦人，由這裡便可看得出來。

當時劉湘佔據重慶，劉文輝佔據成都；但劉文輝有錢卻買不到軍火，因為買軍火勢需經重慶水道，但軍火一到重慶，馬上就被劉湘扣住，劉文輝的軍火永遠到不了成都，使得他始終爬不起來。故四川有兩句話：「天生重慶，鐵鑄瀘州」，爭到瀘州就能控制川西，爭到重慶就能控制川東。故有好一陣子，整個川東一直是劉湘的勢力範圍。

四川軍閥往往有許多綽號，例如劉文輝老是菸不離手，人稱「劉菸灰」；鄧錫侯（晉康）又叫「水晶猴子」，因為他很狡滑；楊森（子惠）則叫「楊蠻子」，此人十分崇尚多妻制思想。至於劉湘最有名的則是他崇尚一夫一妻制，與楊森有顯著不同；范紹增（海廷）則是劉湘旗下的師長，以豪爽著稱，也有很多姨太太。不過在四川有姨太太並不稀奇，差不多作官的人都有姨太太。

軍閥割據時代由於部隊時常換防，換防後士兵們高興住哪就住哪，且住進來後生活瑣事全用百姓、吃百姓，人民均不堪其擾。所以當時四川人便想出一個辦法：找軍隊的上級，如果換防時換了排或連來，人民去找個團長寫佈告掛在家門口，佈告中命令：「本宅為本團治區，官兵不得干擾。」以此確保身家財產的安全，我記得當時我家常掛這種東西。

在戰時，四川徵稅常預徵民糧，也就是寅吃卯糧，今年先預徵明年的糧。當時這種情形嚴重到已向人民預徵卅多年的糧，換句話說，時值民國二十幾年，卻已預徵到民國五十幾年的糧。老百姓雖然有錢，但仍不堪其擾，因為過不久又換一次防，所有規定又要重新訂過。更甚者，當時劉文輝在四川擁有造幣廠，可以造出等於一塊錢的「銅殼子」，當時民間若要買比一塊錢少的東西，商人就用刀把「銅殼子」裁

成兩半，每半邊算五毛錢，再裁一半即算二毛五，可見當時四川錢幣制度真是混亂。

抗戰時大家都很辛苦，我們平常用的是銀元。當時最值錢的就是袁大頭，因為袁大頭裡所含銀量較高，其次是大清板，最後才是四川造幣廠所造的錢。我們在四川還用一種「小錢」，「銅殼子」是比「小錢」更大一點的錢。那時社會雖亂，但物價倒沒漲，我還記得抗戰時，一個袁大頭在四川可買六十枚雞蛋。

陸、在重慶武漢療養院實習

考完畢業考後，在留校擔任助教前得先實習。本來我可以留在學校實習，但因當時覺得敘府地方小，病人也不多，故我與徐國樂便想到醫院較多的重慶實習。可是我們在重慶沒認識任何與醫院有關係的人，於是我便寫了封信給華西醫學院院長，告訴他我已由同濟畢業，且想在重慶實習，不知他能否替我介紹實習醫院。因我過去在華西的成績還算不錯，所以他便介紹一家醫院給我，加之當時我們也自行申請一家醫院，所以有兩家醫院在談過後都願意聘用我們，最後我們選擇到安息會的重慶武漢療養院去。

那時重慶武漢療養院僅有兩名醫生，其中一位還是院長，但住院病人卻有百餘人。且那家醫院很特別，看診竟不分科，所以我和徐國樂進去後，非但得看門診、巡病房、接生、拔牙齒，有時還得看扁桃、洗眼睛，每天都忙得暈頭轉向，人都瘦了一圈。

此外，安息會不吃豬肉，且多吃素，主要蛋白質來源為滷蛋及牛奶，吃飯多吃青菜，沒有肉類。每週六為安息日故休息，但週日要上班。有一回很妙，我對徐國樂說：「安息會的東西我實在吃膩，我們到

冠生園（當時重慶城裡最著名的廣東餐館）打牙祭吧！」我還記得冠生園的廣州燴飯很好吃，但去到那兒才發現：療養院院長原是安息會虔誠的基督徒，照規矩不應該吃肉，但他居然也在那兒偷吃肉，實在很有趣。

柒、回同濟任助教

我們在重慶武漢療養院實習一年，得到不少經驗，對日後選擇的志業亦產生極大影響。一年後，我回到學校擔任助教，我選的是外科，那段外科生活過得也很愉快。我還記得回宜賓當助教後，已可開始領薪水，當時薪水究竟有多少我已不復記憶，只記得那時宜賓有條街很熱鬧，街上最大的一家店叫「寶元通」，是家小型百貨公司，但在當時已等同於今天台灣的 Sogo 或遠東百貨。「寶元通」櫥窗裡擺了一雙男用皮鞋，看起來又漂亮又舒服，我便心想：「假如能買回去穿不知多好！」但一看價錢竟比我全月薪水還多，我根本買不起，故只能天天下班後到櫥窗前看一看。那雙皮鞋後來始終沒人買，一直擺在櫥窗裡。哪想得到現在台灣每個人都有好幾雙皮鞋，穿都穿不完。

回憶起八年抗戰雖然辛苦，但我們在後方實在沒吃到什麼大苦，所以若要大家再回到當時，我想大家還是願意的，因為那時大家心裡都還有希望。可是抗戰勝利後與共產黨內爭時，大家的生活卻變得更辛苦，因為那時謠言很多，所以有句話說：「清官城內閒無事，坐地衝鋒造謠言。」

我在同濟醫院作外科時，一方面還指導學生，在那兒共當了一年半的助教。嗣後，宜賓附近的縣份知道我們這兒有所大學醫院，便把病人都送到我們這兒來，病人多了以後，醫院收入也跟著好轉，我們

除薪水外，尚可分到紅利 (bonus)，生活情況也慢慢好轉。在宜賓由於消息管道不多，所以我們對當時的政局並不清楚。

宜賓最有名的小吃就是燃麵及苕絲糖。所謂苕絲糖就是把地瓜用油炸過，放上糖，然後切成小條，做成像過年的糙米糖一樣，十分好吃。每回到宜賓夜市，大家都一定要吃燃麵與餛飩，上上小館與菜館，生活過得很好。每天早上起床，外科所雇的廚子便會幫我們燒飯，有時一個禮拜可以吃到兩次雞，大家都把雞啃得精光。現在在台灣雞已經不值錢，但在當時可以吃到雞，已經是很大的享受。

第三章 入委員長官邸

壹、進入官邸始末

我在同濟任助教一年半後，教授們很欣賞我的工作表現，決定將我越級升講師。不料報上教育部去，公文還沒下來時，我卻接到另一份公文調我回重慶。那是由軍事委員會方面發來的公文，要我前往任職，我因在學校做得很好，非常不願意去，便加以回絕。不久之後我又收到一封信，是父親寫來的，他堅持要我到重慶軍事委員會任職，父命難違，我在無奈下只好回重慶去。

回到重慶我才知道，原來我家在重慶有棟四層樓房，但因妹妹身體不好，父親便在重慶汪山修了一棟別墅，專供妹妹養病之用。因那屋前有五株梅花(包括白梅、臘梅、紅梅各一株)，父親十分喜歡那棟房子，故抗戰爆發、轟炸開始後，我們全家便搬到汪山別墅去。巧的是，汪山旁隔條山溝的山叫黃山，兩山之間有公路可通，當時軍事委員長蔣中正看中這座黃山，便將行轅搬至該地，每週均上山辦公。蔣委員長搬到黃山後，便針對附近住戶調查戶口，知道我們那兒有棟不錯的房子(即我家別墅)，也知道是誰住在那兒，調查得十分清楚。當時委員長身邊幾位高級人員如王惕吾等，都與我家人很熟，也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所以便打算把我調到軍事委員會。不料我竟不答應，他們便直接找我父親，並動之以情，表示我若到軍事委員會上班，因離

家很近，便可就近照顧家人。父親聽了覺得有理，才寫信非要我回去不可。

同濟知道我的情形後，還特地讓我留職停薪，待一、兩年後若我離開軍事委員會，便可再回同濟工作。從那以後，我便開始在重慶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上班。初進去時，他們給了我一個少校階級，並讓我在醫務所內工作。當時的醫務所吳齡深所長是位留德博士，專攻內科，他覺得自己一人忙不過來，需要一位外科輔助，而我專攻外科，便徵調我在那兒工作。醫務所裡除所長外，另有兩名醫生和一位男護士。不過那時委員長看病仍以吳所長為主，因為吳所長一直都跟著他，其他人只需為委員長以下的其他高官看病。

在侍從室工作是沒有星期天與例假日的，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均需待命。剛開始工作時我十分不習慣，醫務所的人也都很體諒我，便表示私下可以調班，只要留一個人在醫務所，另一個則可溜回家去。大家一個禮拜可以輪假一次，所以我每個禮拜都可以回家。

替委員長醫治瘡瘡是我與御醫頭銜結緣的開始。民國卅二年，我才進官邸服務未幾，委員長肛門附近便開始痛，吳大夫看過以後對委員長說：「這是外科的病，我找熊丸來看。」委員長答應後，我便前去替委員長看病。經過診斷，我發現那瘡瘡已經化膿，光是擦藥無效，應該把瘡瘡割開，將膿放出，於是便直接對委員長說：「報告委員長，這可能要開刀喔！」委員長問：「要怎麼開啊？」我說：「這很簡單，我拿個小刀就可以開了。」委員長當時便說：「好啊，你去拿呀！」於是我便帶了開刀器具，消過毒，便去幫委員長開刀。開刀時我幫他把瘡瘡割開，把裡面的化膿一放，委員長的瘡瘡便治好了，是個很簡單的手術。

其實照規矩講，那時我應該小心謹慎地請委員長到醫院治療，但

因我那時年輕，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便直接替委員長進行手術。我替委員長治好癰瘡後，正好有人提報吳齡深擔任軍醫署署長，委員長問他去找誰接替他的工作，他便提議由我擔任，委員長說：「好，找他來我見見。」待我上去見了委員長後，他立刻開門見山地說：「你來做我的侍從醫官！」從此後，我便開始了四、五十年的「御醫」生涯！¹⁶

貳、侍從室編制解說

一、三處一室六組

軍事委員長侍從室的形成是很自然的，而非政府既有的正式編制。在我進去之後，侍從室的工作愈來愈多，編制範圍已相當大，所以外面的人便稱此編制為「侍從室」。

委員長侍從室共分三處，第一處主任是錢大鈞（慕尹），專管軍事；第二處主任陳布雷（訓恩）則專管祕書、文字、稿件等事務；第三處主任陳果夫專管黨務，如中央政校及黨務情報等均屬其管轄。除此三處外，尚有一侍衛長室，我剛進去時，侍衛長為俞濟時先生。所以，錢大鈞、陳布雷、陳果夫及俞濟時四位先生，正如委員長身邊的四大金剛，平常委員長出差，俞濟時先生與陳布雷先生都會陪同前往。

那時第三處主任陳果夫先生因不在重慶上班，所以情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侍從室一、二處與侍衛長室共分六組，其中第一組組長陳希曾專管總務；第二組組長余達專管軍事情報；第三組組長施覺民專管侍衛；第四組組長陳方（芷町）專管祕書及來往公文；第五組組長陶

¹⁶ 熊先生自民國卅二年起擔任蔣公醫官，至六十四年蔣公去世，共計卅二年。在此謂四、五十年的「御醫」生涯，尚包含至經國先生去世的民國七十七年為止。

希聖專管祕書；而第六組組長唐縱（乃建）則專管情報。在這六組當中，第一、三、六組均屬侍衛長室所管轄，所以是俞濟時先生屬下；第二組則屬第一處，屬錢大鈞先生管轄；四、五兩組則屬第二處，屬陳布雷先生部下。

一般說來，委員長身邊有三類人隨侍，第一類是侍衛系統，專門負責委員長周遭安全；第二類則是武官，為委員長安排客人晉見，或提醒委員長各項行程；第三類則是祕書，其中機要祕書專管委員長的公文收發，新聞祕書專管委員長的演講起稿、客人陪見與記錄，英文祕書則專管外國客人的陪見與翻譯工作。委員長身邊還有一些副官，專管委員長的衣著、飲食等內務，通常委員長在房內有什麼事情，都會先找隨身當班的副官進來，吩咐他去找武官、祕書或任何人來見，所以副官也負責傳話，是委員長最貼身的單位。侍從室還有個專門的廚房，負責照顧與供應委員長早、午、晚三餐。

二、透視官邸侍衛系統

負責委員長周遭安全的侍衛長，當然是委員長身邊十分貼身的人物。其主要任務便是負責委員長的安全、行動與內務，所以侍衛長室人員也多。我剛進侍從室時，侍衛長是俞濟時，他當侍衛長的時間很長，在他之後又有吳順明、胡炘、郝柏村、孔令晟（也曾擔任警政署長），及鄒堅等。俞濟時先生是個值得一提的人才，他是俞飛鵬（樵峰）先生的侄子，溪口人，黃埔軍校一期畢業，與胡宗南、王叔銘同期。過去曾任師長，後來調進來當侍衛長，做事嚴謹細心。

俞侍衛長有個專門的侍衛長室，底下有許多分支，其中包括一個侍衛組，裡頭有多位侍衛官，專門負責委員長出外安全。委員長上車時要有個侍衛官坐在委員長前面，這類侍衛官又稱「龍頭侍衛官」，委

員長在車上想起什麼事，就會交代龍頭侍衛官去做。曾經有個笑話：有一次委員長出去，照例坐在座車後面，右前座坐的是龍頭侍衛官伍誠仁（克齋），此人官拜中將，因在軍中表現十分優秀，所以被選來擔任侍衛組長。那日委員長上車以後，突然想起要人拿一塊「絹頭」（手帕）來，但福建籍的伍組長根本聽不懂什麼是「絹頭」，想了半天，竟拿了一塊「磚頭」來。那次委員長倒沒講什麼，但侍衛長俞濟時覺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後來還是換了個浙江人當龍頭侍衛官。

在委員長居家臥房與書房外圍也都有侍衛官。站在書房門外角落的侍衛官，專門負責注意委員長書房有哪些人進出；另一角落還有個便衣侍衛，他的任務是注意委員長書房周圍有沒有其他人。故委員長在臥房、書房的一舉一動，侍衛官在外面都聽得見；委員長身邊進出的人，也都要由侍衛官做詳實的記錄。每回委員長要出門，都會先在書房裡喊一聲「喂」，房門外的侍衛官聽到便要立刻答應，再找副官進去聽委員長吩咐，委員長若對副官說：「我要出去，準備車子。」副官便再通知侍衛官準備車子。此時侍衛官會按鈴，剎時整座官邸將同時響起鈴聲。其中一聲鈴響表示夫人要用車；兩聲鈴響則是委員長與夫人一起用車；三聲鈴響為委員長單獨用車；四聲鈴響則是委員長不用車，但要去散步；五聲鈴響則是委員長與夫人要一起散步。司機只要聽到鈴聲，便會自動準備好車子等在門口，侍衛官們也各就各位，有些侍衛官還要跟隨委員長左右，一同坐車保護。所以在官邸中行事，都有一套固定的科學化行程，而這些行程都由俞濟時先生所安排。

委員長出外散步時，也會有侍衛官跟在後面；侍衛官外圍還有一群侍衛，由專門的侍衛股管理，並聽從侍衛官的指示。侍衛外圍有一群警務員，專門把官邸附近的環境摸得很熟，並負責安全巡邏。所以委員長的日常行事，便是透過這樣一層層保護、監視、命令下達與執

行而成。尤其西安事變後，委員長周圍的保護更為堅實，西安事變之前尚未如此。

三、三軍武官之職責

委員長身邊還有三位貼身武官，這三位武官分別都是陸、海、空三軍中所挑選出的優秀青年，且往往需具中、上校以上階級。然而他們在侍從室的時間卻總不長，約兩、三年就要換一次。先總統及經國先生與現任的李登輝總統不大相同的是：先總統對軍職人員掌握很嚴，對軍中人事也極為注意。據我所知，侍從室武官選拔有一定的嚴格考核程序，各軍種武官一般由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分別呈報委員長，一次呈報三、四人，委員長依呈報名單召見，再圈選出最滿意的一個。如果全部的人委員長都不滿意，便要由三軍的總司令另行呈報三人上來，委員長再召見，圈選最滿意的一人。

任何人要見委員長，委員長若批「見」，武官便會通知他們來見；但若委員長批「約見」，就表示他這次不見，下回再約時間。委員長見客，一定都會經過武官安排，且有一定程序。打個比方：當武官找某位客人來見時，首先要請客人先在客廳稍候，此時副官會把茶水端上，武官再透過委員長身邊的副官向委員長通報「武官請見」，當委員長說「好，進來」時，武官再進去報告「客人已到客廳」的消息，委員長得知後才出來見客，且後面一定再跟著一名武官。像這樣的見客手續，包含經國先生和緯國先生在內都需遵守，只是經國先生來時不需經武官通報，而是直接由副官進去報，副官通報時會說：「報告委員長，教育長（按：蔣經國時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在外面。」待委員長說「好，進來」時，經國先生方能進去。只有兩個人是可以不經通報便能直接進入委員長辦公室，其一是夫人，另一個就是我（醫官）。這是委員長

侍從室的小制度，在先總統時執行得很嚴格，但在經國先生擔任總統時，便沒有這麼嚴格的保護措施，因為經國先生是個比較隨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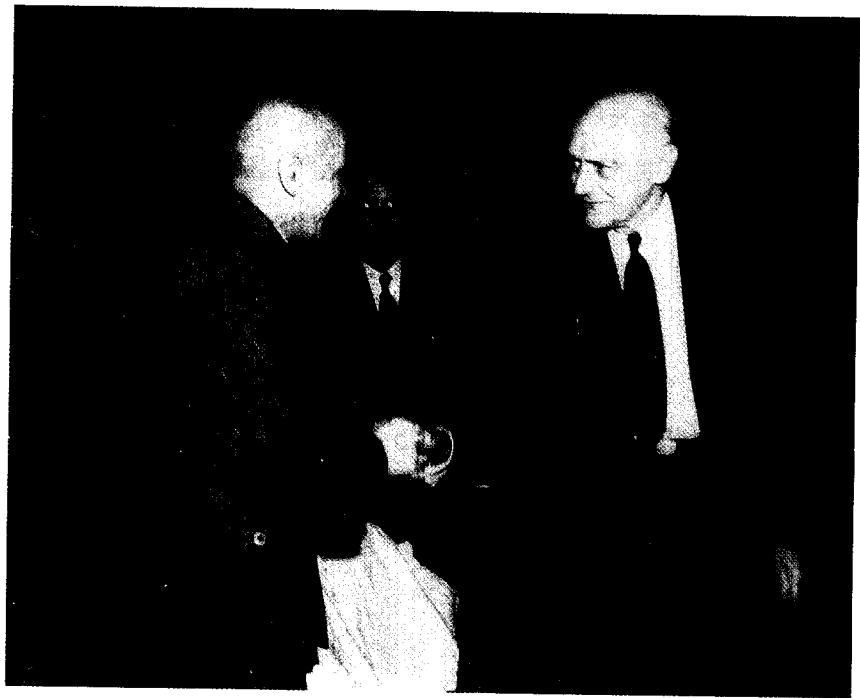
委員長很重視時間觀念，所以要見委員長，必需提早半小時到才行。原本委員長常於晚上見客，但因夫人反對，所以改成白天見客。委員長見客時很注意對方的服裝、儀態，以及講話方式，談過話後還會在見客名單上畫勾。在見客名單中每位客人的名字上都有四個框，委員長將勾畫在哪個框，對每位請見或約見者的未來前途，都將有極大影響。

四、三大祕書簡介

委員長身邊的三位主要祕書，分別是機要、新聞及英文祕書。這三位祕書都屬於侍從室第二處第四組，故為陳方先生的屬下。我剛進侍從室時，委員長的機要祕書是俞國華，在他底下幫忙的是周宏濤，未幾俞國華赴英留學，機要祕書一職便由周宏濤升任；爾後周宏濤調至黨部任職，其職便由唐振楚（弘亮）繼任。唐振楚本是新聞祕書，後來兼了一陣子機要祕書，其後尚有陳叔同、孫義宣及夏功權等，都曾擔任委員長的機要祕書。這些機要祕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幾乎清一色是寧波人，因為委員長的寧波口音只有寧波人才聽得懂。

而新聞祕書則無形中都是湖南人，且皆中央政校出身，僅秦孝儀先生除外。在我進去之初，新聞祕書是由蕭自誠先生擔任，蕭先生原是接蕭來華（死於西安事變）的位子，但做沒多久又再交給曹聖芬，直到勝利之後都一直由曹聖芬擔任此職，以後分別有唐振楚、楚崧秋及秦孝儀等。孝公擔任新聞祕書期間，周應龍也曾兼任一陣子新聞祕書。

英文祕書在我進去時為李惟果，爾後李惟果升任行政院祕書長，



蔣公晉見外賓時攝，後爲沈昌煥。

英文祕書一職便由沈昌煥繼任，之後又分別有沈劍虹(瑞文)、沈錡(春丞)，及錢復等。我剛進侍從室時，常在一塊的有俞濟時、周宏濤、曹聖芬與王惕吾等先生，後來還有夏功權先生及沈昌煥先生，在黃山時大家都很熟。

五、官場學問大

俞濟時在委員長身邊權力很大，因爲他主管委員長的安全問題。尤其自西安事變後，委員長的安全問題更加重要，任何人要請見委員長都需透過俞濟時的安排，只有戴笠（雨農）先生例外。俞之下掌管

總務、醫務及交通，且他除是官邸侍衛長外，尚兼國家軍務局局長。當時所謂軍務局者，即今總統府第二局，屬總統幕僚單位。國防部的公事均需經過軍務局，由軍務局做好公事摘要，總統看公事前便先看摘要，看完摘要後若認為需要再看公文，公文正本才會呈到總統面前。而公文摘要都是俞濟時簽的，他在其中的權力是：若原本公事簽報駐美大使館武官要派張三前往，俞濟時便可在旁寫上張三有什麼缺點，可否派李四赴任，若總統在李四的名字上一勾，即變成李四赴美，故俞之權力及影響力不容小覷。而機要祕書周宏濤在公事的呈批之間，雖然不能加上自己的意見，但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十分重要。

參、第二處風雲榜

侍從室第二處裡有幾位極有份量的人物，包括陳布雷先生、陳方先生與陶希聖先生。委員長與夫人對布雷先生都相當尊敬，尤其委員長雖對軍人要求十分嚴格，且很有威嚴，完全不苟言笑，但對文人卻仍保有一份尊敬與客氣，特別是對資深文人，如陳布雷、戴季陶，及吳稚暉（敬恆）等。布雷先生算是委員長的部下，但委員長卻從未以對部下的待遇待他，對他講話相當客氣。布雷先生是個非常有禮貌的人，進退方面十分得體周到。他走路時很少挺起身子往前走，而總是側著身子走，且不論是與其他高官或和朋友走在一起，他都一樣謙恭。

每回委員長出去散步時，我們走在後頭便仔細觀察：這些跟著委員長一起散步的高官，究竟有哪些會拼命擠到委員長身邊去？因為緊跟在委員長身邊的人，在委員長轉頭講話時便可馬上接話。結果我們發現：孫義宣每次都落在後頭，一點都不急的樣子。而來台以後，最會擠的人是一位資政（在此隱其名），所以我們都在後面笑說：「像資

政那樣有學問的人，在這方面終究還是不能自持。」

布雷先生個子不高，又瘦又謙恭，所以當他和一群人在一起時，幾乎看不到他。他也不求名利，委員長對他十分信任，許多場合他都代表委員長出席。當時除委員長的話外，大家對他所說的話最是尊崇。布雷先生在侍從室擔任第二處主任，因要替委員長寫文章，故常菸不離手，一支接一支地抽。到了晚上寫文章時，更是抽得特別厲害，所以夫人經常由國外帶香菸回來送他。每逢三節，夫人還會送菜及布雷先生喜歡吃的茶葉給他，到黃山避暑時也都會帶著他去。

據我了解，布雷先生寫的文章和張曉峰先生不一樣，布雷先生寫文章較快，且字較大，曉峰先生的字非常小。和曉峰先生的文章比起來，委員長也比較喜歡布雷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他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兩句，是最爲人所知曉的。不過委員長在重用布雷先生以前，許多重要文章都同時找好幾個人一起寫，但最後仍多採用布雷先生的文章，因為旁人寫的都不合他的胃口。

布雷先生很少穿西裝，大都穿著中式的灰長衫。他平常也很少高聲言語，對人十分客氣。我了解他很多，對他家人也有不少了解，因為布雷先生不舒服時都是我去看的病，所以我和他家裡也很熟。他晚上睡覺容易失眠，大概是因為晚上常寫文章，壓力沈重的緣故，所以他經常憂心忡忡，晚上需靠安眠藥才能睡覺。且因他香菸抽得多，所以經常咳嗽，他的安眠藥與咳嗽藥是常不離身的。

布雷先生平常東西吃得很少，應酬也不大參加，是個很節儉與簡樸的人。他雖然很少參加應酬，但是許多重要會議幾乎都要他參與，而他的意見往往也爲委員長所採納，委員長的許多話也經常由他來傳達。他最高曾任中央黨部副祕書長，另除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外，也曾擔任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他乃前台北市副市長陳師孟的祖父，也有

一個女兒是共產黨員。^{①⑦}

委員長離開重慶前所發表的演講與文章，差不多都出自布雷先生之手。委員長要對外發表演講或文章，習慣上都先把布雷先生叫進去，給他一些小條子，上頭寫的都是委員長所想表達的意思，加以解釋後便交由布雷先生將其寫成文章。但委員長對將要發表的東西，也不是別人寫好就算數的，他經常要更改文句，改完第一遍後再交還布雷先生，布雷先生交予祕書抄整後再將文章改順，然後再呈委員長；此時委員長經常會再改，然後再送下，祕書再抄整，布雷先生再改，呈上後委員長再更動。因此每次委員長所發表的文章，常是一改再改的結果，有時甚至已到付印時，委員長還打電話表示要再改兩個字，於是只好再把文章抽回來。

秦孝公最聰明，他把文章呈上後一定坐在總統書房外的武官室，武官對他說：「您文章都送了，應該可以走了。請回祕書室休息吧。」孝公便回答道：「不用，我想委員長一下子就會再找我了。」果不其然，委員長沒多久又找他進去。

布雷先生的一生由於完全接觸到政治核心，故對於共產黨的抗爭與其他不合理的事也知之最詳，因此他對國家前途總憂心如焚，但又沒有力量左右政局。最後他決定以死報黨，就在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布雷先生對其夫人說：「今天晚上我要休息，你們不要敲門吵我，我想多吃點安眠藥好好睡一覺，明天還有很多事要辦。」他先向家裡人交代好，然後吃下整整兩瓶安眠藥自殺。他死的那天早上，他夫

^{①⑦} 陳布雷有兄弟訓正、訓慈、訓念（叔兌）等人，子女則有遲（積泉）、過（積皋）、適（積皓）、琇（細兒）、璉（憐兒）、邁（積塏）、遂（積明）、遠（積樂）等八人。前四人為陳布雷與楊夫人所生，後四人為陳布雷與王夫人（允默）所生。陳師孟則為遲之子，為台大經濟學教授。

人打電話給我，說家裡發生重大事件，請我快點去。因為他夫人從不會那樣打電話給我，所以我很快地便趕去了。到了以後我才發現：布雷先生早在半夜便已過世，且留下一封遺書給委員長。布雷先生在遺書中再三聲明：假使萬一發現他還有一點氣時，絕對不能救他。但事實上當我們發現他時，他早已氣絕多時。他死後將身邊的東西也做了分配，每樣東西要送什麼人都寫好交代。他送我一只打火機及一個朱砂色的圖章印盒，我在大陸上留了很久，後來撤退到台灣便沒帶出來。

除了布雷先生外，陳方先生也是委員長旗下的一員大將。此人以畫竹聞名，文筆也好，很喜歡吃酒和交朋友。陶希聖先生曾經兼任中央日報總主筆，他的文筆也頗受委員長青睞，布雷先生有些文章也由他幫忙寫，寫完後讓布雷先生改過即呈給委員長，委員長往往也很滿意。所以有時候委員長覺得布雷先生很辛苦，就改找陶希聖先生寫文章，但總會交代陶先生寫完後拿給布雷先生看過。

陶先生與布雷先生在個性上有著極大不同。布雷先生不苟言笑，陶先生則十分幽默風趣，講話時肢體動作甚多，我們經常嘻嘻哈哈鬧在一塊。陶先生的笑話很多，我記得有一回他向周宏濤先生抱怨，表示他要上黃山找委員長時，在重慶坐划船渡河總要耽誤很多時間。周宏濤先生聽他這麼抱怨，便問他：「你為什麼不坐汽艇呢？」陶先生說：「他們都不理我，我怎麼坐？」因為那時周宏濤先生是委員長的機要祕書，在委員長身邊跟前跟後，每個人都認得他，故只要他一來，汽艇早準備好等他上船；可是陶先生當時官職雖高，卻無人識得，故他來時汽艇人員都不理他，他只有坐划船渡河。如今聽陶先生如此說，周先生便道：「好，下次我們兩個一塊走。」於是兩人約好一起到渡口，因為周先生也在，所以汽艇便來了。一上艇時，周先生故意把陶先生的皮包夾在腋下，彎腰鞠躬，嘴上還很恭敬地說：「陶先生，您請您請。」

陶先生就大搖大擺地走上艇去，周先生則挾著陶先生的皮包，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汽艇人員一看，發現這個人不得了，竟比周先生還大。此後陶先生渡河便有汽艇坐了。

另外還有個笑話。一回在成都軍校時，因情勢緊張，外面都被劉文輝的部隊包圍了。當時先總統、曹聖芬、我和陶希聖四人都在軍校裡，大家都很緊張，不曉得會不會發生事情。於是軍校方面便發給我和曹、陶三人每人一支槍自衛，但我說：「我不會用槍，所以我不要。」那時陶先生與曹先生兩人提議：「既然我們有槍，就試試看，學學這槍怎麼用。」於是我們三個便到靶場去試槍。靶場離我們住的地方很近，走沒多久就到了。在路上陶先生說：「你們注意了，假如路上發生事情，若我沒開槍，你們也不要開槍，我比你們有經驗得多，我知道在什麼情形下才應該開槍。」我倆都說好，然後跟著他後面走。到了靶場後，他們兩位便對準紅心，準備同時試打。因在發槍時軍校方面並未發給子彈，所以大家都認為子彈應該已經裝好在彈匣，然而兩人開槍後居然發現一點槍聲也無，正覺得奇怪時，正好靶場附近有個哨兵，於是趨前一問才發現：原來軍校方面給的只是玩具模型槍，目的只是要使我們安心。

肆、委員長夫婦家居生活

委員長與夫人在重慶的臥室，是兩張大床並排在一起，再以一張大蚊帳將兩張床罩住。床的旁邊是一間起居室，裡頭有兩個大櫃子，一個放委員長的衣服，另一個則放夫人的。臥室外分成兩間辦公室，委員長與夫人各一間，他倆白天各辦各的公，夜晚上床睡覺時間亦南轅北轍。委員長晚間九、十點便上床，夫人則不到一、兩點不會睡覺；

早晨委員長約六點多鐘即起床，夫人不到十一點鐘不會起床。他倆的生活方式一中一西，上下床時間全然不同，但兩人上下床都輕手輕腳，誰也不吵誰。

我在重慶那段時間與委員長接觸不多，但仍知道周圍的情形。當時重慶市面還很安定，沒聽過什麼搶案、失火，或示威等情事。交通工具有轎子、三輪車與公車，因重慶是山城，所以腳踏車不能走，委員長到黃山均乘轎子。委員長在黃山的房子座落於山頂，是座不頂豪華的木屋，四周環境十分安靜。而委員長在四川的轎子習慣上都有三個轎夫，其中兩人抬轎一人換班。故委員長要由重慶上黃山，需先搭乘汽輪至長江彼岸的南安，再換搭汽車到黃山官邸，然後乘轎上山頂木屋，約需走八、九十階梯子。

由於委員長與夫人在重慶時，有許多時候均需用轎，故在官邸裡確實有一頂專用轎子。當他們要上廬山時，也經常坐轎上去。但來台後，除了到復興鄉角板山之外，那頂轎子便很少用了。過去在四川坐兩人抬的轎子是很平常的事，因為四川多山，轎子是最平常的交通工具，故有「滑竿」的出現。不過委員長坐的轎子比滑竿好的地方是：他的轎有蓋可遮雨，還有簾可遮擋轎內的人，讓外面的人看不見，此外均與一般滑竿相同，是種前後兩人抬兩根竹竿，當中有把椅子可坐的簡式轎，與花轎並不相同。抬轎的轎夫也都是經過專業訓練的，他們絕對不會滑跤，因為一滑跤便沒面子了。他們很穩當地上下梯，踩得很穩，我從未見過有哪個轎夫跌跤過。一頂轎共有兩個轎夫，前後各一。有趣的是：他們在抬轎時還會彼此相呼應，若前面轎夫看見道路很滑，便呼曰：「滑得很。」後面轎夫聽了即答稱：「踩得穩。」而前面轎夫若看見路上積水，便先提醒：「前面亮光光。」後面轎夫聽了便答道：「後面水噹噹。」當前面轎夫說：「兩邊有（意指兩邊都有人）。」

後面便應：「中間走。」這樣一問一答，除有交通警示作用外，也表示後面轎夫聽到警示。且因都是押韻的句子，故十分有趣。

抗戰時四川交通可通印、緬，每回只要有人出去，大夥兒便託他買些 OMEGA 錶回來，在當時這已是極好的錶。當時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公車、轎子或腳力，不過委員長自己用了轎後，市面上的轎子便漸少了，因為委員長認為轎子是種很浪費人力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力修築馬路，提倡單人拉的黃包車（又稱人力車）。當時汽車很少，走遠路全靠公車，不過那時的公車是燒煤炭的，經常會拋錨。

委員長很重視運動，每天要散步三次（早餐後、午覺後及晚飯前）。晚上散步通常是坐車出去，到黃山風景好的地方走段路。有一次發生一件趣事：因黃山上有個空軍基地，雖然山上馬路並不寬，但基地裡的卡車卻開得很快，使得路上揚起很多灰塵，也不管路旁的行人。有一回正巧委員長在路旁散步，他一看到卡車駕駛開得那樣快，便叫卡車停下來，然而那些卡車司機平常便不管別人，所以根本不理會委員長，照樣高速通過。卡車繼續向前行駛，遇到走在委員長之前的中將級侍衛組高級人員，這些高級人員一看到卡車這樣橫行霸道，竟不理會委員長喊停，便舉雙手意圖攔下那輛卡車，誰知那卡車司機非但不停，還吐了一口痰在高級人員臉上。卡車司機隨後又遇到一些武裝人員，此時他一看情況有些不對，便趕緊下車逃逸，連車子也不要了。

委員長和夫人常出外野餐，且每回都請一位客人一起乘轎前去。有一回他們到廬山野餐，請我一起去，我那時的階級是中校，另外一位陪侍委員長身邊的侍衛官則是中將，不料那一次那位中將沒轎子坐，我一個中校反而有轎子坐。於是我只好下來陪他一起走，不料這一走便走了兩個鐘頭才抵達野餐目的地，因為夫人喜歡到很遠的地方野餐。夫人偶爾還會攜帶出遊用的簡單爐子，做些蛋炒飯來野餐。



民國卅六年熊丸與蔣公夫婦攝於廬山五老峰頂。

重慶時代，委員長夫婦幾乎每週都要上黃山，而戴季陶、陳布雷、吳稚暉等先生也常跟著住在山上。委員長很喜歡看遠方，既樂山又樂水。他也常在郊外詢問吳稚暉先生等人對國家大事的意見。週末時刻他常在郊外，平常時候則多在官邸，沒什麼多大變化。直到日本人攻下安順後，有一天委員長突然不睡午覺，要車子載他到重慶郊外去。那天他到重慶郊外一片人跡罕至的田野，下車後拿了柺杖在田地當中來回地走，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後來我們才知道他那時正在考慮遷都的問題，因為那時日本人已經攻下安順，安順離四川很近，所以很多人建議遷都西昌，委員長在田野裡考慮過後，便決定死守重慶。

這個難關一過，其他的事便都不是難關。爾後日本人即節節敗退，

飛機、轟炸也都不來了。但在那之前，日本人的轟炸十分頻繁。我還記得有一回在黃山，日本人的飛機又來轟炸，當時委員長正在黃山居所陽台外吃午餐，飛機已到頭頂，委員長卻不肯進防空洞。因為委員長的居所就在黃山山邊，炸彈一丟丟得不準，正好落到崖下去，卻炸傷崖下的一位平民。那次炸彈丟的位置離委員長居所很近，雖然最後沒有造成委員長的任何傷害，但情況真是危險極了。

當時重慶遭到日軍轟炸，許多地方都起了火。過去當地的建築並不好，日本人又多投燒夷彈，房屋一起火後，往往得燒個大半天才救得了。我們那時在黃山，經常看見重慶城裡一片片火團。當時的物價倒不怎麼漲，不過米卻最值錢。當時我們領的是薪水，還可配給到一點米，我記得一旦將米拿去換錢，還可以換到比薪水多的錢。所以那時有田地的人都很富有，房子因為轟炸的關係反而不值錢。

四川各種重要物資都有，所以日常生活物資如鹽、米、糖、魚、肉等尚不虞匱乏，但奢侈物品如牙膏、牙刷等均較稀少。不過那時大家都很儉樸，即使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壞，大家也都無所謂，每個人心中彷彿都存著幾許抗戰勝利的希望。所以在當時，共產黨雖然在暗地裡坐大，但表面上看來，社會治安、物價、物資、兵源等均不成問題，民心十分穩固。一言以蔽之，當時的社會情形便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伍、抗戰勝利

民國卅四年八月，美軍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分別投下原子彈，日本決定投降，我國對日八年抗戰至此方告結束。勝利來臨後，中國變成一個大強國，不平等條約全部取消，台灣、澎湖均收回，一切勝利使

得委員長自信增強，很多時候變得不大聽勸。此外，因勝利來得太突然，政府在事前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派出去接收失土的人員並未經過慎選，全憑他人推薦與委員長個人喜好派遣。例如錢大鈞接收上海，陳儀（公俠）接收台灣，便可能是兩個大錯。錢大鈞是個愛錢的人，人們都說他是「錢大鈞，鈞大錢」；而陳儀又是個軍閥，所以台灣才會發生像「二二八」那樣的大禍。一下子「接收」竟成了「劫收」，中央政府頓失民心，使得共產黨有機可乘地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大肆攻擊，於是孔祥熙（庸之）被逼退下野，連帶地使政府法幣也出了問題。

民國卅七年五月，蔣委員長當選中華民國首屆總統，那時我已是他的專屬侍從醫官，全權負責蔣總統的健康問題。當時總統要參加任何會議，都會先詢問我當天的健康情形再做決定，所以有時總統會否準時參加某一會議，底下的人因不敢請示，便先打電話來問我。我那時不但要負責總統個人的健康，連總統身邊的重要人士如戴傳賢、陳布雷、吳稚暉、何應欽等，總統也會要我去看，一方面是去替他們看診，另一方面也表示總統的關懷之意。所以我那時每天工作都很忙，不但要忙總統的健康，還要替他做親善工作。

那時總統每次搭飛機出去，共有三架飛機一起飛。第一架是先前機；第二架是座機美齡號，共可搭載十一人，包括總統、夫人、侍衛長、武官與副官，有時還有吳國楨（峙之）、黃少谷等人；第三架則是隨從機，搭載侍衛官、侍衛，及行李鋪蓋等。我原本都坐隨從機，後來總統交代我也搭乘坐機，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因朝夕相處，我對他的了解也很深。

在那段時間裡，我發現總統確實十分辛苦，幾乎每晚都睡不好。共產黨愈鬧愈厲害，美國人卻愈來愈不幫忙。夫人那時表示要到美國，一方面讓美國了解我們的情形，另一方面則是求援。當時徐蚌會戰已



民國卅七年，熊丸隨蔣公登阿里山觀賞日出。

敗，情勢十分危急，總統便答應夫人的建議，讓她到美國去。直到出發的前一天晚上，總統才吩咐我隨夫人一起去，我因毫無準備，一下子腦筋也轉不過來，便回答總統道：「報告總統，現在這個時機並不方便隨便找人接替我的工作，假使我和夫人一起走了，這裡就沒人了。」總統那時一楞，還沒來得及想，夫人便說：「達，^⑮我看不用這樣，我在美國還有醫生可以照顧我，熊醫官在這兒很重要，還是讓他留在你這邊吧。」於是總統問我：「你的意思呢？」我說：「我要留在這兒。夫人在美國還有哥倫比亞大學的醫生可找，且真有需要時，我臨時去也來得及。」於是我便未隨夫人一起去。如今回想往事，這幾句話對總統的影響究竟多大我不清楚，但對我個人的影響卻很大。假使當時我和夫人一起走了，也許我自己便會待在美國不回來，就在美國醫院待下去，對以後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也都不會參與。所以當時我若真去了美國，將來是否還能把我的家人由四川接到台灣定居，都還在未定之天。當時一念之間做出那樣的決定，對我一生的影響確實很大。

那段期間我與總統十分接近，也發現他對國家局勢與人事實在擔了許多心，晚上皆需依靠藥物幫忙才睡得著。後來國家情勢愈來愈亂，我們那時還不太能了解局勢到底壞到什麼程度，只曉得總統處理政事十分辛苦，我也只能好好地照顧他的個人健康。

⑮ 委員長與夫人間的暱稱，即英文“達令”（darling）之簡稱。

第四章 蔣公下野與政府遷臺

壹、蔣公下野

民國卅八年元月陰曆年前，周宏濤秘書突然對我說：「你曉不曉得劉文輝明天要回成都過年？他有專機回川。」當時因情勢不好，我把家眷都送回四川，獨自一人留在南京，所以聽到宏濤那樣說，我靈機一動即隨便寫了份簡短報告給總統，表明想請假六天，順道搭劉文輝的專機回重慶看母親與家人，並一起過年。那時因為劉瑞恆（月如）先生還在南京，總統若有什麼特殊事情，中央醫院的醫師還可為他處理，而且總統身體還很好，所以我請假一週應該還沒關係。總統很快就批准，第二天我便隨劉文輝的飛機離開。

當飛機飛抵四川時，劉文輝說他要先在成都待一天，然後才到重慶，我因搭他便機，只好先隨他到成都。待我返抵重慶汪山家門時，已是年卅的早上，家人都沒想到我那年還可回家一起過年。然而就在當天中午，重慶市警局局長陳善周（曾任官邸警衛室副主任，與我家很熟）卻突然跑到我家，因他接到曹聖芬秘書拍來的電報，要我馬上去溪口。我說：「為什麼要我去溪口？」他說：「總統已下野至溪口。」我說：「可是我才剛到家。」陳善周說：「你自己決定吧。」於是我說：「我不管，聖芬的電報可能只是他的揣測之詞，我要等過了年初一或初二才走。」當晚，當我在家吃完年飯，半夜警局又來了份電報，這次是

俞濟時拍來的正式電報，裡面寫著：「希急來，專機來溪口。」這等於是命令，我只好初一早上就走。

初一一早，內人送我到機場，還替我用盒子帶了過年用的臘肉與雞腿。到機場時已有一架軍用飛機在那兒等我，當時因為空軍人員去吃飯，我便叫內人不要等了，先回去陪母親吃飯。內人搭車走後，空軍人員才來說：「飛機有點問題，發不動，恐怕要明天才能修。」後來我才知道是那位飛行員想待在那兒過年，才託詞飛機出問題。我從家裡搭來的車子已經離開，要再返家也回不去，加之我家到機場路程迢遙，我只好在機場附近臨時找間棧房（最低級的旅社），將就草蓆和衣而睡。誰知第二天搭機起程，才飛到漢口，那飛行員又說：「今天飛機還是有點問題，我們先在武漢過夜。」事後我才知道他是在武漢裝銀元，因為武漢的銀元裝到上海還可賣到好價錢。我沒辦法，只好在武漢再過一夜。

武漢那時有個和成銀行，銀行經理趙任安是我在重慶時代的好友，我在武漢沒別地方去，只好去找他。到了和成銀行後，我才發現他太太生病住院，於是又轉到醫院去找他。我和他太太也熟，所以在醫院和他們聊了很多，記得當時趙任安對我說：「丸弟，我們是多年好友，所以我要跟你講幾句心裡話。你是個醫生，跟總統也很多年，你已經做了你該做的。現在總統已經下野，你還到溪口做什麼？不如就留下來，我負責幫你開家診所，你又不是做政治的人，就別再回總統身邊，去淌那趟混水了！」他說得非常動聽，可我仔細想想：我到重慶是請假出來的，就算真的要走，也要講清楚再走。所以我告訴他：「我既未辭職也沒請假，這樣便走實在不是做人的道理。你的一番好意我知道，不過還是等我回到溪口，看看情形辭職再回來吧！」由於我的堅持，他也沒什麼意見，便好好招待我吃了頓飯，休息一下，第二天又派車送

我至機場。後來有段時間我兼總統祕書，所有報紙及空軍無線電廣播內容都送到我這兒，我才發現趙任安被發表為華中經濟指導部部長，原來他也是共產黨員，難怪當時會對我說那些話。雖然他也是衷心之言，卻仍舊沒有講穿，但這些都是後話。

當天晚上我甫抵溪口，聖芬便告訴我：「你快點上去吧，總統已經在問你了。」於是我趕緊上樓向總統報到，總統也沒說什麼，便叫我去休息。我在溪口與夏功權同住一房，他那時是總統身邊唯一的武官，兼總務工作。那時侍衛長仍是俞濟時，其他一起在溪口的尚有經國先生、周宏濤、沈昌煥、于豪章及周菊村。和功權住一間房，我還記得他是個勤快的人，每天早上起床後一定擦皮鞋，順便把我的皮鞋也擦得很亮。我對他說：「沒想到你還會擦皮鞋啊？」他說：「我豈只會擦皮鞋，你看你桌上是什麼？」我才發現桌上有杯熱可可，沖得既漂亮又好喝。當時溪口就只有那麼一盒可可，我倆都偷偷地喝。

貳、溪口歲月

總統下野後，在溪口仍以總裁身份見客。之前陳儀在台灣惹出「二二八事件」，所以總裁要聖芬到廣州見閻錫山（伯川），要閻赴台處理二二八善後之事。閻錫山那時擔任行政院長，但他不聽李宗仁的話，事事請示溪口的總裁，所以那時在溪口，時時刻刻都有情報傳回來。聖芬因平常要處理很多新聞祕書事務，所以行前總裁便問聖芬說：「你走了以後，你的工作怎麼辦？」聖芬說：「請熊醫官接辦好了。」總裁說：「好，可以。」所以後來我除了醫官外，還兼任新聞祕書職務，主要工作即是陪總裁見客，處理新聞及廣播資料。

兼任新聞祕書職時，我發現總裁每天都自己翻閱報紙，當時我心

裡想：「他那樣看報紙，有時心裡還想旁的事，也許也不知道哪些消息重要，而哪些不重要。爲什麼我不幫他一點忙呢？」所以我便拿了支紅筆，把我認爲重要的新聞替總裁劃起來，但劃了兩天後，由於我覺得有些累了不想劃，便直接把報紙送進去，沒想到那天報紙居然被退回來，總裁說：「報紙爲何沒劃紅線了呢？」這下我替聖芬找了麻煩。從此後，給總裁看的報紙都需事先劃好紅線。

我開始劃報後，因爲當時報紙消息較慢，空軍方面時常爲我送來無線電消息，所以我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共方資訊，諸如我方有哪些軍起義，哪位軍長投降，又有哪位軍長與共軍合作，許多名字都是我很熟悉的。一些總裁平常認爲忠誠者竟然叛變，而總裁認爲善戰者竟與共軍合作，反倒是一些總裁不重用的人都殉了職。我這才發現：「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真是一點不假。當時我有很多感慨，便把那些起義、殉職名單，全部抄在一張紙上，連同劃好線的報紙一起呈給總裁。但這又爲聖芬添了另一項麻煩，因爲第二天沒那張紙時，總裁又說：「另一張紙呢？」故我只好天天抄天天送，抄得心裡著實也有些難過。副官們也告訴我，總裁每次拿到那張紙都唉聲嘆氣，所以過後總裁到了台灣，第一件事便是將自己重新改造，整個觀念也全部改變。

溪口時代，正是總裁與經國先生討論來台後如何改造黨政軍之時。大陸丟的時候，總裁看到我方陣營的人，不是投降便是倒戈，感觸當然很深。所以當他撤退來台時，必然是痛定思痛要進行改造，不但要改造黨，還要改造軍。以他和經國先生在溪口的計劃爲基礎，故一到台北馬上成立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對部隊裡的人事也都親自了解。他深入部隊的原因，正是爲了準備反攻，所以也真是用心良苦。

在溪口那段日子，總裁幾乎天天回到兒時走過的地方。其中有個地方名「金峨寺」，廟裡的人請我們吃飯，擺出一桌菜全是各類筍子，

包括炒筍子、煮筍子、燜筍子、油炸筍子等。因為當地產筍，廟裡都是竹桌、竹椅等竹製品。然而自那次吃了太多筍子後，我到現在都還不太喜歡吃筍子。

爾後聖芬回來，我把新聞祕書職務交還給他。民國卅八年四月廿一日，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叛變，共軍陳毅（仲宏）部渡過長江。次日總裁與何應欽（敬之）、張群（岳軍）、吳忠信（禮卿）、王世杰（雪艇）等會於杭州。廿三日國軍退出南京，此時總裁也準備離開溪口。我們在溪口三個月中與經國先生朝夕相處，平時聊聊天所以很熟，他還曾經送過我好幾支派克筆。在溪口期間，張治中（文白）曾來見總裁，李宗仁也曾託人帶信，希望總裁出國，沒料到後來是李宗仁自己出了國。

我還記得那時在溪口，菜都開得很壞，我們那一桌八位坐的都算是最高級的官員，但八個人卻只吃四樣菜，且每頓幾乎必吃「鹹箕」（即鹹菜，醃青菜）。到了台灣以後，有一回在總統生日席上，總統突然問我：「熊醫官，在溪口時他們招待得好不好呀？」我回答：「很好呀，我們頓頓都吃『雞』。」總統說：「那不錯呀，頓頓都吃雞。」夫人當時便笑說：「你曉得那是什麼雞嗎？是『鹹箕』呀！」

在溪口時大家根本都沒錢，那時我因從家裡帶了些錢，所以有時早上會買些油條回來。當時早上能吃到油條，已經是最好的菜了，而大家吃早餐時多了兩根油條，對我也都十分感謝。那時根本連薪水都發不出來，爾後財務署署長吳嵩慶為我們帶了銀元來溪口發餉，我記得那時我拿到兩百大頭，和聖芬各拿了一百大頭託張岳公替我們帶回四川家裡，不料事後才發現那筆錢他根本沒幫我們帶到。

參、輾轉撤退

我們離開溪口後就上了太康艦，當時太康艦艦長是黎玉璽（薪傳）。太康艦離開溪口後一直在海上漂，因為總統決定守住海南、大陳等島嶼，故先於艦上探勘攻守位置及情勢。我們在海上巡遊一個多月，完全上不了陸，也接不到信，^①之後又回到上海。上岸後總統的心情很沈重，當時有很多人勸他：「共產黨已經到了某某地方，上海已不能住了，要趕快退到台灣才行。」但他就是不走，不願撤退到台灣，甚至到胃病都發了他還是不走，堅持死守上海。我不能到外面替他找醫生，故只好找些藥給他吃，看得出他的心情真的非常沈重。最後還是陳誠的電報讓他離開上海，因辭公在電報中說：「我在台灣十分安定，而且深得人心。希望總統快到台灣安排與指揮，將來還可由台灣反攻。」這個消息終於打動了總統，所以他才決定離開上海。

我們離開上海後先飛廣州，那時重慶還沒丟。到了廣州後，雖然總統一人還在那兒憂心忡忡，但因大家已許久不知肉味，故決定去吃廣州最有名的炸鴿子。我和曹聖芬、周宏濤等跑到一家餐廳吃鴿子，去後才發現黃少谷、谷正綱等也都來了，大家便在一起吃。吃完之後，因為少老說要請客，於是我們便在外頭等他結帳，不料等了好久他都沒出來。谷正綱先生於是猜道少老可能錢沒帶夠，進去看看才發現果真如此。因為我們那餐鴿子一共吃了一百多銀元，而少老身上只有一百銀元，幸好谷正綱先生過去把錢付清，少老才得以退出。那時一塊

^① 我與內子李忠慧在抗日勝利時匆匆結婚，以後跟隨蔣委員長而聚少離多，這次海上巡遊，明知她快生產，也不知是男是女。

銀元等於三塊美金，所以一百多銀元可是十分值錢的。

到廣州之前，總統在重慶便已經找雲南的盧漢（永衡）來，但盧漢不肯來，因為他怕總統不放他走。當時總統便派經國先生到雲南去，要經國先生住在昆明，只要盧漢一天不回昆明，經國先生便不許離開。換句話說，經國先生等於到昆明當人質，所以盧漢才來。盧漢來了以後，總統對他也很有客氣，然事實上盧漢那時已經變節，與共產黨接觸很多，但總統依舊不甘心，因為雲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後來總統決定親赴雲南，盧漢知道後提出一個條件，表示總統要到雲南可以，但身邊不要帶太多人。總統也答應他的要求，於是便帶著我、武官夏功權，及少數警衛人員搭機到雲南，可說單槍匹馬赴會。我們當時雖未事先聽說那次行程將有危險，但由事前計劃的警衛森嚴，且每名警衛均佩帶雙槍來看，也可判定情況十分緊張。

到了昆明以後，總統吩咐座機停在原地不能熄火，以便隨時準備起飛，功權則寸步不離地緊跟著總統。爾後盧漢出來迎接，總統與盧漢一起走在前面，功權則緊跟在盧漢後面，以防盧漢有任何不軌動作。那次除了總統、功權及少數警衛外，其他人均只獲准待在機場，中午就在機場吃便餐。

總統下機與盧漢會談約兩小時後，盧漢又送總統回機場，最後我們還是平安離開。但事後我才知道：當時機場附近全是迫擊砲，他們原本計劃：只要盧漢一聲令下，那些迫擊砲便可將整架飛機摧毀，再將總統扣留，交給共產黨。但盧漢卻沒這樣做，因為他當時看到總統樣子十分威嚴，故不敢妄動，只好戰戰兢兢地陪著總統談話，始終不敢下暗號。直到他把總統送回機場，總統一直都是談笑自若，若無其事的樣子。所以第二天張岳公到雲南時，盧漢便把全部怒氣全出在岳公身上，扣留岳公，把其他人全殺了。最後還是因為岳公原對盧漢有

恩，盧漢下不了手，才放岳公脫險回來。所以之前我們陪總統到雲南，還真是一場驚險之旅。

另一項驚險卻溫馨的遭遇，則與蔣夫人有關。民國卅一年夫人隨同委員長到印度開會，會後準備返回重慶。回程飛機飛離印度未幾，機師便來報稱座機周圍有日本飛機，可能委員長行蹤已讓敵人發現，故需採取緊急低飛措施，以使敵機不易抓到目標。當時機上同時準備降落傘，但將人數一算，卻發現降落傘不夠用，於是夫人的貼身佣人蔡媽便沒分到降落傘。那時夫人告訴蔡媽：「這樣好了，假使等會兒真的需要用到降落傘，你就抱緊我的腿，這樣便可平安降落。」當時蔡媽立刻對夫人說：「如果真到那時候，我絕不抱您的腿，讓您平安下降，我絕不拖累您。」夫人聽了很感動。後來座機低飛後，由於先遣機並未採取低飛措施，日本敵機跟著先遣機追去，而未認出委員長座機，最後一行人總算平安回到重慶。爾後夫人便對蔡媽很好，因為覺得她很忠心，很多事也都不與她計較。蔡媽約於十數年前以六十多歲死於台北，她比夫人年輕，是夫人在上海時就極信任的貼身佣人。

肆、剿共失利因素研判

抗戰勝利後，剿共失利的因素有很多，但就我了解，其中包括幾項重要因素。第一是經濟因素，本來在抗戰時期國家之所以尚稱安定，全靠穩當的法幣制度。當時社會整體經濟還算穩定，以後改行金圓券^{②①}

②① 民國卅七年八月十九日，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實行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收兌法幣及金銀外幣（法幣三百萬元折合金圓一圓，金圓二圓折合銀幣一圓，金圓四圓折合美鈔一圓），登記外匯資產，加強管制經濟。公教人員待遇以四十元為基數，四十元以上分別二折一折。

與銀圓券，社會經濟即變得一蹋糊塗。我記得那時總統到馬鞍山避暑，找徐柏園先生談金圓券改銀圓券之事，市面上的物價在當時只能以「一夕數變」來形容。當時經國先生到上海打老虎，^②打得所有公司都把物資藏起，在奇貨可居的情況下，市面上都沒有東西可買，每個人都要物資而不要錢，最後還到了拿金子發餉的地步。整體社會經濟的不穩定，使得中央政府大失民心，共黨勢力也因此有機可乘。

第二，當時陳辭公採納馬歇爾的建議，將部隊精簡。但裁兵的結果，使得許多軍長突然降為師長，師長又變成團長，以致部隊士氣大降，造成許多人員投共，敵我勢力大幅消長。共黨那時尚在東北接收許多日本人留下來的武器，我方戰況自然容易潰不成軍，未戰先逃。

還有一項極重要的原因是，那時總統身邊充斥太多共黨間諜。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分別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大匪諜，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麼總統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於是徐州當地幾個重要指揮官便稍加變通，提早進攻時間，作戰結果才算順利。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總統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總統劉即是匪諜，故直到最後證實劉是匪諜時，總統連想都沒想到。

此外，羅澤閔也是共黨派來的間諜。當初如果沒有這些人，我方根本不會如此慘敗。政府播遷來台時，人民根本無從得知身邊親人有哪些是共產黨，因而形成彼此猜疑的局面，大家都沒了信賴感。直到

^② 民國卅七年八月廿一日，蔣中正電各省市府，曉示政府改革幣制、穩定經濟決心，命切實執行。並派俞鴻鈞及蔣經國、張厲生及王撫洲、宋子文及霍寶樹等，為上海、天津、廣州各區經濟管制督導員。



蔣公夫婦在廬山合影。後排左起：羅澤闓、許處長、鄒祖琛、熊丸。

現在，台北還有四千位共產黨員，但誰曉得自己的朋友中誰是誰不是？以前有位總統親信的內衛股中校股長，專門指揮總統身邊事務，且治軍嚴謹，大家都認為他很能幹，後來才發現他也是共產黨。還有一次，夫人向我表示她需要一名護士，要我幫她選個好一點的人去，於是我選了醫院裡一位能幹的護士長，不料在還沒進官邸的前一天，護士長即已被捕，原來她竟是蘇俄方面派來的國際共黨份子，真令人想像不到。

過去戴笠先生在的時候，我方情報做得很好，總統對戴先生也信任有加，交代戴先生進辦公室時可不需通報。戴笠當初受到總統賞識，乃因有一回他親筆寫了一份情報呈給蔣委員長，那時侍衛長是王世和，

王世和看戴先生只不過是個小小參謀，哪有資格呈報委員長，便把戴先生寫的報告丟在一旁。戴先生沒辦法，只好另外想法子，和副官們打交道，請副官幫忙把報告呈給委員長。然而副官們哪敢把東西隨便呈上，只有一位施副官是個老好人，他幫戴先生把東西放在委員長辦公室。不料委員長看到那份報告後大吃一驚，便要左右找出寫報告的人，事發之後施副官先交代戴先生，要他一定要認罪，戴先生也應允。結果戴先生進去後，委員長便要他日後隨時供應情報，且無需通報即可進入委員長辦公室。爾後戴先生的情報愈來愈多，事後也都證明是事實，因為他在共方組織裡埋伏多人，我方情報系統全需仰賴他。戴先生後因飛機失事而去世，^②他死後我方在共黨組織裡的所有耳目便全數斷線，之後經國先生自己掌管情報系統。

伍、政府遷台

民國卅八年十二月，國民政府正式遷台，總統連任國民黨總裁，並兼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國防研究院及革命實踐研究院院長。總統剛到台灣時，住在陽明山空軍新生社裡，後因陳辭公修建士林官邸，總統與夫人才住進士林。爾後總統自己修了中興賓館，他很喜歡那個地方，經常到那兒小住。我在那兒也有自己的房間，大門進去右轉的大房間便是我的辦公室。總統房間則在二樓左手邊，二樓右手邊的房間是總統與夫人特地留給孔夫人（宋靄齡）的，以後孔二小姐便住在那

^② 民國卅五年三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自青島飛抵南京上空，於岱山失事殉職，時年五十歲。戴笠死後，台北方面以其字「雨農」為路命名來紀念他。

兒，而把當中的正房留給孔夫人。但我住在中興賓館總覺得裡頭陰颼颼的，因為山上風聲之大有如鬼哭神號，每晚都像刮颱風似的。由於中興賓館位於陽明山一座山口，風正好由屋旁吹過，風聲特別大。總統很喜歡那棟房子，因為那裡確實景色秀麗，但住那兒對他的健康卻真的很不利。

陸、來台工作情形

過去我陪總統去過金門多次，他很喜歡金門，因為那兒桃花開得很美，空氣也很清新，經國先生也很喜歡那兒。民國四十七年「八二



經國先生（左二）與蔣孝武（左一）、熊丸（左三）等人攝於金門。

三砲戰」前一晚，我還陪同總統在金門，那時我們天天由台北飛金門辦公，不料次日共方弄錯情報，以為總統還在金門，所以發動砲戰。我在金門住在一位副司令的房間，砲戰過後我們回金門去看，發現我住的地方浴缸裡正好有一枚砲彈，假使那天我在那兒洗澡，砲彈便正好落在我身上。砲戰過後，有兩位副司令官都死在那裡，因為砲戰發生時他們正在那裡開會，俞大維部長那天到得晚，胡璉也陪他到得晚，所以他倆才逃過一劫！

其實在我的觀念裡，身為醫生最好留在醫院裡，才能隨時學到東西，所以我跟著先總統到澎湖去時，便到澎湖省立醫院參與開刀。當時我感到在省立醫院不錯，所以從澎湖回台北後，某日正好陳辭公來官邸，我便向辭公表示：「假使有機會的話，我想到省立台北醫院去。」陳辭公聽後便與經國先生商量，經國先生也很同意我的想法，便問我想到陸軍總醫院或省立台北醫院，且因我當時軍階已是上校，過去在大陸上的臨床經驗也夠，故可以為我安插副院長職。我選擇了省立台北醫院，並在那兒當了兩、三年副院長，後因原任院長不擅行政事務，故將我升為院長，我一做就是十餘年。雖然當時我兼任省立台北醫院院長，但大部份時間仍待在官邸，有空才到醫院去。我在醫院裡也看門診，與本省許多醫界人士也很熟。

陸軍總醫院因只能看軍人，無法照顧到退役軍人，所以政府於民國四十七年開辦榮民總醫院，經國先生找盧致德擔任院長。但因盧院長很忙，年紀又大，經國先生擬為他找一位副院長，便問我的意見，我向他推薦陸軍總醫院的鄒繼勳院長，因為我見過鄒幾次，覺得他滿能幹。於是我倆便到陸軍總醫院拜訪鄒院長，一到陸總便發現那裡的洗手間與辦公室均十分乾淨，經國先生覺得鄒院長確實是個人才，於是見到鄒院長立刻向他表明要調他任榮總副院長的想法，鄒院長也立

刻答應，兩、三天後即至榮總到職。鄒先生在榮總一做就是六、七年，所以他後來見到我便向我埋怨：「就是你給我搞的鬼，讓我一做就做了六、七年副院長。」因為盧院長很苛待他，未予他實權，後來他好不容易才升上院長，把榮總也辦得不錯，我與榮總也因此結下諸多淵源。

過去我曾參加銓敘部醫療審議委員會，常與台大醫生們一同開會，故與台大系統也很熟。如今台大新人輩出，全民健保開辦後，醫療審議委員會也不召開，我與台大方面便開始不熟了。我認為台大與榮總兩個系統都各有長處，彼此間有競爭也是好事，不過台本身門戶之見太深，要台大畢業的人他們才用，且只要一離開台大就別想再回去，不像榮總只要是優秀的人都進得去，故兩者性質仍有不同。不過台大學生程度本來就高，能夠考進台大差不多都是好學生，他們自醫學院畢業後，還要辛辛苦苦地研究多年，再出國接受訓練，所以一般來講，台大醫生的素質確實不錯。不過台大畢業的學生除了在台大外，大多會到新光、長庚等醫院，較少到榮總。

省立台北醫院則因台北市改制成直轄市，故改為台北市立中興醫院，我因此又由台北醫院院長變為中興醫院院長。民國五十七年台北市立和平醫院開辦，我再兼該院院長，一下子身兼兩個醫院院長，又是官邸醫生，每天生活忙不勝忙。後來台北市衛生局改組，我因醫院院務辦得不錯，故又兼任台北市衛生局副局長。當時台北市長乃現任奧會主席張豐緒，後來經國先生對張先生說我在官邸的事很重要，還是不要讓我兼太多職務較好，所以張先生便另換了一位王先生任副局長，我則繼續擔任院長，共做了五、六年。

我在中興醫院擔任院長，一直做到六十五歲退休為止，之後便在中中心診所做臨床，看門診。老友余紀忠先生看我已自中興醫院退休，便找到《中國時報》擔任副董事長，因他知道我在重慶曾經擔任過

先總統的新聞祕書。我則因與他很熟，他的母親又是我乾母，故也不好推託，於是自六十五歲退休後，我便在《中國時報》任副董事長至民國八十六年，也有十五個年頭。

我在《中國時報》其實也沒負什麼責任，每週一、三、五均需到報社上班，他們給我一間很大的辦公室。本來我每天都得去，後因他們考慮我可能太忙，便讓我隔天上班，不料我開始隔天上班未幾，蔣夫人又要我接任圓山飯店董事長。接任後我天天都得到圓山，輕鬆不到幾天的生活又開始忙碌起來。



1993年，熊丸夫婦等與蔣夫人在紐約合影。後排左起：熊丸、華興中學校長茅鍾琪、胡斡夫人、夏功權、胡斡、熊丸夫人李忠慧、（姓名不詳）；前排左起：夏功權夫人（黃少谷之女）、蔣夫人宋美齡、陳勉修夫人（過去是京女大校花，如今掌管凱歌堂）。

夫人把圓山交給我管理以後，除圓山之外，其他如華興育幼院、振興醫院等夫人所屬單位，若有困難與問題也都變成我要解決。而這些問題大多也與台北市政府有關，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所幸我現在把圓山原任的總經理換掉，新的總經理上任後爲我分憂解勞不少，我便有更多精神應付華興與振興的問題。不過振興後來也有一位很不錯的新院長，極能獨當一面；華興方面我也找了茅鍾琪校長來管理，讓我省下不少心力。

而台北醫學院甫成立時，因我與徐千田的關係，故也擔任董事職，並在北醫兼授心臟內科課程，如心臟衰竭、高血壓，及心臟缺氧等課。我在那兒教書教了十幾年，一直教到七十五歲，所以現在台北醫學院的醫生，大部份也都是我的學生。我在那兒教書，一直受同濟大學時代德國老師們的影響，講課時絕不帶任何筆記，且一上場便開始講課，教材全在腦子裡，學生們也很歡迎這樣的上課內容與方式。

我當醫學院院長卅多年，所以醫生的一般生活我很了解。其實真正的外科醫生是不能喝酒的，若是喝酒，外科生命到五十多歲手便開始抖起來，而沒辦法開刀。可是本省醫生喝酒是一種習慣與樂趣，而且他們很喜歡鬧酒，但除宴會外平時也不大喝酒，不像外國人總是拿著一瓶酒倒著喝。其實外科醫生天天都有刀開，甚至星期天也有，天天緊張倒也就無所謂緊張，故也談不上要鬆弛情緒。徐千田過去曾經遇到一種情形：他自己在一家醫院開刀，卻突然接到馬偕醫院打來的電話，表示馬偕那邊有個刀開到一半開不下去，要他去做緊急救援。於是徐千田馬上把手邊的病人稍微縫兩針，並交代護士麻藥不要給太多，然後脫了衣服立刻跑到馬偕去，穿上手術服再把馬偕那邊的手術接下去，手術結束後又跑回原來的醫院開刀，最後兩邊都救活了。有很多外科醫生已經把開刀當成一種樂趣，養成習慣後便不會緊張。

過去我一天至少喝五杯咖啡，而且都加糖。後來發現那樣不好，因為咖啡喝多手容易抖，便減成了兩杯。英、美、法等國的人都喝咖啡，也加很多糖。不過英國人也喝紅茶，過去我在英國待過，發現英國人把下午茶時間看得很重，我們在醫院的時候，到了午茶時間，每個人手邊的事馬上都暫停。上午約莫十點半鐘，時間一到，天大的事情也沒人管，甚至在開刀房裡的人都會把刀放下來，所以英國人對午茶是非常重視的。美國人也有午茶時間，卻不似英國人那樣重視，且美國人也不喝茶，而喝可樂或咖啡。我在美國醫院也待過兩、三年，他們早上八點開始工作，約做到十點即有半小時午茶時間，時間到後



眾醫官與孔夫人宋靄齡。後排左起：陳耀翰、盧光舜、鄧述微、熊丸、湛宗元、王師揆。

再繼續上班到中午吃飯時間，吃完便繼續工作，沒有午睡。下午三點鐘還有一個 coffee break，五點鐘下班。他們一週只上班五天，所以一星期一下子就過去，但工作起來可還是一點都不含糊。

如今官邸裡的醫官五老：我、王師揆、盧光舜、陳耀翰及鄧述微，只剩下我和鄧述微依舊健在，其他三人都已過世。現在我們這些人在醫學界都已算是老前輩，中心診所裡已經沒有比我再老的醫生，連鄧述微都比我年輕一些。

第五章 漫談蔣公與蔣夫人

壹、漫談蔣公

一、生活習慣

重慶時代，蔣委員長的身體還算不錯。他每日早晨約五、六點即起床，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唱聖詩，是個十分虔誠的基督徒。唱完聖詩後，委員長開始作早操，早操過後打坐半小時，此刻不許任何人打擾。半小時後副官聽到他喊「喂」便進去，拿給他一條熱手巾，一杯溫開水。他平常不喝茶，也不吃咖啡，就是特別喜歡喝溫開水。

委員長早餐也不會特別要求吃些什麼，多半是一片木瓜，一盤炒蛋，一片烤麵包，再加上一杯可可或清湯。此外就是一盤醬瓜，這是他離不開的口味。他的早餐多半在室外吃，過去吃早餐前他都會先看報，看完報後再吃早餐；爾後有人替他讀報時，他則邊聽邊吃。早餐時間多為一個鐘頭，得把報紙裡的重要消息都讀完才行。他很重視看報，直到他自己不能看報時，他還是會先看過大標題，將想聽的新聞打紅勾，再請武官讀給他聽。^{②③}

②③ 先總統每晨除禱告、讀聖經、靜坐外，第一件事就是閱報及聆聽參謀為其閱讀國內各大報紙，以及國外著名報紙、雜誌中有關我國之報導文章，尤其對《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社論等幾乎篇篇必讀，有時親自剪下有關文章，壓在書桌上。先總統以紅筆圈點剪下之文章，尤以《中國時報》為多。

開始有人爲委員長讀報是在來台以後。外面有人說委員長喜歡看大字，故許多報告都找人重新謄過，還有專門爲他印刷的報紙。其實根本沒這回事，委員長和大家看的都是同樣的報紙。

吃完早餐後，多半是醫官替他看診或與他談話的時間。過後武官會送一份委員長當日的行程表來，請委員長過目，待委員長對表中安排沒意見時，當天便照表行事。在重慶，委員長要批閱的公文，多半由機要祕書送到他的案頭。至西安事變時，因委員長背部受傷，事後夫人特地爲他訂做一個批公事專用的半臥半坐椅，等批完公事後，再交代副官送還機要祕書。如果那天必須到總統府或軍事委員會上班，在坐車途中機要祕書便坐在一旁唸公事給他聽，請他批示或交代。他每天的行程差不多都排得滿滿的。

委員長本人雖然長得相貌堂堂，也很喜歡照相，但就是不照鏡子。他還特地將臥房裡所有的鏡子全以白布遮住，連盥洗室的鏡子也一樣。他不是個迷信的人，所以大家都不懂他爲何要這樣做。

他對自己的身體健康也很重視，對衛生也很當心。他的生活一直都很規律，最喜歡吃家鄉食物，如紅糟肉和黃魚。他因西安事變時背部受傷、渾身痠痛，骨科醫師牛惠霖建議他去拔牙，把牙齒全拔掉後痠痛自然好轉。委員長聽了建議，便把牙齒全部拔掉，痠痛也果真痊癒，但因裝了假牙牙床容易萎縮，兩年後整副假牙便不再適用，假牙一不適用，便易將口腔各處磨破，產生潰瘍，所以我當時經常要替他將假牙取下，治療潰瘍。當他沒假牙用時，講話及吃東西都不方便，口腔內部潰瘍時，唯一能吃的就是炒蛋，所以他很喜歡吃一些軟軟爛爛的東西，便是因爲牙齒不方便之故。

委員長的睡眠一向不大好，大概因爲平常事情多，心情較沈重之故。且他平常上床時間太早，這也是睡眠不好的原因之一。我幾乎每

天都要給他一些藥，以幫助他睡眠。有一回我們到青島時住在海邊，半夜委員長突然按鈴吩咐侍衛官，要睡在他臥房前面的楊侍衛官搬走，因為楊侍衛官的鼾聲太大，吵得委員長睡不著。楊侍衛官搬走後，委員長還是聽到鼾聲，折騰一晚後，侍衛官一個個全搬走了，但委員長還是沒睡好。第二天委員長向侍衛長俞濟時說：「青島這地方實在太清靜，他們打鼾的聲音太響，以致我晚上睡不好。」俞先生一想，那幾位侍衛官中只有一位會打鼾，打鼾的人搬走後又哪來的鼾聲呢？於是第二天晚上，大家都極注意聽，才發現原來是青島海邊的燈塔轉動聲音很像鼾聲，委員長知道原委後，這才睡好。

二、軍事化性格

委員長十分重視軍事演習，也經常親自閱兵。我曾陪他參加過無數次的演習，演習過後多半會聚餐，團長以上的人員都會參加，大家坐在那兒聽他講話，檢討缺失，爾後一塊兒吃飯。委員長吃的東西表面上看來和別人都一樣，實際上卻是另外做的。他出去吃飯都會帶著廚子，廚子事先知道當日菜單，便另外做了一份一模一樣、卻合他口味的東西，一方面因委員長不習慣吃口味太重的食物，另一方面也基於安全上的考量。

委員長是個對什麼人就講什麼話的人，主題層次分得十分清楚。他是個典型的軍人，一切動作講求軍事化。他最得意的就是他的軍裝，凡正式場合均著軍裝，戴上青天白日勳章，顯得神氣威武。他還有件黑色斗篷，後來很多人都學他穿斗篷。他只在散步時才穿中國的長袍馬褂，否則在正式場合多著軍裝，偶而才穿中山裝。至於西裝他幾乎從來不穿，僅在菲律賓時穿過一次。他對服裝很重視，很少看他穿拖鞋，甚至我們常在他臥房裡進出，見到他時他也都穿得規規矩矩，臥



甫來台的一次軍事演習中與蔣公合影。站立者右四爲熊丸，右五爲經國先生。

房裡穿臥房服裝，上班穿上班服裝，散步則穿散步服裝，他對服裝真是一板一眼，規規矩矩。

他對守祕十分重視，因為他在房裡講話，守在房外的侍衛官都聽得到，所以他在房裡很少談國家大事。他要談事情，往往會坐進車裡，因為他的座車設有隔音玻璃，能將前座與後座隔離，許多話他都與夫人在車上談。有時若不坐車，他會特地到花園等較隱密的地方談話。委員長喜歡坐派克車，不過他還有兩輛七人座的凱迪拉克(Cadillac)，這是夫人喜歡的車種。

委員長平常出外散步若遇到路人，都會很客氣地打招呼，他對百

姓很好，也很客氣。過去我對他的感覺是不苟言笑，他的兩眼炯炯有神，走起路來有規有矩，身上又披著一件黑斗篷，頭戴帽手拄杖，十分與眾不同，大家看到他都肅然起敬，沒人敢在他的面前隨便亂笑。但他對老百姓與小孩子都很好，只是不常笑。他只對他的孫子、夫人，或戴季陶、吳稚暉及吳國楨^{②④}等先生才笑，對其他人則很少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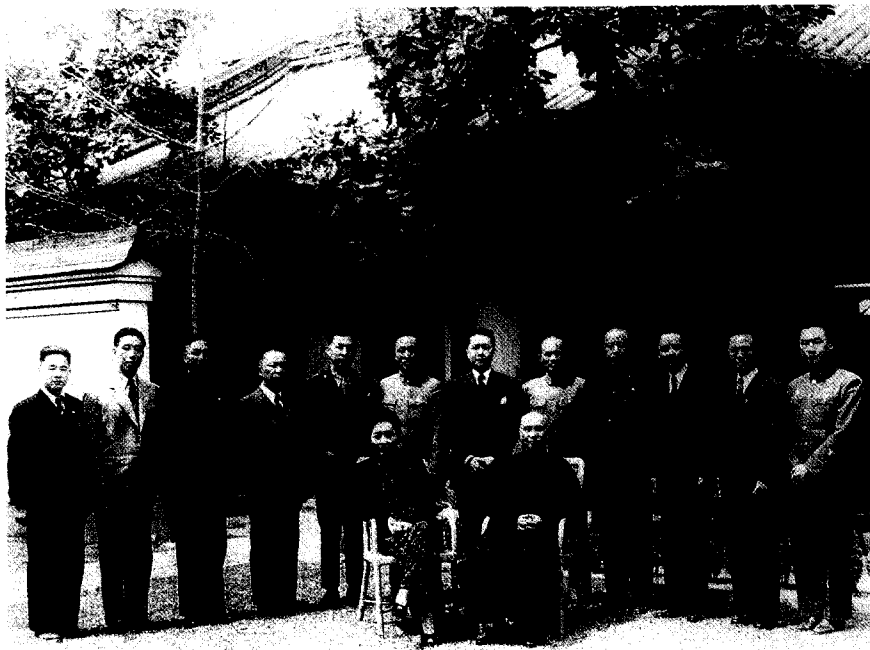
他是個很有威嚴的人。有一次，他親自到顧問團見客，顧問團一位副官端茶出來給他，我站在一旁只見那副官端著茶一路發抖地走來，茶盤裡發出碰碰的搖晃聲響。非但如此，那副官走到總統面前便跌了一跤，茶杯也打破了，讓我在一旁想笑卻又不敢笑。總統威嚴的相貌及一生顯赫的事蹟，讓許多人見到他就會緊張。他不像經國先生那樣平民化，但他與經國先生類似的是，他倆在物質上均十分節儉，但在精神生活上，老總統確實比經國先生懂得享受。

三、注重禮儀

總統事母至孝，每逢王太夫人冥誕那天，他一定不吃早餐，在王太夫人的相片前禱告幾分鐘後才去上班，晚上則必舉行王太夫人的生日宴。王太夫人百年時，還出版很多紀念書籍。

總統十分重視中國傳統禮儀，但對西式禮節也很尊重。他對自己的言行十分注意和謹慎，也十分重視請客時的位子排序，每次請客一定親自排座。他與夫人總是對坐在長桌的兩端，夫人右手邊的位子是大位，他右手邊的位子則是次大。他請客時，中午多半請吃西餐，晚上則請中餐。所謂西餐必是一菜一湯，至於中餐如果請的是熟客，多半請些他自己喜愛的便餐，包括寧波很鹹的臭筍子、紅糟肉、魚，還

^{②④} 時任湖北省主席，很會逗總統開心，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最後卻聰明反被聰明誤。



抗戰勝利後，蔣總統與夫人及官邸眾人於王太夫人溪口墳莊前合影。前排坐者左起：宋美齡、蔣中正；後排左起：熊丸、孫義宣、警衛組長施覺民、軍醫署副署長吳齡深、美齡號駕駛衣復恩、總務局局長陳希曾、宋子安、俞濟時、警衛室主任石祖德、周宏濤、曹聖芬、夏功權。

有他自己最喜歡的醬瓜。他請客時從不看菜單，菜單都由夫人安排，他只重視客人的座位排序。

總統生日或聖誕節時經常請客，但他請客不喜歡請十三與單數，故我也常列席充數。如果連我加進去後人數還不夠，便會再找侍衛長來湊，我們經常參加他們的生日宴會。他請客時不僅坐的都是長桌，採用的亦均為西式禮節，即使是請吃中餐，也都是中菜西吃，由穿白

衣的服務生輪流服務，將菜端到每位客人面前，讓客人以公筷夾菜，十分注重衛生。他對吃東西的規矩也很重視，喝湯時要拿湯匙舀湯喝，不能直接將碗就口，且他對舀湯方式也很講究，吃中餐時舀湯須由外向內舀，吃西餐時則由內向外舀，對諸此禮節十分重視，也許是受到夫人的影響。

我曾出過一次洋相。一回我與總統夫婦及經國先生吃便餐，我這個人向來有些不修邊幅，經常上衣與褲子穿著不統一，在官邸早已傳出名，總統也從不干涉我。那一次吃飯是在中午，所以吃的是西餐，後來上來一盤魚，那魚很軟很嫩，我覺得用刀子切十分麻煩，便直接用叉子吃。當時總統看了我好幾眼，後來終於忍不住，便對旁邊的副官說：「喂，給熊警官拿把刀子來。」當時我的桌上明明就擺著刀子，他還要拿刀子給我，就是不直接點破。後來我也懂了，只好拿刀子切魚吃。和他吃飯真的很傷腦筋，常要注意會不會出錯。

外面傳說德國總統曾請德國大使程天放吃飯，程天放拿起手巾擦了叉子，德國總統馬上叫人換一副叉子，不料換了叉子程天放又擦，主人又吩咐再換一副，大家都說程天放不懂餐桌禮貌。有一回程天放和總統一塊吃飯，總統便對程天放說：「你們做外交官的人，餐桌禮貌一定要注意。」程天放以為總統指的是那項傳聞，故答稱：「報告總統，外面的人都說我拿帕子揩叉子，這是完全莫須有的事。」總統當時聽了便說：「我不是說那回事，而是要你喝湯不要發出聲音。」

總統很少大聲發脾氣，唯一例外是對從小就跟著他的內務科蔣孝鎮科長。蔣科長是總統由家鄉帶出來的，總統只要心裡不痛快，便找蔣科長來罵一罵，而蔣科長也很習慣挨總統的罵，總統罵他時，他左耳進右耳出，一點兒事也沒有。有一回，一位寧波老副官病了，找了另一位也是總統家鄉來的人接替，此人不知爲了何故冒犯總統，總統

非常生氣，在情緒不佳的情況下對他說：「我要殺你的頭。」那位副官聽了嚇得半死，跑去向蔣科長說：「不得了了，總統真的生氣了，他說要殺我的頭。」蔣科長便說：「唉！我的頭不知道被他殺了多少次，還不是在這兒！」所以總統講的其實都只是氣話，且若他真的生氣，必是爲了十分嚴重的事情。

總統對人相當忍耐，但經國先生就不一樣。如果要比較老總統與經國先生，我認爲老先生比較念舊情，仁慈而少絕情；經國先生較看是非，事情若真做錯，他馬上翻臉不認人。²⁵

四、柔情的一面

每年秋末，總統都喜歡到復興鄉角板山摘梅花，但因角板山的路很彎，夫人不喜歡去，總統只好單獨上角板山。到了角板山後，因爲他很喜歡梅花，常會到梅花底下轉來轉去，找到幾支好花後，便吩咐侍衛官把花剪下。大家遵從他的吩咐把梅花剪下後，都認爲總統回去必把花插在自己書房裡，沒想到總統回去之後，總是把那些梅花送到夫人房間，可見他對夫人還是十分柔情體貼。我們每次到梨山，他有時也會到梨山賓館摘花圃裡的蝴蝶花，繫在夫人胸前。在許多小地方上，他也表現得十分柔情，一點都不像軍人，而這些都是很自然的動作，一點也不矯情。

總統最大的嗜好便是遊山玩水，只要得空，他便會到日月潭、梨山等地方遊覽，且多半到人跡罕至的青山。總統往往會在那些地方住一晚上，次日早晨再選個地方吃早餐，十分優閒。在日月潭遊覽時，

²⁵ 先總統晚年雖面容威嚴，但心地慈祥，常念舊情，如特赦黃百韜將軍之子死罪即可見一斑。經國先生則常滿面笑容，但卻就事論事，不計親疏。

每到下午四、五點鐘，他總喜歡遊潭。但他不喜歡乘汽艇，喜歡和夫人一起坐在船夫划的船上，十分安詳。有時他會在路上散步，口中讀著唐詩。他很喜歡唐詩，在他桌上總離不開一本唐詩。他那本唐詩已經翻得很舊，最後還放到他的棺木裡。他死後，棺木裡放的就是一本聖經，一本唐詩，還有一本《荒漠甘泉》。

除了遊山玩水外，總統的另一項嗜好就是京戲，尤其在大陸時，因夫人不喜歡聽京戲，所以他經常自己一個人聽。然而政府撤守台灣後，他曾立誓：「不回大陸不聽京戲。」所以來台後他便沒再看戲。但他仍看電影上的京戲故事，尤其喜歡看李麗華的電影，有兩、三次他還召見過李麗華與嚴俊，用點心招待他們。過去他也看紹興的家鄉戲，但不似京戲那般喜歡，他看京戲時甚至還會邊聽邊打拍子。夫人便不同，她只愛看外國電影。

五、選才與惜才

總統在選才上範圍太小，人才推薦的管道也有限。不過後來他還是找到補救方法，自己由部隊中找人擔任參謀，且一年一換，在這一年中，他會觀察這些人的言行，並詢問他們對事情的看法，一年之後再換幾個人進來。大家都很樂意當他的參謀，因為當過參謀的人才有機會晉升。也因為他一年一換參謀，所以我們這些一直跟在他身邊的人，也同時認識不少人，對日後做事上十分方便。

總統對軍中的人事安排十分重視，團長級以上的人事調動他都十分了解。我記得有一次，總統接見受推薦的海軍總司令候選人崔之道，見面時總統問崔之道的健康情形，崔之道答稱：「我前陣子發現罹患腸癌，但複檢後醫生說不是腸癌，所以我現在身體很好。」總統當場只說了聲：「喔。」之後便差人查崔之道的病歷，查了之後發現崔之道的腸

癌根本沒好，只是暫時不開刀。後來海軍總司令派令下來，便換成了宋長志。

李宗仁與白崇禧不合之事，總統心裡也都有數，他有時安撫有時敷衍，也真是煞費苦心。那時吳國楨與陳辭公也吵得很厲害，總統有時一下子見吳國楨，一下子見陳辭公，自己也被弄得很煩。

還有一次總統要選海軍武官，召見了好多人都不滿意。那時我有位表兄也是海軍，正好到我辦公室來看我，遇上了俞濟時。俞濟時一見我表兄穿著海軍服裝，長得又高又壯，一表人才，便問我那人是誰，我回答後他便說：「這個人很好，為什麼不呈報委員長？」於是俞濟時便寫了張簽條，說明表兄的資料，請委員長召見。委員長召見後，見表兄相貌堂堂，便選定他擔任海軍武官。其實我那表兄在海軍武官任內建樹不大，只是人長得不錯，但總統就是看中他，所以有時候總統選才還是要看機緣。

他在用人之前有時會先貶人，考驗被貶者的反應，覺得滿意者再晉升。很多人被貶之後抱怨連天，又吵又鬧，最後即升遷無望。總統很喜歡考驗人，見客時也很喜歡考人，有時甚至喜歡明知故問，以觀察受問者說的是真話或假話。所以有很多人與他見面都膽顫心驚，因為不曉得他到底要問什麼？有時與他見面也許是升遷機會，但也可能造成負面效果，特別是那些要到國外任大使者，總統派他們出去前會先為他們看相，要他看得順眼的才會通過。所以他用人也有他自己的套，對中國《中庸》、《大學》，甚或《易經》裡的觀念均十分重視。²⁶

²⁶ 先總統雖然考核嚴格，但也喜歡能言善道之人。就我所知，著名的有李惟果者，他自稱可以把屋簷上的麻雀哄下來。另外，張道藩、吳國楨、張治中等也都是其中佼佼者，這些都是先總統曾喜歡過的人。

尤其自晚年後，他整個改掉從前在大陸上只與少數人接觸的模式，開始真正注意人才的考核。所以後來他在台灣所用的人才都對他忠心不二，肝腦塗地。所以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總統，要找出第三者來代替他的位置，也真是不容易。他做事總是有始有終，貫徹到底，確實有領袖風範。同時他見客的範圍也很廣，例如當時的南投縣長林洋港，便與總統見了好幾次面，總統對林洋港也很提拔。我還記得有一次林先生和總統見完面後，我與林一塊兒吃飯，那時林自己對我說，他在當南投縣長秘書時，是負責替縣長吃酒的，所以他又叫「酒秘書」。

總統的日語比英語好，因為他年輕時曾在日本待過。但他通常還是不講外語，在重要國際場合上，都有夫人或英文祕書為他翻譯英文，日文則有外交部的專門人才為他服務。

六、諫言管道

總統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所以要找他的缺點真的很難，但若真要挑剔，則可說是他的自信太強。當年抗戰勝利來得太快，讓他覺得自己的堅持都是對的，所以別人的話都聽不進去。且除了戴季陶、吳稚暉、經國先生及夫人外，能與他講話的人也太少，加之沒人敢在他的面前有所批評，大家在他面前都唯唯諾諾。

周至柔先生倒是敢於直言，他在擔任空軍總司令時，有一回總統召見他，要他接任參謀總長，不料他對總統說：「報告總統，我不接。」總統問：「你為什麼不接？」周至柔說：「假使總統要我接，我有一個條件。」只有他敢與總統談條件。總統說：「好，你說吧，有什麼條件？」周至柔說：「我的報告要直接呈給總統，不經過第三者。」總統聽了便回答：「我答應你，那你就接參謀總長好了。」原來當時軍務局局長是俞濟時，俞先生抓權抓得很緊，老總統對俞又很信任，所以往往參謀

總長的公文一到軍務局，俞先生看後便會附加自己的意見，而總統往往也會採納俞先生的意見。外面的人都傳說：「只要俞濟時先生說好，總統那兒一定沒問題。」周先生便是要防範俞先生，才會對總統提出那樣的條件。

從前可在總統身邊諫言的人太少，過去還有個戴雨農先生可直接為總統提供情報，但戴先生飛機失事後，情報系統均由經國先生負責，總統的消息來源便十分受到限制，除經國先生與夫人外，沒人能對他講外界的事情。雖然總統每次見客都會問一些事，但因客人往往會猜測他的心意答話，在此情況下，下情經常不能上達。總統除了讀報外，每週還有許多財經、情報、軍事等會談。在會談中，他也會找各部會首長來聽取報告與建議，同時表示他的意見與指示，所以他也有許多消息來自這些會談。

事實上在大陸時，陳果夫與陳立夫兄弟經常有機會向總統推薦人事。當時果夫先生在第三處，專門負責用人事宜。因當時大陸人多，總統無法一一見面，當然要靠推薦，尤其陳家兄弟對於黨務人事都可以書面推薦，總統對他倆兄弟也十分信賴，所以那時候才有政學系與CC派等派別角力的形成。不過CC的力量倒真是很強，當時有很多立法委員缺都由他們出面安排。

然而這種消息來源仍十分有限，許多會談與建言，總是報喜不報憂。從前帝王時代設御史職，其任務便是冒死上諫，但現在哪來的御史呢？就連現任總統也面臨這項問題，到了他們那種地位的人，已經聽不進任何不入耳的聲音，因為他們已經被權力沖昏了頭。權力使人腐化，連經國先生晚年也是一樣，我們在旁邊其實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個人認為，要找到一位像老總統那樣有聲望、有操守，全心全力為國者，實在不易。他後來之所以讓經國先生接班，也是因為經國

先生的才幹。他曾試煉經國先生多次，不僅在大陸上便讓經國先生到俄國與昆明當人質，還讓經國先生由基層做起，眼見經國先生表現不凡，才打算培植他接班。

七、晚年情景

如今想起總統晚年的幾幕情景，也真令人難過。那時總統已臥病許久，晚上當然睡不好。有一天他向我要安眠藥吃，但因他當時心臟不好，不能吃安眠藥，所以我便給了他別的藥，他也心知肚明。有一回他竟趁醫生們都不在時，喊副官到他書桌下的皮包裡拿錢，那副官在皮包裡摸來摸去，卻只找到兩張十塊錢美金。總統當時便對他說：「你拿這些錢去幫我買安眠藥來。」那副官去哪兒用美金買安眠藥？而且好玩的是，總統自己還藏私房錢。

還有一次，總統突然找侍衛長鄒堅去，對他講了一大堆話，但因那時總統沒戴假牙，加之又有點中風病狀，使得鄒堅一句話都沒聽懂，卻還是「喔喔」兩聲地答應了。之後鄒堅便跑來找我，他說：「怎麼辦？我聽不懂總統在說什麼。」我便再去問一遍，才發現原來總統要鄒堅佩槍在身上。因為當時總統生病，人在病時想法總是不大一樣，他可能爲了安全，臨時想到侍衛長應該佩槍，便叫他把槍拿來看一看。

貳、漫談蔣夫人

一、生活習慣

夫人每天早上十一點起床後，便先在床上吃早餐，若十二點有客人來見，她往往只要十幾分鐘便可梳洗完畢。她總是自己化妝，頭髮也是自己弄自己洗，除非她不會做時才會到圓山來洗頭。夫人一向喜

歡穿旗袍，她的這種穿衣風格任何人學也學不像。直到現在，她有時還會對我說：「Dr.熊，我這件衣服是三十幾年前的衣服耶！」她的身材一直沒變，從前的衣服現在還能穿。她有個專屬的張姓裁縫師一直跟著她，此人是湖北人，專門為她做衣服及改衣服，有時還為她做旗袍送人。官邸裡的針線活都是張師傅一人負責，有時他也為總統改衣服。

夫人每天早上由化妝室出來後，多半先到起居室裡畫畫與練字，下午一點鐘才陪總統吃午餐。過去夫人有很多東西不能吃，她對魚蝦過敏，只有某些魚類她才能吃。但上回我到美國看她時，發現她對魚蝦已不那麼敏感了。夫人陪總統吃完午餐後，總統多半會睡個午覺，夫人則從不睡午覺，多半看看書報或畫畫。直到下午四、五點鐘，總統睡醒後便到夫人書房，對夫人說：「達，我們出去散散步吧。」兩人便坐車出去走走，晚上回來吃完晚飯，總統便到書房看公事，夫人則自己看書。

二、默默行善

過去曾有人問：夫人所創辦的基金會是不是要以「美齡」來命名？夫人常回答：「不要用我的名字，我不求任何名利。」這是夫人常說的一句話。她在美國常說：「只要我真的能幫助那些我能幫助的人，那就是上帝留我到現在、讓我存活在世上的最大使命。我不想對別人說這些事是我做的，因為我是替上帝做的。」

她曾默默地做了很多好事，經常要副官匯錢給報上需要幫助的人，且經常匿名。只要是她能幫忙的事情，她都會去做；但若是會出名的事，她則儘量避免。因為她是很虔誠的基督徒，所以她最常說的話是：「上帝留我到現在，一定還有祂的用意。我現在就是揣測上帝的意思，做我應該做的事。至於其他，我對自己已無所求。」她常講這類富有哲

學意涵的話，在士林官邸的臥房浴室裡，除了浴缸、化妝台、椅子與磅秤，另外還有張桌子放小東西外，她在牆上掛了一幅自己很喜歡的英文字，上面寫著：“I come to this world only once, what I should do I will do right now, I will not pass them because I come to this world only once.”（我到這個世上只有一次，假使有需要我做的，我現在就得做，因為我到這世上只有一次。）

三、虔誠的信仰

現今有許多教會信仰其實都是假冒爲善，口頭說說而已，真正像夫人那樣信奉上帝的人實在不多。她是虔誠的基督徒，從心靈深處信奉上帝，她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父親是個牧師，從小便受其薰陶，天天讀聖書做禱告。直到現在，夫人還在台北養了好幾十個年老的牧師，並說服土地銀行陳勉修先生的夫人替她照顧他們，無論在花蓮或山地，連周聯華牧師的薪水都是夫人發的。

孔夫人也曾匿名在山上修建禮拜堂，但均託說是山地人自己捐的錢。夫人也曾在梨山、台北等地修建教堂，但都交給別人管，自己從不問事。所以她們姐妹一直默默做了許多幫助教會和幫助別人的事。夫人常講：「要做好事，只要做就好，不要一直想著讓別人知道事情是你做的。其實只要你做了，上帝便知道那是你做的，其他人知不知道並不要緊，因為讓上帝知道才是我們最需要的。」

當初夫人創建華興育幼院，主要就是爲了大陳撤退時死難將士的遺孤，因為她要爲大陳的死難軍人教養子女。之後華興又慢慢開始收留一些沒父沒母的孤兒，或軍隊裡窮苦人家的小孩。而辦振興醫院，主要也是爲小兒麻痺病患所設，因當時台灣正流行小兒麻痺症，夫人設立一個專門的復健醫院，主要也是爲社會解決問題。以後小兒麻痺

症慢慢從台灣社會上絕跡，所以振興醫院才慢慢轉變成今日模樣。另外，婦聯會主要也是針對軍眷所設，因為當時有許多軍眷均居無定所，夫人便帶領婦聯會到處籌措基金，好為軍眷興建房舍及勞軍。而夫人辦圓山飯店則是為了美軍，當時美軍來台協防，平常無處可去，也沒有地方住，我國又沒有一個像樣的地方招待外賓，所以夫人才決定創辦圓山。其實夫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動機都是善意的。

夫人自己常說：「這世上除了上帝外沒有完人，因為大家都會犯錯。」但我認為夫人很少犯錯，因為她把自己的生命並不看得那樣重，對名利也不熱衷，只是抱持著多幫助別人的心態。但外界不了解，許多報章雜誌對她常有中傷，夫人卻都不在乎，她說：「我不怕別人怎麼講我，我也不求怎樣，因為我的一切行動上帝都知道。」她有那樣的哲理，所以沒什麼大事好憂慮，即使是很親愛的人走了，她也認為那是上帝的旨意，自己雖無能為力，但只要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就好。從這方面想，她的憂慮心也沒了，所以我從一旁看她，覺得她是個很難找到缺點的人。很多人都覺得她的雍容華貴無第二人可相並提，且當你愈接近她，將愈覺得她是一個近乎完人的人。

有些文章寫了一些惡意中傷她的話，事實上都是故意抹黑的。例如報上曾說她吃的東西都是圓山專程弄進官邸，根本沒這回事，她若真要這樣，乾脆就弄個廚子進去，何必要圓山煮好東西帶進官邸呢？此外，翁元在《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一書中，對夫人的描寫都很負面，因為夫人曾責備過他。

張紫葛在夫人身邊的時候，我雖尚未進侍從室，但他所寫的回憶內容應該也只有四分真實，因為委員長吃藥一定必需經醫官同意，且他往往不吃中藥，夫人根本不可能隨便到外面買中藥給委員長吃。且張紫葛把他和夫人的關係也寫得太近，以夫人的個性來講，根本是不

可能的事，所以我覺得他寫得太過火，很多東西都自己編造。不過他那本書對夫人的描述多為好意，並沒什麼惡意。

四、文藝特質

夫人生日（陰曆二月十二日）那天正好是百花節，所以她特別喜歡花。她的房間每天都要換一盆花，官邸裡有個人就是專門為她換花的。但換來的花要怎麼插，她自己會研究，還會把插好的花做些調整，不是隨便插著就算了事。有時有重要客人來，她還會親自插花。她的插花技術乃無師自通，在她心中自有一套審美觀存在。

夫人從前即對室內佈置極具天份，她在她的書房及總統會客室都有很特殊的佈置。她在牆壁上挖了一個很大的圓洞，並在圓洞外種樹，圓洞上是一片透明玻璃，因樹枝長在外面，客人坐在客廳裡看圓洞，便容易以為那是一幅畫。這項佈置很特殊，讓許多外國人看得目不轉睛。她在其他房間也有類似的裝璜，在圓洞外種植各色花朵，可知她對佈置有極高的興趣與不平凡的見解。

在她的起居室(sitting room)裡有張大桌子，她經常在那兒作畫，旁邊還有架鋼琴，她有時會在那兒彈琴。當她要看書時，只要把牆上的簾子拉起，便可看見牆上滿滿是書。她把書架嵌在牆壁裡，簾子一拉起，才能看見三面牆上都是書，簾子放下，則又像落地窗上的窗簾一般，也是項巧妙設計。她對看書有很大的興趣，可以一整天拿著一本書看六、七個小時，將其一口氣讀完。當然她看的都是外文書，很少中文書，但她會看中文報紙，而且看得很快。夫人的英文簡直比美國人還好，她是威斯理女校出身，高中、大學都在那兒讀書。且她書讀得多，經常一天看六小時書，所有重要消息她都清清楚楚。

我很佩服她的記憶力，尤其是寫聖誕節卡片時，經常由她的祕書

坐在打字機旁，聆聽她一個個憑記憶唸出的名字與地址，並各自打出不同的卡片內容。她往往出口成章，且一唸就是一、兩個鐘頭，全部資料都存放在她的腦子裡，記憶力實在很強。有好幾次她寫文章，還會註明出自哪本書的哪些頁，進一步查證後，都證明她的記憶無誤。不過她寫文章通常仍需有人為她起稿，吳經熊、沈劍虹、葉公超等人都曾替她寫過文章，但完成後夫人都會自己重新改過，或寫成自己的文字，有時還會完全不採用，由她自己重新寫過。

在重慶時，吳國楨常來官邸。他的英文很好，許多官邸對外文字都是他與夫人一起研究。夫人之所以學畫，也是受到吳國楨夫人的影響，吳夫人由於常到官邸陪夫人，有一回便建議夫人學畫，夫人當時說：「我恐怕沒有畫畫的天份。」吳夫人卻說：「畫畫不一定要有天份，我也在學，而且畫得也不錯！」夫人一聽興趣也來了，便找當時的名畫家鄭曼青（曼髯）先生教畫，從那時起，夫人便一直喜歡畫畫。

夫人畫了三、四年後，畫境已相當高，連鄭曼青也認為夫人畫得不錯。然而外面的人都不相信，認為夫人的畫一定是鄭曼青捉的刀，再假夫人之名說是夫人畫的，這些話也一一傳到夫人耳裡。有一回鄭曼青提出一項建議，要夫人在孔子誕辰那天，宴請台北幾位最有名的畫家，如高逸鴻、黃君璧（君翁）、邵幼軒、孫多慈、張大千等餐敘，飯後再當場揮毫。那天飯後，夫人便建議大家共同合作一幅畫，因為實在難得，大家便請夫人先開頭。夫人在宣紙上畫了一棵松樹，大家看後都呆了，因為松樹在國畫中實在不容易畫好，但夫人那棵松樹確實畫得很好。夫人畫好後，再由每位畫家繼續接下去畫，最後共同完成一幅極名貴的畫。從那以後，再沒人敢說夫人的畫是鄭曼青代的筆，因為大家都親眼看到了。

五、外交長才

夫人極具外交長才，有她在的場合都不會太拘束。但若總統在時，很多事即不能隨便，故只要夫人與總統都在場，他倆總會互相隨便講講話，惹大家笑笑。但過了一會兒後，總統也知道自己在場會令大家拘束，便會起身說：「你們吃吧，我去散散步。」每逢重大的紀念日，或總統、夫人壽辰，及聖誕夜等日子，我們都是官邸的座上賓，大家鬧在一起十分愉快。尤其是聖誕夜，他們一定會在士林凱歌堂做禮拜，周聯華牧師是那裡的主持，大家帶一堆花生糖和禮物，在那兒一起慶祝。

夫人在各種場合中，常是最受歡迎的中心人物，她在外交場合上確實給予總統很大的幫助，許多難以回答的問題，她都有辦法應付，在當年真是風靡一時。直到現在，美國人對她還很尊敬，她在紐約只要一出門，馬上有開道車為她服務，房子周圍還有許多美國警衛，故任何行動報上均有極大標題的報導。她是過去「四巨頭會議」^{②⑦}參與人士中，唯一仍健在的人物，所以有很多地方大家仍不得不佩服她。

總統平常接見外賓時，多由沈劍虹、沈昌煥、沈鎬等英文秘書為他擔任翻譯工作；但當總統有重要國外訪客（如：馬歇爾）時，夫人便會親自為總統翻譯。夫人的翻譯通常有幾個特點，她很懂得抓住總統說話的重點，因為總統有時口音很重，別人聽不懂；或有時總統講話不甚清楚，別人聽時也不敢亂改總統說話的內容。夫人卻很懂得總

②⑦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六日開羅會議，由邱吉爾、羅斯福、史大林及蔣中正等四人公開發表宣言懲處日本侵略，剝奪其一九一四年來奪取之太平洋島嶼，歸還東北、臺灣、澎湖予中國，並將其自所有以暴力取得之領土中逐出，朝鮮令其自由獨立，日本需無條件投降。

統的真正意思，並會替他以流利英語譯出，所以總統在接見重要客人時，夫人的翻譯便顯得十分重要。除此之外，夫人還會把總統的談話改爲較適當的語氣，對總統外交上的擴展有很大幫助。

夫人對總統的幫助，也不單是針對外國人。有時總統發脾氣，夫人站在一旁便一聲不響，她不會當場勸總統別生氣，僅逕由總統罵人，等到總統發完脾氣走後，夫人便會安慰那些被罵的下屬：「總統罵人都是好意，如果總統不罵人，就表示這件事不需要你做了。」這麼一說，讓被罵者認爲被罵並非一件了不得的事，反而是總統愛之深、責之切的表現。

六、西安事變與張學良

西安事變的經過，在《蔣委員長西安蒙難記》中已有詳細說明，但事後夫人曾親自對我說些她對西安事變的看法。她說西安事變發生後，她始終相信上帝不會讓委員長罹難，而使國家動亂不已。夫人尙覺得上帝要她出面解決此事，故當她一聽到事變發生，第一個想法便是要親自去一趟西安。

當時有很多人勸夫人說：「妳不能去。張學良（漢卿）與楊虎城已經鐵了心，妳再跟去等於羊入虎口，何必冒那麼大的險？」當時何應欽主張轟炸西安城，但夫人反對，她說：「你若是轟炸西安，等於玉石俱焚，將所有的路都斷絕，也讓委員長陷入絕境，再沒辦法回來。所以絕不能採取轟炸西安的策略，我一定要親自去一趟西安。」於是夫人要黃仁霖陪她一起去，外國人端納也陪同前往。

夫人說：「臨行我給了黃仁霖一支槍，並告訴他：『假如我到西安之後，無論是張學良或楊虎城，任何人對我要有非常不禮貌的行爲，你就開槍先打死我。這是我的命令，你不能違反。我情願死，也不願

受辱。』黃仁霖答應了夫人的要求，並說：「好，我執行之後便自殺。」

夫人又說：「當時西安有位城防司令，突然在事發之前請假離開到南京，我覺得很奇怪，便找了他來，一定要他陪我一起去。」那城防司令馬上對夫人說：「報告夫人，我不能去。我要去的話，楊虎城一定饒不了我。」夫人當時便對他說：「你如果不去，我現在就饒不了你。」所以那位城防司令只好乖乖跟夫人去了。

夫人又說：「到了西安後，我第一件事便先禱告，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到底做得對或不對。當時我得到的啓示是對的，所以我便去見委員長，委員長見到我後，奇怪我為什麼要去西安，我對他說：『你是一個爲國而不怕犧牲的人，而我是爲國爲家同樣不怕犧牲的人，我當然要來。』」夫人說：「過去我待張學良如子，對他照顧有加，他假使還有點良心，於情於理都該了解我此行的道理。」果不其然，張學良見到夫人之後無話可說，只是不斷地賠罪道歉。

夫人看了委員長的日記後，對整個事變經過有所了解，那時張學良向夫人報告，要夫人先單獨離開，他隨後負責護送委員長離開，但夫人說：「要走一起走，否則我也不走。」張學良當時也無可奈何，因為楊虎城在西安的部隊比他多，他的東北軍若與之衝突，恐怕也擋不了楊的部隊。但夫人對張學良說：「你自己闖的禍自己收拾。」張學良只好說服楊虎城，所幸楊虎城也同意讓委員長與夫人離去。張學良當時決定親自護送委員長與夫人回南京，但夫人說：「你不要去，你去的話很難向南京全城軍民交代。」張學良說：「無論如何我都要去，我已曉得自己做錯，如今爲時未晚，我必須護送委員長與夫人抵達南京。」

夫人說她在聖誕夜當晚做了一次禱告，得到的啓示是明天便可回南京，因而就在聖誕節當天，西安事變終於落幕。所以夫人對我說：「上帝你一定得信。我一輩子信上帝，所以從來沒有做錯任何事，上帝

每次給我的指引都是對的。只要你信從上帝，祂就會給你一條正確的路；你不信奉祂，祂當然也沒辦法照顧到你。上帝只照顧信奉祂的人。」我聽到夫人這樣說，也覺得十分感動。

何應欽在西安事變中雖然主戰，但夫人對他並無任何批評，因為以他當時的立場是該那樣做。夫人則是站在整體觀念上做考量，爲了委員長的安全，爲了國家安全，所以絕不能轟炸西安，因一旦打起來，整個國家便亂了。事後證明夫人的看法是對的，她親赴西安，也真是一種大智大勇的表現。

張學良陪同委員長與夫人一起回來後，輿論各界對他多有指責，夫人與宋子文比較同情張少帥，因為少帥是中了共產黨離間之計，誤會委員長不願抗日，才會釀成禍事，也有值得原諒的餘地。後來他雖被軟禁多年，事實上他在裡面的生活，除不能隨便出外走動，其他諸事都很自由。他在裡面也讀了很多書，有網球場可供他打球，好幾次夫人還要我去看他。少帥與看守他的劉少校相處得很好，劉少校從少校時代便擔任看守少帥的任務，直到少帥獲釋時，劉已升任少將。他倆長期相處，成了好友，張少帥到哪兒，劉也跟到哪兒。

張少帥看起來就像《孟子》所說：「望之不似人君，見之而不知所爲也」的人。我怎麼看他都像山東賣布的商人，無論穿著或談吐，完全看不出軍人的威風，也看不出個儼瀟灑的少帥模樣。不過少帥胸襟寬大，後來成爲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懺悔他過去所做的事情。他也經常讀歷史，讀了書後也知道很多真相，所以他現在都不去大陸。其實他若到大陸，大陸方面將會非常歡迎他，因為共產黨在大陸得以壯大，完全拜西安事變之所賜，當年若無西安事變發生，共產黨在大陸早已全部瓦解。然而少帥卻堅持不回大陸，情願留在美國，其一乃因他不願再與共產黨有所聯絡，其二則因他在大陸舊部很多，他的生活全由

政府供應，若回大陸也無能力散錢，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此外，他覺得夏威夷對他很合適，所以情願留在當地，後因他在美國的唯一親人（胞弟張學思）也死了，所以少帥在夏威夷也過得不好。

趙四小姐（趙一荻）也是個值得一提的人。當初少帥被軟禁時，她自己要求進去陪少帥。當時高層和她談條件：「妳一旦進去，便完全與張少帥同一命運，他什麼時候可以出來，妳便什麼時候可以出來，中途不得改變意志。且妳在裡面所受待遇和張少帥完全相同，不得做特別要求。以上數點妳要考慮清楚，否則就不要進去。」當時趙四小姐什麼條件都答應，且進去後完全沒有額外要求，日夜陪著張少帥。因此夫人後來便勸張少帥的前妻于鳳至與少帥離婚，因夫人認為在少帥最辛苦的時候，都是趙四小姐陪他渡過，既然于鳳至與少帥分開已久，不如就和少帥離婚，成全趙四小姐與少帥。于鳳至也答應了，他們雙方辦離婚時，完全沒有任何條件，爾後夫人才讓趙四小姐與張少帥正式結褵。

張少帥耳朵完全失聰，眼睛也幾乎失明，所以講起話來自己的聲音很大。我曾在他看京戲的場合中和他碰過幾次面，發現他戴著助聽器似乎也聽不太到，不過他對京戲卻很熱衷。至於趙四小姐後來也病了，整個人也憔悴了，完全沒有當年陪少帥軟禁時的氣概，變成一位非常狼狽的老太太。所以俗話說「紅顏易老」真是一點不錯，想起當年「趙四風流朱五狂」之語，真是不堪回首。

夫人後來恐怕也知道少帥與周恩來那邊的人早有往來，不過她從未對我提起。事實上，民國廿九年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曾由延安託人帶來一封很懇切的信給夫人，夫人也曾拿那封信給我看，此信曾於《中外雜誌》五十七卷第六期中披露。

七、晚年情景

民國六十四年老總統過世後未幾，夫人每天早上十一點鐘起床，便找武官打電話給我，問我吃過早餐沒，有沒有空到她那兒去一趟。事實上我當然已吃過早餐，但仍答應前往。夫人的早餐通常是一杯可可，幾塊焦餅乾及一些水果，她躺在床上用一塊方板子擱在身上吃，我則坐在旁邊的椅子上陪她吃，兩人邊吃邊聊，慢慢地聊出許多往事。

夫人晚年很樂意找她喜歡接近的人，但對她不喜歡接近的人，卻



1993年在紐約，熊丸夫婦與蔣夫人（坐者）合影。

連一面都不想見。她很不喜歡見生人，所以上回她在台灣過生日時，只要我們這些熟人去，她便很高興。有段時間我幾乎天天陪她吃早餐，那時她會自動講很多她自己的事給我聽，諸如她與總統結褵的往事，都是她親口敘述的第一手資料，當時我對她了解很多。

夫人談起她結婚時的經過說：當時蔣先生還是軍事委員會主席，因孫夫人（宋慶齡）時任總理祕書，故介紹蔣先生到她家裡與夫人認識。蔣先生自從與夫人認識後，有好幾次均藉故到她家，慢慢與她親近。夫人說她當時也看出蔣先生人長得英俊，又很有志向，十分能幹，但她卻從沒想過婚姻方面的問題。直到有一次，蔣先生直接向夫人求婚，夫人當時答覆：「你跟我講沒有用，要我母親同意才行。我家是基督教家庭，我們都聽父母之命，如果我母親同意了，我再考慮。」當時蔣先生很聽夫人的話，便馬上求見夫人的母親宋太夫人，並與太夫人談了許多次話。

宋太夫人是個很直爽且心地善良的人，她直接對蔣先生說：「你出身佛教家庭，我家則是基督教家庭，我們兩家的宗教信仰不一樣，你要好好考慮。」當時蔣先生回答：「我知道這樣的婚姻會很難處理，不過我也可以信基督教。我之所以信佛教，是因為我的家庭信佛教，但我個人並非佛教徒，所以我也可以信基督教。」當時宋太夫人聽了蔣先生這番話，便對他說：「既然你這麼說，那麼我現在給你一本聖經帶回去，一年之後你再來看我，一年之內就先別談這件事。」

整整一年之後，蔣先生又對夫人說他想見宋太夫人，夫人便帶他回家。見到宋太夫人後，蔣先生便把那本聖經交還宋太夫人，太夫人一看蔣先生的那本聖經裡劃滿紅線，便說：「光劃紅線是不行的，我還要考你。」於是便問蔣先生許多有關聖經的問題，蔣先生均答得頭頭是道，可知他不僅確實讀過，且經過仔細的思考與分析。當時宋太夫人

便說：「不錯，你這一年內的確很辛苦。你的公事這樣忙，還有時間讀聖經，我相信你一定從中獲得許多。既然如此，你的要求我答應，不過你仍得徵求我女兒的同意才行。」蔣先生當時便問夫人：「妳母親已答應，剩下來要問妳。」夫人當時便答：「我沒有意見。」於是蔣先生與夫人的婚事就這樣訂了下來，時為民國十六年。

約自民國六十年起，夫人開始喜歡下象棋，那時她常打電話給我，要我去陪她下棋。我陪夫人下棋時，陳辭公夫人（譚祥女士，譚延闓先生的女兒）也常在場。我那時一週約要抽出四天陪夫人下棋，一天約下三小時。她下棋時，心情好到會主動唱歌，且常是不自覺的，可見她有多麼高興。我的棋力相較於她，是想贏便贏、想輸便輸，且輸時還不會讓她察覺是我故意讓她。有時候她會奇怪地問：「你是不是故意讓我的？為什麼我都看不出來你讓我？」因為她與孝勇下時孝勇贏她，而我和孝勇下時我贏孝勇，所以她才覺得奇怪。陳辭公夫人的棋力也不錯，夫人很喜歡她，所以她陪夫人的時間也很長。夫人有時很不服氣，便要我與陳夫人對奕，看看到底誰輸誰贏？我們兩個常打暗號，決定各贏一盤，讓夫人看不出來，十分有趣。也因此，我們和夫人的接觸很多，很容易地便熟了起來。

夫人最欣賞的官太太便是陳夫人，不過她認為最能幹的官太太則是徐柏園夫人，但她對徐夫人的批評也很多。我曾問過夫人：「如果有件重要的事，要您派一位官夫人去辦，您會派誰去？」夫人答說：「要看是什麼事。假如是主持會議，我會派陳夫人；但假如是執行一項計劃，我便會派徐太太去。」夫人除了稱呼陳夫人為夫人外，其他夫人一律稱呼太太。

徐太太是個很能幹的人，很會猜總統心意。有一回在總統壽辰中，她便唱了一段京戲，逗得總統眉開眼笑。所以夫人常說：「任何一場聚

會，如果有徐柏園太太及吳國楨，便一定很熱鬧。聚會若少此二人，席上立時變得很呆板。」不過其實是夫人自己使得宴會變得熱鬧的，因為只要有她在，她一定與每位與會者都講到話，且談話內容都與對方有關，從不冷落會中任何一人。夫人平常不大吃東西，所以在席上她自己往往不吃，卻很喜歡夾菜要別人吃。如果你在席上坐她旁邊，她便會一直夾菜到你盤裡，看著你吃。不過她現在已經有些改變，因為她的身體狀況使她沒有太多心思應付所有的人，所以她現在在宴會上，多半只與坐她旁邊或前面的幾個人聊天而已。

一九九五年我到紐約（我每年都會去紐約看望夫人），席上便坐在她的旁邊，另一邊則是顧維鈞（少川）大使的太太。夫人有一只很漂亮的祖母綠戒指，還有一條翡翠項鍊，她那些東西平常大家都不好意思稱讚漂亮，而我膽子較大，因為以前與她便熟，所以那天我便對夫人說：「夫人，您這只戒指很漂亮，拿下來大家看看好不好？」夫人便把她的戒指取下，我看完後便傳給眾人觀賞。眾人傳看完畢後，戒指又傳回我手上，我便把它藏在口袋裡對夫人說：「夫人，戒指沒了。」夫人笑說：「我曉得在什麼地方。」這樣便逗得她很高興。

夫人平常沒有寫日記的習慣，若有寫字機會，也多半以打字為多，由她口述，祕書陳小姐為她打字。她與一些重要人物的書信往來，或許陳小姐會有一些複本 (copies) 留存，而這些複本我猜如今可能在孔大先生（孔令侃）手裡，因為孔大先生祕書室裡有些卷宗，裡頭可能有夫人的信件複本。

夫人晚年一直有重聽的毛病，現在已裝了一個新耳機（助聽器），所以重聽情況好了很多。不過她的重聽情形十分奇怪，與她不熟的人和諧講話，她總是聽不太到；但像我們這種熟人與她講話，她卻都聽得見。這可能與她聽慣我們所說的話有關。

參、蔣公伉儷感情生活

有人說老總統過去曾與一位護士鬧緋聞，根本是子虛烏有的謠言，因我那時就在總統身邊，故知之甚詳。老總統在年輕時期也許不一樣，但就我所知，他自與夫人婚後，真是規矩守分，所以像陳潔如這個名字，我在總統身邊時真沒聽過。總統有好幾位夫人，他在家鄉結髮的毛夫人與緯國^{②⑧}的母親便不同，所以在我未進官邸前的事我不敢講，但在我進去之後，我確定那些傳說紛紜的緋聞都是沒有的事。總統身邊總圍繞著一群人，所以他要做什麼事，絕對瞞不了人。加之在江西坐鎮剿匪時，他還提倡「新生活運動」，更須以身作則，如果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在身邊有那麼多人的情況下，事情早傳出去了。

據我所知，夫人對總統發脾氣的事倒有，但從不是爲了桃色之事。夫人與總統感情多半很好，偶有意見不合時，我們在旁也看得出來。例如在南京時，夫人有時會自己跑到上海一住好幾天，我們便知道他倆又鬧意見。但他倆意見不合時多半爲了孔、宋兩家的事，而總統對孔、宋兩家的人，除孔祥熙與宋子文兩位先生外，其他人又都不用。總統的個性很強，他說不行就不行，任夫人怎麼說也沒用，所以有時夫人便會負氣到上海。

還有一次爭吵，是爲了修建中興賓館的問題。夫人因事先與工程師談好她房裡衛生間的窗戶不要對外，不料總統認爲夫人房外風景好，

②⑧ 老總統曾親自告訴緯國他的身世，說他是戴季陶先生所生。緯國其實是個蠻聰明的人，英文、德文都好，就是行爲太隨便，十分放蕩不羈，所以老總統不大喜歡他。經國先生就不一樣，所以老總統便全心提拔經國先生。

便把夫人房間的窗戶改成向外。爾後有一天夫人心血來潮去看房子，才發現衛生間窗戶的方位有變，便要求工程師立刻再改回來，不料過後總統去看房子，又要工程師把窗戶位置調過來。爲了一個衛生間，總統與夫人在那兒改來改去，改了兩、三次後，夫人終於受不了，便對總統說：「那房子你去住，我不住了。」於是總統便不再改了。

外面傳說總統與夫人結婚時，夫人原有男友。關於這件事我也曾問過夫人，但她否認。她說那時她們讀書都很用功，平常交往的男性朋友是有，但並無特別要好的男友。人們說她與前南京市長劉紀文（兆銘）很好，也都是亂傳的謠言。

不過總統與夫人婚後並無子嗣，這也是件奇怪的事。夫人並沒有婦科毛病，總統也沒有，我們也找不出原因來。但如今想想，這可能與他們婚後聚少離多有關，加之他們最初似乎也不希望有孩子，等到希望有孩子時已經太晚，總統年齡已稍微大了一點。夫人曾對我說：「我要有一個女兒多好！」可見她對沒有子嗣這件事，仍有一點遺憾。我還記得我生小女兒時，總統與夫人正預備去日月潭，當時我對他們說我不去，夫人問我爲什麼，我說：「今晚內人恐怕會生。」夫人說：「那很好啊！你希望生男生女？」我說：「我希望是個女兒。」夫人便說：「那好，你就留下，生了以後是男是女要告訴我喔！」我答應了。那天晚上內人果然生了女兒，次日我即到日月潭向夫人報告，夫人問我生男生女，我說：「生了女兒。」夫人說：「那好，正是你所想的。取了名字沒？」我說：「還沒。」夫人便說：「我替你取個名字。」所以我女兒熊名敏的名字是夫人取的。夫人很喜歡女孩，我的兒女她都碰過面，但她就是特別喜歡我女兒。

第六章 蔣公的醫療與健康

壹、蔣公的醫療系統

如今回想，實覺老總統的醫療系統一直沒有做到最好，感到十分遺憾。其實總統身邊本就不該僅我一人擔任四、五十年的醫生，他是國家那樣重要的人，至少也應有好的醫療團與完善的健康計劃，為他的健康問題把關。但總統卻抱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對自己的健康不夠在乎，而在金錢方面能省則省，不浪費國家任何一點錢。過去我曾一再向他建議：「只有我一人照顧總統，恐怕有很多疏忽之處，現在榮總醫藥很進步，是不是到榮總再找個專家，和我一起負責總統健康？」但總統每次都答：「現在這樣滿好！」

我自民國三十二年擔任蔣公侍從醫生起，每週約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待在他身邊，只有一小部份時間可以回家。事實上老總統並不需要貼身醫生跟著他，他的健康狀況一直都還很好，因他乃軍人出身，每天生活定時，既不抽菸也不喝酒，還經常運動，懂得控制工作時間，不過份忙碌，這一切均造就了他健康符合標準的條件。但即使如此，他與醫生的配合度仍很高，也與醫生保持密切連繫。

起初夫人的醫藥系統與總統分家，故我們平常只在請吃飯時才與夫人在一起。當時與夫人最談得來的醫生，是北京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也是國際知名外科，所以那時候我們對夫人的健康幾乎很少過問。

但總統便離不開我們這群醫生，他自拔掉全部牙齒，裝上假牙後，口腔裡便經常發生潰瘍。當時並沒有什麼特殊有效的藥可治療潰瘍，只能利用硝酸銀將潰瘍燒掉，所以我們那時經常要替他擦硝酸銀，好讓他再戴假牙吃東西。總統的口腔每月總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是破的，因此我們幾乎一天到晚跟著他，爲他擦藥。除此之外，他的身體各部位都非常健康。

總統要找醫官時，都會提早叫副官找我們，以便給我們準備的時間。而我們有時明明就在附近，但還是會故意讓他等個十分鐘再去，因爲如果養成隨傳隨到的習慣，往後如果因故晚到些，他就會問我們怎麼晚到了。但祕書工作便不能如此，當時周宏濤先生擔任總統的機要祕書，總統住在官邸樓上，宏濤則住樓下。總統房間有支電話可直接與宏濤連繫，只要總統一拿起電話，宏濤得馬上接聽，總統若說：「你上來」，宏濤馬上就得上去。因爲總統隨時都有公事辦，所以機要祕書幾乎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工作比我們緊張得多。

在我進官邸前，吳齡深醫師共跟了總統五年，而在吳齡深之前是一位金醫師，此人於北伐時期便跟了總統。總統幾乎是用了一位醫生，便只找這位醫生看病，所以他一輩子沒用過幾位醫生。而我除了曾經兩度出國又回來外，差不多也是有始有終地跟著他。

徐蚌會戰之後，大陸情勢危急，總統引退溪口。他在溪口生活十分有趣，行程滿滿不停，每早都到一處兒時母親帶他去過的地方（多半是廟宇），最後幾乎整個溪口都走遍了。我們那時跟著他，也可看出他的情緒雖不佳，但身體狀況卻還不錯。由溪口到上海的途中，總統不斷在海上視察，研究哪些地方可守，而哪些地方又該棄守。那段期間他的心情十分煩悶，我們經常有四位高級人員陪他吃飯，我發現他那時胃口都不怎麼好，牙齒也經常出問題。但他那時卻不大找醫生，

逕自在那兒研究軍事情況。

到上海以後，情勢更是危急，當時總統曾誓守上海，在敵機轟炸十分猛烈時仍舊不走。那時他的胃腸不好，常有嘔吐現象，但因情勢危急，恐怕到外面找專家也靠不住，我只好自己想法子來維護他的健康，總算是撐過那段時候。後來總統自上海乘江靜輪直航馬公，這段時間夫人在美國，不在總統身邊，所以總統對自己的身體也很保護，與醫生十分配合。

貳、陽明山車禍

民國五十七年，總統和夫人曾在陽明山出了一次車禍，那天總統與夫人出去散步，照例有前導車開道。過去他們每次出去，座車與前導車間通常有一定距離，所以座車司機從不知要踩剎車，只要負責到達目的地再停車即可。

那天到陽明山時，山上突然下來一輛軍用吉普車，那吉普車下山一看到總統座車便慌了，立即加速從旁開過，但因他有點緊張，開車技術又不好，車子一加速便擦到總統車隊的前導車，前導車一看吉普車擦過來，因不願與它相撞，立即反射動作便是踩剎車，然而座車司機從來沒有踩剎車的習慣，因而直接撞上前導車，形成自己撞自己的情形。

總統與夫人當時都在座車裡，因車內空間很大，又沒有繫安全帶，所以車禍一發生時，總統與夫人都隨著車子撞擊而由椅子上彈起，撞到車頂。夫人從自己的座位上跌到前座，總統也跌撞了一下。那一次車禍夫人受傷較重，當場整隻腳沒了知覺，總統倒沒什麼外傷。後來我們立刻將兩人送往榮總醫治，肇事的吉普車一看到發生車禍，竟嚇

得趕緊逃逸。後經調查，還是找出那位開吉甫車的師長，其實他當時只要別慌張，把車子停在一旁就好，一切事情都不會發生。

在車禍發生後的一次例行體檢中，我們在總統的心臟大動脈中聽到了雜音，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的。心臟大動脈有雜音，表示主動脈瓣膜有些受傷，只是車禍發生時總統自己並未察覺，故照常辦公。但就從那時起，他的精神便不像從前那樣好，當然這與他的年齡有關，但亦應與那次車禍導致心臟瓣膜受傷脫不了干係。人類的心臟主動脈瓣膜破裂，等於抽水機的活塞壞了一樣，血打上去又會倒回來，這是導致總統日後心臟衰竭的一大原因。

此外從那以後，總統的攝護腺也出了問題，我們找了一個西方公司的海軍泌尿科上校替他開刀，但那醫生刀也開得不好，使得總統後來老是有小便出血現象，對心理打擊很大。有幾次軍事訓練安排好讓他去檢閱，但臨出門時他又因小便出血而決定不去。但有時他又堅持要去，回來以後心理上卻更疲倦。所以攝護腺手術後，總統的身體狀況更不如前。我們後來又找了一位醫生 Nespid，乃前述海軍泌尿科上校的老師，由他連同鄭不非大夫一起為總統治療，慢慢地情況也有些改善。

但情況改善不久，還是出了問題。我記得有一次在日月潭，總統找我進去問話，當時我便發現他講話不大清楚，有點小中風的樣子。於是我有種警覺，下樓時便找了盧光舜，向他說明總統的情形，並決定要找神經科醫師來為總統看病，所以後來便找了王師揆來。

總統一直很喜歡中興賓館，那地方地勢又高，房子又大，夏天十分涼爽，風景也十分優美。但那地方風水不好，總統每次一去便生病回來。有一回他出去散步，突然在步道上就走不動了，還是我們拿了把椅子才把他扶回來，這表示他的心臟確實有問題。那時我與陳耀翰、

盧光舜及王師揆四人便開始考慮他是不是需要住院。

有一天陳耀翰與盧光舜正好不在，只剩我與王師揆兩人，總統突然覺得不舒服，便找我進去。我進去後他說覺得氣悶，我便告訴他：「總統恐怕需要住院了。」當時他馬上說：「好，我去住院。」就在王師揆下樓打電話先行準備時，總統突然一下子站不牢，整個人癱了下去，正巧頭靠在我的手上，我立即警覺，準備針藥替他打針急救。那副針藥是個救急的藥，極具危險性，我在打之前也曾考慮是否真要替他打那一針，假如打的話可能發生副作用，總統便可能死在我手中；但若是不打，總統也可能過不了眼前這一關。當時形成一個很緊急的狀況，我最後決定要替總統打針，打完以後他的情況確實慢慢地變好。那時王師揆電話也打好了，上樓告訴我醫院方面已準備好，我告訴他：「準備已經不需要了，因為我們不能去了，只能在這裡治療。」於是我們便把中興賓館當成臨時醫院，將所有醫療器材全部運來。當時的醫生除了我、陳耀翰、王師揆、盧光舜四人外，還把榮總幾位專科主任都請來，擴大成十二人的醫療小組。^{②⑨}

但因總統心臟方面的問題愈來愈危急，我們大家都想：「是不是有必要到國外請一位專家替總統看病？」後來經國先生也來了，我們便與他商量到國外聘請專家之事，並決議推盧光舜到國外尋找。當時我們並沒有設定要找某一位特定人才，但盧光舜一到美國，便巧遇當時已被內定為全美心臟醫學會會長的余南庚（人稱 Paul 余），也是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心臟科主任。我們與他相談之下，發現他又是中央訓練團出身，是老總統的學生，還是上海醫學院畢業的。許多淵

^{②⑨} 包括：熊丸、陳耀翰、鄧述微、盧光舜、董玉京、俞瑞璋、譚桂光、王學仕、趙彬宇、曾平治、鄭不非、林和鳴等十二人。

源之下，我們決定請余南庚回來為總統治病，但他說長時間回國恐怕無法配合，但短時間危急時他倒很願意，所以當時盧光舜便把他接回台北來。

余南庚來的時候，我們倒還沒想到總統的心臟疾病有那麼嚴重，只是想在心臟科方面多增人才以利研究。沒想到後來總統的心臟情況愈來愈差，非但血壓很高，連呼吸都很困難，晚上也不能睡，腳也腫了起來，彷彿有些心臟衰竭的現象。余南庚便為總統做了一次整體檢查，我也找了一位專業化驗師到山上來，每天替總統驗血、驗小便。那時總統許多瑣碎的事情（如指揮武官等）都由孔二小姐（孔令偉）來處理。

我們每天早上都要開會，Paul 余開始時都採用一些很劇烈的藥，但那藥都很有效，差不多一用下去便可立刻看到總統情況一天好過一天。經國先生與二小姐每天早上都參加我們的醫療會報，不過他們兩個都不講話。全部的醫生共分成四組，兩人編成一個班，內、外科各一人，二十四小時輪班，另有四個心臟科隨時接應，余南庚則擔任整個系統的領導，每天主持醫療會議。

余南庚把總統的病況處理得很好，還引進好幾種新藥。榮總也派來好幾位能幹的護士，總統病況可說一天好過一天。當總統情況好時，還可與經國先生談些國家大事，這種情況由民國六十一年維持到六十四年，三年時間對經國先生未來在處理國家大事上，有很大的助益。當時的國家大事實際上都是經國先生藉用老總統的名義處理，所以許多事在執行上仍十分貫徹。

經國先生的孝心確實令人感佩，他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則一定前來陪伴父親。後來總統可以自己吃晚飯時，都會先問：「經國來了沒有？」如果經國先生來了，總統便說：「開飯吧！」而如果經國先生還沒來，

總統就會說：「那再等等。」他一定要等經國先生一起吃飯。但緯國先生來時總統便不會如此，每次緯國先生來，才坐了一下子，總統便說：「好啦，沒事了，你下去吧！」他對緯國的態度就是這樣。但其實緯國都不敢走，他都到武官室去，吃飯時便到客廳吃。所以每次總統吃飯時，身邊差不多就是經國先生、Paul 余和我四人在他床前一起吃。

這種情形大約維持兩、三年，好一點的時候總統甚至可以起床，坐在輪椅上走一大圈。當中曾有幾度需要進一步檢查，總統便住到榮總六病房去，待情況穩定再回中興賓館，爾後再回士林官邸。回到士林後，我們仍舊同樣地將官邸佈置成一個小型醫院，還替他修了一架電梯，以利上下樓。

那段時間日子過得很平和，經國先生每天會把外面所有的事向總統報告，他倆父子晚上經常講話講得很久。不過他們講話的時候，我們醫生都會站在遠遠的地方，雖然還是看得見，但卻不見得聽得見。爾後余教授因不能長期待下，過段時候便回美國去了，但我們還是每天利用長途電話與他保持連繫，告知老總統的病情，而他也會給予意見與建議，所以老總統的病情一直都很穩定。

夫人後來也發現自己得了乳癌，便住到榮總開刀，還交代不要讓總統知道，只告訴總統她患了感冒，不方便來看。那段時間他倆夫妻都在生病，我們醫療人員往往也需要分成兩批，分別為他們看病，不過重心仍在總統那邊。

參、蔣公去世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老總統走的時候，我們真不知道他那一次會這樣過去，因為當時他的情況還維持得不錯，精神也還很好，腦子也還

清楚。每天中午夫人會來陪他，夫人不在時經國先生也會來陪他，他與他們兩個講話也都講得很清楚。

但在四月初時，我們在他的心臟監視器中，突然發現他的心臟曾停止一陣，於是我們趕緊在他的注射管中加一點藥進去，他的心跳便又馬上恢復跳動。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應該立刻在他的心臟旁邊加裝一個心臟調節器(pass maker)，假使當初裝上那個東西，說不定他還可以活下去。不過要裝心臟調節器，需要將一根管子由動脈插進去，直到心臟的位置，再由另一邊打開胸腔，把調節器放在肉裡，也是個不小的手術。而總統當時身子太弱，年齡也大，余教授一直在美國遲疑不決，我們也都不敢替他做那樣的手術，只能任他的心臟跳跳停停，不斷地替他打藥進去。

總統過世的前幾天，興致還很高的時候，常找一位四川護士羅小姐替他讀唐詩。他一直很喜歡唐詩，但就在那幾天，總統突然要羅小姐爲他讀「清明」詩，羅小姐翻了翻書，發現題爲「清明」的唐詩有兩首，一首是「清明時節雨紛紛」，另外一首則是古詩。總統就是要羅小姐替他讀這首「清明」古詩，而且還連讀了好幾遍。我當時記得很清楚，現在雖不大記得，不過我記得它最後幾句的意思是：「任何事都不必看得那麼多，最後還不都是一堆荒土」。

四月五日晚，我還記得電視正上演「保鏢」連續劇，當時大家都看得很瘋狂，每個人連飯都不吃，只守在電視前看「保鏢」。那天我正好也在樓上看連續劇，樓下則是鄭不非在總統身邊值班，他是位泌尿科醫師。當時他緊急打了通電話給我說：「老熊啊，你趕快下來看看，總統的心臟又停了。」我告訴他：「你趕快給總統打藥啊！」他說：「我打過了，可是他的心臟又停了。你趕快來看看吧！」我一聽情況不妙，便馬上說：「好，我下來。」一下去之後，我發現總統心臟停的次數果

然愈來愈多，我立刻告訴他們：「現在情況的確不大好，我們趕緊打幾通電話出去，把幾個醫生都找回來。」那時余教授並不在台北，所以我們和榮總心臟科權威姜必寧都待在官邸，親眼看到總統心臟停的次數很多。

那天總統的心臟停了好幾次，因為用藥已經無效，於是大家開始使用電擊急救，另一方面做人工按摩。當時夫人及經國先生都在場，緯國則人在台中。我們邊急救邊看著監視器，急救時監視器上的曲線還有些波動，不急救時便成一直線。大家看情形不妙，便向夫人報告：「看情形是救不回來，是不是要停止急救呢？」夫人說：「不，再繼續！」等了半小時，夫人也看到情況仍是一樣，最後才說：「停止吧。」

當我們停止急救時，正如傳言所說，外面正是一陣大雨。此時我們已把秦孝儀先生找來，主要目的是為總統立遺囑。當時秦孝儀大聲問道：「什麼時候（按：意指老總統何時仙逝）？」由我負責答覆。我那時也不曉得是什麼靈感，事實上秦孝儀問的時候，已是四月六日早上兩點，可我當時一想，真正開始急救的時間是四月五日晚上十一點多鐘，便直覺地回答孝公說：「四月五日晚上十一點五十分。」因為總統真正過世的時間，應該是他的心臟停止自主跳動後，也正是我們開始急救時。我們為他急救後，他的心臟並沒有恢復自主跳動，換句話說，四月五日清明節的晚上，確實是他過世的正確時間。

事後想想，之前他一直要羅小姐讀那首「清明」詩，後來也果真在清明節去世，冥冥中似乎自有巧合。此外，士林官邸屋後原有一座修得很牢的亭子，卻在總統過世當時歪了下來。日後我們還聽見一位華僑說，總統過世那天，他正由日本東京搭船前往台北，突然海上一陣大雷雨，使得船身不停搖擺，他在船上很怕，突然間又聽到無線電報導老總統過世的消息，許多事情不光在台北有巧合，連在日本海上



蔣夫人授二等景星勳章予熊丸時留影。

都有很巧的事。

我記得總統的遺囑寫好後，夫人表示要看遺囑內容。她看完遺囑後對孝儀說：「你加幾句進去，說明他是信基督的。」所以很多人問總統遺囑裡，為什麼連基督的事情也要寫，事實上那是夫人的意思。也有很多人怪孝儀，說他不該在後面加上「秦孝儀書」四字，事實上他也是參考以前孫總理遺書後有汪精衛記等文字的模式。

總統去世那天，大家整晚都沒睡，連夜將總統移靈到榮總，爾後舉行大殮等儀式。大體來講，總統去世的過程雖然經過很多複雜程序，但他並未受到太大的痛苦，也沒有經過太多醫療上的折磨，不像經國

先生過世時那樣痛苦。我們對老總統最後的急救，可說在醫療上能夠盡到的心力都已盡到。如今唯一覺得缺憾的，就是當初沒有爲他裝上心臟調節器，如果當時爲他裝上，他也許還能多活幾個月。

老先生過世時的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當時醫療小組成員裡，如今也已走了好幾個，如王師揆、盧光舜、鄭不非等都已過世。其實夫人也很欣賞我們這個醫療小組，所以後來嚴家淦繼任總統後，夫人



黎玉璽（右）授予熊丸（左）三等雲麾助章留影。

還以嚴總統的名義，爲我們頒贈勳章，以嘉獎我們在總統長臥病榻期間，衣不解帶地輪班照料。我當時拿到景星二等勳章，乃相當於部長級的勳章；此外，我還曾拿過雲麾三等與四等勳章，都有證書爲憑。

老總統纏臥病榻其實有三年時間，但因夫人與經國先生都不主張把這件事向外公布，所以我們只要一出總統房門，一定絕口不提總統健康問題，故總統臥病之事外界並不知情。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孝勇與方怡智小姐結婚時，還曾去榮總六病房見過總統，並與總統、夫人合影。外傳他當時手不能動，故照相時要綁起來固定在椅子上，其實是以訛傳訛的說法。當時總統手上插有醫療需要的管子，那管子本身



民國六十二年孝勇夫婦新婚時，在榮總六病房與蔣公夫婦合影。

需以木板固定支撐，否則手彎起時針頭容易跑出來，故才會將他的手固定在椅子上。其實那陣子他的精神還算好，只是那段期間他都不接見外賓。

夫人曾經很感慨地說：她一生與總統共同經歷諸多患難，唯一一件歉然的事，便是後悔當初沒有阻止總統不要動攝護腺手術。夫人說總統個性太強，決定一定要開刀，夫人勸他等一等，要由美國爲他請最好的醫生來，總統都不聽，故只好由他去。但後來夫人看到那位美軍醫生準備手術時竟十分不鎮靜，以致手在發抖，便覺得應該阻止總統不要開那次刀，但又怕當時勸總統，便違反總統的本來意志，不曉得總統又要發多大脾氣，所以當時她便忍下，希望那位醫生能開得成功，但如今回想起來才覺得後悔。

第七章 漫談經國先生

壹、經國先生其人

經國先生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不像老總統一看不對便當面講。在我認為，老總統是位較仁慈且顧念舊情的人，經國先生則是非分明，卻不念舊。只要你做錯了，就算你是皇親國戚他也照辦，例如王正誼、衣復恩等人便都是如此。

據我的了解與認識，老總統與經國先生都是一生為國，幾乎沒什麼私心的人。兩人生活都很簡樸，只能算是中等商人的生活待遇。在溪口時，我們曾有三個月發不出餉，大家平常生活過得苦，伙食開得很差，跟外界想像的根本不同。且侍從室人員所拿的薪水都比外界少，星期假日也不得休息，不但日子過得苦，工作還很多。但我們仍心甘情願待在官邸不走，正是因為看到他們一樣過著苦日子，心想他們能為國家這樣奉獻，我們又怎麼忍心走呢？許多危險我們也一起走過，在許多轟炸場合中，老總統常將個人死生置之度外，只想著怎樣對國家才好、才有利。我常覺得：他們都不怕危險了，為什麼我要怕？他們一輩子不管究竟做對或做錯，我想都已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沒有人可以抹滅他們的苦心。夫人也是一樣，她一生為國家付出很多，所以現在不論陳市長在士林官邸裡怎麼搞，夫人都不在乎，因為她覺得那是身外之物。夫人興辦了一些機構，都是為了幫助別人，外人卻

由壞的一面猜想，故意忘記與抹黑她的貢獻，對她真是不公平。

過去經國先生在七海新村的客廳，根本不像個總統的家，比一個辦公室大不了許多，且所有沙發都是台灣製的。那幾把沙發數十年如一日，擺設的樣式也永遠相同。桌上則放著一架老總統送的電視機，牆上掛著夫人送的兩幅畫，整個客廳十分簡單。客廳之旁即為餐廳，我在經國先生還沒生病時去七海，他往往會留我吃中飯或早飯。經國先生家裡最奢侈的就是吃魚子醬(caviar)，台灣這邊的烏魚子是紅的，俄國出產的魚子則是黑的，是十分珍貴的東西。經國先生在俄國留學時，都在兩塊麵包間塗一層黑魚子醬吃，所以吃黑魚子醬便成了經國先生家裡最大的享受。

除此之外，經國先生家裡所開的菜，往往頂多再有半條黃魚。有時我問他家女傭人阿寶：「為什麼只有半條魚？」阿寶說：「因為另外半條昨天吃掉了。」在經國先生家裡，一條黃魚是分兩次吃的，且在他家常吃隔夜的剩菜，今天吃不完明天再吃。我記得最妙的是水果，他家水果拿出來吃時都已經爛了一半。我因與他們很熟，有一次便問阿寶說：「為什麼家裡沒有好蘋果？」她說：「先生講的，舊蘋果要先吃掉。」因為經國先生家裡常有人送蘋果來，新鮮的蘋果收下後便先放著，但等舊蘋果吃完後，新蘋果也變舊了，所以在他家吃的盡是爛蘋果，可見經國先生過得真是清苦。他家裡也有位廚師，但那廚師每天只到他家弄一頓飯，便又到外面兼差，因為他在經國先生家每天只煮那麼一頓，錢實在太少了。經國先生從沒在席上要求吃什麼菜，往往給他什麼便吃什麼。最荒唐的是他家阿寶，經國先生喜歡吃甜食，但他有糖尿病，不能吃甜食。阿寶不懂，依舊每天給他吃冰糖燕窩，經國先生一看到冰糖燕窩，便生怕別人看到似的，趕緊三口作兩口地吃掉。方良女士對這方面的事也從不過問，所以經國先生的身體便愈來愈差。

經國先生這種不顧身體的觀念，都是吳稚暉先生教他的。吳稚暉先生說：「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經國先生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對健康當然也就不管，只要吃飽就好。這種觀念其實是不對的，因爲一個國家元首連自己身體都不管，又憑什麼來管國家大事呢？不過經國先生也曾經很感慨地對我說：「國家的事再困難，我都可以全心全意地做，唯有對家事我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幾句話真是至心至性之談。經國先生的家事真把他煩得夠苦，他的親人在外面老是惹禍，有的一個月就惹一次禍，讓經國先生傷透了腦筋。事實上還有很多事外面的人都沒向經國先生報告，因爲如果每件事都報告給他，恐怕他早就氣死了。更何況人都是聽不得別人說自己親人不好的，哪還有人敢向他報告呢？孝章和俞揚和（俞大維之子）的婚姻，也讓經國先生很不開心，但因孝章意志堅定，使得父母也沒辦法。

我在重慶時代便與經國先生偶有接觸，當時經國先生已帶著方良女士由俄國返回重慶。不過我們那時的接觸不多，只是偶爾到他家裡吃頓飯而已，對他的了解仍然很少。後來老總統由重慶經南京到上海，在上海那段時間，經國先生忙著經濟方面的事情，也就是所謂的打老虎時代，我對他的接觸更是不多。直到老總統下野至浙江溪口，我與經國先生的接觸才開始增多，因爲那時我經常有機會與老總統身邊的核心人物接觸，而經國先生正是核心人物中的核心。當時他經常跟著他的父親，並爲父親安排身邊所有的事情。老總統吃飯時經國先生也一定陪伴在旁，父子倆幾乎形影不離。^{③④}

^{③④} 有一次清晨我闖入經國先生書房，見經國先生俯伏窗前禱告及深思。在先總統甫去世的一段時間，每遇國家有重大決定時，經國先生必至大溪慈湖，在先總統像前默思良久，且常在慈湖過夜，次晨始返。

當時李宗仁已以副總統身份代理總統，溪口幾乎與外界隔絕。那時老總統下野，正可看出黨政軍中究竟有哪些人對他是真正忠心。一些以私人名義發電報求見老總統者，用心各不相同，經國先生通常會先過濾接見名單，所以大部份人均遭婉拒。但獲接見者當中，仍有些居心叵測的人物，例如當時張治中已經投共，還到溪口勸老總統出國，因為老總統一天不走，李宗仁的政權便一天不穩固。經國先生過濾名單時，有時也同意讓一些極端份子前來晉見，聽聽他們說些什麼。不過除了這些居心叵測的人外，還是有一些真正忠心的人，例如財務署長吳嵩慶，以及一些海空軍忠心耿耿的人員，也前來求見老總統。

經國先生那時當然很忙，不過剩下來的時間他還是會與我們（俞濟時、周宏濤、曹聖芬、夏功權和我）攪和在一塊，一方面談國家大事，另一方面也表示慰勞之意，有空便一起吃飯聊天，態度十分和藹可親。那時他真正放低身段與我們生活在一起，所以也從那時起，我們對他的了解愈來愈深。

那時在大陸老總統還喜歡聽戲，有個京戲班子便專程到溪口來為總統唱戲。我還記得那班子最紅的名角就是美豔親王焦鴻英，許多溪口民眾都圍在那兒聽她唱戲，倒是總統真正出來聽的時候並不多。後來我們離開溪口，上了江靜輪，黎玉璽的太康軍艦跟著船後面就近保護。在江靜輪上，我們與經國先生更是接近，幾乎天天碰面。當時覺得他真是沒驕氣，對衛兵也一視同仁，十分平民化。到了鼓浪嶼後，我們在那兒住了好幾天，經國先生那時常和我聊天，有時還會送我一些小東西。對我們來說，他這樣的舉動除慰勞外，更顯親切！

後來我們在澎湖馬公也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每次他先陪老總統吃過飯後，還是會到我們那裡，再陪我們一起吃，如此日復一日地相處下來，大家可說已打成一片。之後我們到了高雄，住在西子灣，

那時老總統開始約見許多軍事將領及高級官員，來見的客人似乎愈來愈多，同時國外來的電報也不少。經國先生那時比較忙，但他還是能夠關心到老總統周圍每位核心人物的工作與生活。有時我向他透露我們還需要一些藥品或書籍，他一定有辦法為我們帶來。所以那時我們都覺得他是一個最可靠、最親切的人。

之後我們北上到台北陽明山，經國先生把他的家人都接到長安東路，同時也幫我們把家人都接來台北，由夏功權負責通知接送事宜。此外，老總統身邊幾個最親近的人也都安排了房子，那時我與周宏濤、曹聖芬、張其昀、陳舜畊等都住在龍泉街，那原來是為立法委員們修的房子，其中有一部份撥給國民黨改造委員會使用，我們分到的就是改造委員會的房子。

龍泉街在師大那邊，過去沒有所謂的師大路，且現在的師大路過去叫做浦城街。我們最初也算住在浦城街，但後來他們又把浦城街的一條巷子改稱龍泉街，所以我們變成住在龍泉街八十四巷。那條街很妙，我們對面那排頭一家住的是田炯錦（前內政部長），我們這邊還有鄭彥棻、張其昀、周宏濤、曹聖芬、陳舜畊和我，對面那排還住著一些警衛人員。結果住我們這一排的人都比較發，住對面那排的都很沒落，所以他們都笑說：「浦城街兩面不一樣。」

經國先生雖然住在長安東路，但仍與我們保持連繫，差不多每月均有兩三次會請我們到長安東路去吃飯。因過去在成都有一家「不醉毋歸」小酒家，所以那時我們皆戲稱長安東路是「不醉毋歸」，每次經國先生一請客，美齡號駕駛衣復恩、武官裴毓芬、^①連絡局長胡旭光等

^① 裴毓芬是個很好吃的人，他家廚房菜做得很好，兒女也都很不錯，可惜他年紀輕輕便過世。

人都在場，大家都是酒量很好的人。因當時前線無戰事，台北生活十分安定，所以大家聚會時常常暢快地痛飲，把一隻腳蹬在椅子上，用大臉盆裝滿黃酒，划拳輸者便要一口氣喝光臉盆裡的酒。我記得有好幾次吃過飯回家，大家都記不得第一道菜上什麼，因為還沒看到菜時人就已經醉了。聚會結束時也很妙，大家常常穿錯彼此的衣服鞋子，甚至坐錯車子也不足為奇。更妙的是有一回聚會結束，工人來清理場地時，才發現桌底下還有一位客人躺在那裡，醉得不醒人事。

當時一方面有人因有家歸不得，有情緒要發洩；另一方面有人不斷想著如何圖反攻之舉，各有各的複雜情緒，故大家在工作崗位上雖很拚命，但下班後要痛快時也很痛快。我們那時大部分喝的是紹興黃酒，不過那時最好的酒倒非紹興，還有 Johnny Walker，但尚無 X.O。



經國先生與熊丸夫人李忠慧。



熊丸與經國先生合影。

公賣局賣的酒就是像紹興那樣的黃酒，同時金門也出了很多好酒，例如高粱。

我在家排行第五，但內人在家排行第三，聖芬他們都稱內人「三嫂」，所以我便成了「三哥」。經國先生也跟著聖芬喊我三哥，孝勇則是見到內人便喊她「熊媽媽」，但見到我卻也喊「熊三哥」，他們父子倆都喊我三哥，實在很有趣。

記得經國先生有一次突然對我說：「熊三哥，你要請一次客囉。三嫂的菜做得很好，我們什麼時候吃一次？」盛情難卻之下，我便和他們訂了一個時間，在龍泉街家裡請了一桌。那天大家都來了，正好菜要上桌時，老總統突然來了電話，要我上陽明山一趟。我當然不能不去，只好對他們說：「對不起，我這個主人要走了，不過女主人還在，大家

盡量吃吧！」待我陽明山的工作做完，回家時我心想：「這麼晚了，客人一定都走了。」結果回家一看，客人全都還沒走，男的、女的全在餐廳，就是女主人不見了。當時我覺得奇怪，便問他們：「大家還沒吃飽，女主人到哪去了？」他們說：「我們早吃飽了。」原來經國先生下了命令：「男主人還沒回來，大家不准走。且非但不准走，還要服侍女主人。」我這時才發現內人已經醉倒在床上。

因為種種機會的相處，大家和經國先生彷彿已經很熟，每逢過年或家母生日那天，經國先生一定到，大家彷彿兄弟一般的情感。甚至後來經國先生學畫，拜高逸鴻為師，還請我和內人到長安東路府邸看他畫畫，畫好的蘭草作品還題字送給我們，我們也把那幅蘭草掛在家裡客廳。他後來每次來我家，都會上前再看一下那幅畫，直到他畫了



熊丸（左）與經國先生（右）攝於橫貫公路中興嶺。



橫貫公路初建成時，左起：熊丸、陽明山管理局金局長、趙聚鈺、蔣中正、林則彬、蔣經國、孫義宣。

一段時間，畫工進步了，再到我家看那幅畫時，便說：「這幅畫實在不太好，掛在這裡不好意思，我再好好畫一幅來和你換回去。」之後他果然又回去精心畫了一幅畫，題了字又拿到我家，結果內人把他新畫的畫收了下來，原來那幅蘭草一樣不還他，他雖然吵吵鬧鬧，但也無可奈何。大家在那時候真是很熟，我們與長安東路也經常往來。

以後我們走得更近了。那時老總統擔心經國先生的健康，常強迫他休息。而每次他一休息，往往會邀我們全家，以及他的隨從參謀鍾湖濱、方良女士的祕書宋承緒、公路局長林則彬、輔導會主委趙聚鈺

等一同出遊，由我內人擔任總管，負責吃住問題。我們一起出遊多次，走過棲蘭山莊、阿里山、溪頭、武陵農場等地，從他擔任國防部副部長至部長，大家一直很熟。

記得有一回老總統又要經國先生休息，於是帶著經國先生及官邸眾人至青山渡假，我與內人亦隨同前往。當時我因每週日上午均有門診，故暫時離開回台北看完門診，下午再趕回中部。那一次由台北趕回台中，我在山下便先通知內人我已到達，孰知內人要到谷關來接我時，經國先生夫婦也表示要一同前往。當時電力公司的駐守人員一見經國先生要下山迎接客人，以為必是五院院長中的某一位要上山，便自動拿著照相機陪同經國先生前往迎接。一到谷關，電力公司的人員一看竟是來接我，都笑稱：「原來是第六院院長來了。」此事後來傳為趣談，但也因此可見經國先生實在深具親和力。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與內子及經國先生在谷關共乘一輛吉普車，公路局林則彬局長亦隨行。途經橫貫公路一處新闢道路時，突然自車旁的山壁上落下一塊大石，滾落在我們車後幾步之外，大家都被突來的落石嚇得面面相覷。事後我們均未曾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但及今想起，假若當時吉普車真被落石擊中，恐怕中華民國的歷史就要改寫。

經國先生接任行政院院長後，過年過節時便不來我家，而且也不大吃酒。每次坐在席上都是冷冷清清，一副吃悶酒的樣子，彷彿有些過忙而高處不勝寒的味道。而我自進官邸做事後，便一直保有一個大原則：「無求品自高」。我對什麼都無求，給我什麼東西也好，不給我什麼東西也好，要我做就做，但我無所求，故任何人的任何態度對我而言都沒有太大影響。因此我也順應經國先生的情況，很少與他保持來往。就在這時，孔二小姐出現了，因為她的關係，所以我後來與夫人的接近較多，與經國先生更是疏遠。

有好幾次，經國先生要我轉報夫人處理一些事，但若二小姐不同意，則夫人往往也不會同意，我不知該怎麼辦時便乾脆不報不答。例如決定中正紀念堂設置地點時，黃杰（達雲）對我說：「那地方不該拿來做中正紀念堂，因為那是個黃金地帶，若把那地方拿來做中正紀念堂，台北就少了很大的一塊黃金地帶。紀念堂不如放在陽明山或任何地方，不應該放在市中心。」我那時也沒考慮好這件事的輕重緩急，便直接把這些話告訴夫人，夫人便去問經國先生的意見，說是熊某人說黃杰認為如何如何，問經國先生的意見。結果經國先生說：「我們已經決定的事情不變。這地方雖是台北中心地帶，但我們覺得老總統的紀念館本就應該放在市中心，且台北空地不夠，放在這裡可以增加台北空地，市民也多一個休閒之所。」我知道經國先生那時心裡一定不痛快，因為他覺得那樣大的事情我不告訴他，反而直接向夫人報告，我猜想他心裡一定是這種感覺。二小姐與經國先生兩人完全不對味，很多事情都合不來，讓夾在中間的我實在頭痛。

另外，王正誼的事發生後，我因事前與王正誼很熟，出差時都與他住同一房間，對他了解很深，故我當時絕不相信他會爲了幾十萬元而貪污。當初告他的那位楊建築師也一直提不出有力的證據，但法官卻據此便認定王正誼有罪，判處他無期徒刑。當時經國先生有心殺雞儆猴，因為王正誼是老總統母親王太夫人娘家的唯一後代，與經國先生有親戚關係。夫人當時曾經問我：「你相不相信正誼會做那樣的事？」我說：「要我說真話，我不相信。」夫人說：「我想也是，他不應該會這樣才對。可是我跟經國講，經國卻說他事實俱在，鐵證如山，所以我也沒法子講。你看要怎樣才能幫正誼一點忙呢？」我說：「我也不曉得要怎麼辦。」因為連夫人都講不通，我還能有什麼辦法？

王正誼就這樣被判了無期徒刑，直到有一回他在獄中心臟病發，

被送到台大醫院，可是台大不敢收留他，給了他一點藥便要他回去。過後不久他又病發，這次送到我的醫院，當時我是省立台北醫院院長，我一查王正誼的情形，才發現他病況嚴重，還有一點小中風。當時我認爲他應該住院，因爲他的情況不適宜再回監獄，應該有特別治療才是，所以我便對主治醫師說，要他開一張住院證明，讓王正誼住院，同時向法院說明我們的處理方式。法院得知我們的意見後也不敢講話，只是要我們把王正誼的情況詳細寫下讓他們了解，於是我便親自寫了一份極詳細的說明，表明王正誼的確需要住院。後來法院把我寫的那份說明呈給經國先生，經國先生看完後眉頭一皺，也無法處理，於是便說：「好吧，讓他治療之後再說吧。」此後王正誼在省立台北醫院一住十幾年，我爲他單獨關房，法院派人在房外看守。但王正誼房內有一支電話可與外界聯繫，且至少在房裡行動十分自由，比在監獄好得多。王正誼在省立台北醫院一直住到經國先生過世後刑滿出獄爲止，所以他對我一直存有一番感激。我則認爲朋友之間錦上添花沒意思，要能雪中送炭才是，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就是做了這件事。經國先生過後也不與我計較，只說：「好啦好啦。」表示他也覺得我這件事做得並不過份。

經國先生當總統時，除周應龍外，過去老總統用的人他都不用，純粹用些年輕人，甚至連專司照相的胡崇賢他也不用，自己派了一個人負責攝影事宜。寫文章他也用另一批新人，只在寫完時拿給孝公看看。周應龍做到文工會主任以後，因爲整個時代與社會均有極大改變，報紙一天到晚開罵，立法院一天到晚吵架，應龍管的又是宣傳，所以他覺得壓力很大很難過。應龍是個緊張大師，遇事總十分緊張，故當他遇到那樣的一個時代，便覺得自己已經做不下去，想要辭職。經國先生沒辦法，便同意他辭職，所以後來宋楚瑜才升上去。應龍原本是

很紅的人，但他下來後經國先生便不再找他。爾後他猝死於心臟病，奇怪的是，我與他那麼熟，卻不曉得他有心臟病，他從未對我透露一個字。據說他死的那天，正要由家裡出門辦公，卻在還沒上車前突然說身體不適而回轉，回到客廳便倒了下來，再救也救不活。應龍就這樣過世了，我們都覺得十分可惜。

另外一位經國先生例外採用的舊人是盧守中。盧過去一直是專為老總統讀報的人，他在讀報之前都會先把報上相關的資料查得清清楚楚，以便老總統問起時能對答如流，老總統覺得他很不錯，便一直找他讀報。後來經國先生繼任總統，馬上重用盧擔任機要祕書，不久後又升任機要室主任，盧也一直兢兢業業，全心全力地做。盧知道自己身體不好，所以勤加運動，每次都趁經國先生午睡時，和他太太溜出去打高爾夫球，那時通常是太陽最大的時候。有一次他還沒打幾個洞，便對他太太說：「我身體有點不舒服，想要休息。」他太太說：「好啊，就到亭子上休息吧。」不料他才走進亭子便昏倒。當時球場上沒有任何醫生，也無人懂得急救方式，他太太打了電話叫車，才把盧送到榮總，但彼時盧已斷氣。周應龍與盧守中都是我很熟的朋友，看到他們那樣好好的一個人突然過去，實在令人十分難過。

方嫂（蔣方良）過去很容易感冒，我幾乎每兩個禮拜便去她家幫她打預防針，打了針後便不易感冒。每次我去幫她打針，她便給我一杯冰紅茶坐下聊聊。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院長後，我因覺得自己最好少去，於是就把打針的間隔時間盡量往後拖，直到經國先生自己打電話來說：「你方嫂很惦念你，你有好久沒來了吧？」於是他講一次我才去一次，他不講時我能拖就拖。因為我看那時經國先生的情況很複雜，我去很容易引起誤會；此外方嫂身體也不怎麼好，她自己也在榮總看病，我這樣插進一腳，萬一發生變化時該由誰負責？於是我便慢慢盡



經國先生（右一）與方良女士（右二）於橫貫公路上留影，右三戴墨鏡者為熊夫人李忠慧。

量地往外退。一開始時經國先生還會親自打電話來，過後他也不打了，他不打我便不去，所以經國先生後來朋友愈來愈少。原本輔導會主委趙聚鈺和他太太也與七海很熟，但趙死後，他太太也中了風，便不常與七海往來；而前安全局長王永樹的太太，原本也經常到經國先生官邸，但王永樹出事後，他太太也不好再去；衣復恩太太也是一樣，衣復恩出事後她也不好去了。

經國先生是那種城府很深的人，沒有人看得出他心裡究竟在想什麼。他表面上好像對你很好，其實可能早就想擺脫你。他之如此深沈，可能部份受到俄國共產黨的影響。由於他掌管情報，情報來源很多，所以他身邊每個人有什麼情形他都知道。他不像老總統那樣念舊情，

所以在他身邊的人都有一種伴君如伴虎的感覺，大家都想盡量離他愈遠愈好。

貳、經國先生的健康

經國先生的身體自從發現有糖尿病後，體力即漸漸變差，可是他仍舊不好好在醫院做檢查，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每當他身體發生問題時，他第一個問醫生的就是：「這個死不了吧？」醫生若說：「死不了。」他就會說：「死不了就好。」他的病因此愈拖愈重。糖尿病把他的神經都破壞了，走路時痛得要命，所以後來總統府才爲他修電梯。他半夜經常無法入睡，參謀總長郝柏村不曉得曾在半夜去官邸看過他多少次，經國先生那時與郝談國家大事都選在半夜。而我與孝儀也曾數次在半夜時被經國先生找去，他總是東拉西扯地聊一整晚。那時他經常徹夜無法入眠，一方面因國家大事令他憂心，另一方面也是因爲身體的緣故。

然而我們都沒想到經國先生後來會因食道靜脈擴張，導致靜脈破裂而死。這個症狀及肝硬化應該都是糖尿病所引起。在他生病時，唯一在他身邊的就只有孝勇，但孝勇也不曉得他父親竟病得那樣重，故沒把這件事當成大事來處理。所以一下子事情發生時，經國先生便突然過世，因爲平常實在太疏於調理。

經國先生一生真是沒什麼享受，他最大的樂趣就是與民眾接近，我們可以看到他經常下鄉，與百姓士兵生活在一起，直到他最後已經寸步難行，他才把自己圈在家裡，只在半夜才找幾個有關係的人談談，其他什麼事都不能做。談起經國先生一生的貢獻與變化，除重大的國家建設與開放大陸探親外，由他爲人心態的轉變看起，也許將來歷史

家們對他也會有另一番的看法。

參、經國先生與蔣夫人

如外間傳說，經國先生跟蔣夫人間確實有些意見，但他對夫人很尊敬，夫人說的話他大多不會違反。事實上有時候經常是下面的人在吵，夫人身邊的人和經國先生身邊的人彼此在那兒爭鬥，所以夫人與經國先生之間有時明明不是那回事，卻被底下的人說成那樣。

例如圓山大飯店在高雄愛河旁有家分店，那塊地原本是國小教育用地，其上本有違章建築，圓山將它修了一下便成了一家分店。那塊地的位置很好，所以當圓山知道那塊地原是一所國小用地時，並不想換到另一個地方。然而經國先生因與本省人很接近，認為高雄圓山應該換地方，但自己卻不好意思跟夫人講，便要我勸夫人將高雄圓山換到另一塊地去。我去見夫人時，正好孔二小姐也在那邊，我便先向二小姐報告，不料二小姐說：「那地方不能換，圓山在那兒經營得很好，要那學校另外找塊地嘛，為什麼一定要那塊地建學校呢？」於是孔二小姐要我別對夫人說，這讓我十分為難，因為夫人對她十分信任。既然她要我別講，我當然就不能講，於是我只好回去向經國先生報告，經國先生只把眉頭一皺，便將這案子直接呈報總統，總統也認為那塊地該換，才解決了高雄圓山的土地問題。

這件事在訊息傳遞的管道上出了問題，讓我們這種夾在中間的人十分為難。然而實際上問題並非存於經國先生與夫人之間，外界傳說有「夫人派」和「太子派」之別，事實上夫人與經國先生間也談不上什麼派系，都是下面的人在那兒攪和罷了。

肆、經國先生與章亞若

章亞若的死至今仍是個謎，因為真相如何沒人曉得。從好的方面來看，有人說她是病死的；但從壞的方面講，有人說是經國先生把她害死的，這兩種說法都有。但從章孝嚴與章孝慈兩兄弟對經國先生的態度來看，假如真是經國先生害死章亞若，他倆兄弟一定懷恨在心，根本不會對他爸爸那麼好。而且經國先生也不是那種人，會把一個好好的人害到那種程度，更何況對方還是與他同床共枕多年的人，還正好生完孩子，於情於理他都不會下這樣的毒手。經國先生如果有那樣兇狠的個性，日後一定還會有類似的心狠手辣行為，但他一直都沒有，他翻臉無情關人入獄的事有，但絕不到殺人的地步。而經國先生的部下如果沒有經國先生的同意，當然也不敢隨便做這種事。此外，以當時的醫藥衛生情形來看，醫生診療失誤或疏忽均屬極有可能。所以真正講起來，恐怕章亞若病死的可能性較高，只是因為她身份特殊，所以才會有許多穿鑿附會、捕風捉影的謠言出現。

當時蔣、章的這段婚外情，我想老總統應該也不知道，因為那時我們從未聽說過這件事，直到最近這幾年才知道。而且老總統以前雖然也結婚幾次，但他管教下一代卻很嚴格，經國先生想當然也不敢讓他知道。不過夫人倒比老總統早知道，只是她沒跟他講。

第八章 漫談孔二小姐與圓山

壹、孔二小姐其人

二小姐長得又瘦又矮，其貌不揚。她不喜歡照相，所以我沒有和她一起的合照，不過時代雜誌(Times)倒曾刊登過她的照片。很多人不了解她，因為她從不到公共場所。綜觀她的一生，雖然有功也有過，但我想仍是功大於過。

她是個精力充沛的人，心地其實也很好。她早期吃酒吃得很兇，常常喝醉，平常晚睡晚起，過慣了夜生活。她吃東西很不講究營養，專吃一些辣的、酸的四川口味。孔家幾乎個個死於癌症，如孔夫人(宋靄齡)、孔大先生(孔令侃)及孔二先生(孔令傑)都有癌症。

二小姐因為長得其貌不揚，人又刁蠻，所以從沒人敢追她，故她除有兩位「紅粉知己」外，從沒聽說有什麼羅曼史。據說在她年輕時候，夫人曾有意為她促成親事，介紹當時的重慶警察局徐局長（後任立法委員）給她，然是否真有其事，我不清楚。之後總統與夫人也曾打算將胡宗南介紹給她，但也沒有成功，因為根本沒人受得了她。她的婚姻一直沒著落，因此對事業便極為認真經營。

有一次孔祥熙院長生了病，孔夫人在美國想把孔院長由台灣接回去，要二小姐也一塊走。但當時二小姐不願意讓孔院長走，因為她自己不想走，要是孔院長留在台灣，她也可以安心地留在這裡。但當時

夫人也聽孔夫人的話，勸二小姐回去，二小姐卻仍舊堅持孔院長的身體太差不能遠行。最後還是總統決定要孔院長返美，當時夫人便問我的意見，看看孔院長到底能不能走，二小姐站在旁邊便一直恐嚇我：「如果你說能走，那你要負全部責任喔！」我看孔院長當時的情形應該是可以走的，也不能對夫人撒謊，於是仍對夫人說：「應該是沒有問題。」夫人便命我護送孔院長回美國，二小姐也不得不跟著回去。

二小姐的個性很好強，有一回振興醫院院長有事報告夫人，但實際上振興醫院有許多事都由二小姐做決定，但那院長就是不報告二小姐，一定要報告夫人。二小姐對此很不高興，因為她覺得：「你明明知道事情都是我在做，卻偏要目中無人地不把我放在眼裡。好，你所報告的事，我就不讓你通過。」於是二小姐便故意在暗中搞鬼，讓那院長更加難堪。其實那院長犯不著與二小姐打對台，因為就算打贏了，對他也沒啥好處。

孔家兄弟姐妹的排行次序是：大小姐孔令儀，大先生孔令侃，二小姐孔令偉，二先生孔令傑。孔大小姐完全是個賢妻良母，與二小姐有著極大不同；而孔大先生是美國碩士，在台灣開設公司做點生意，在香港也有公司；孔二先生則是西點軍校出身，官拜少校 (major)，退伍後經營石油生意，在美國休士頓 (Houston) 擁有油井，且有兩架飛機。

宋子文院長在美國也擁有一家廣東銀行。綜觀而論，蔣、宋、孔、陳乃中國近代四大家族，也是主宰近代中國命運的四股巨大力量。其中，孔、宋兩家都是極有錢的家族，而蔣、陳兩家則以政治上的影響力為大。

二小姐在官邸的影響力很大，她若發現官邸哪位武官不好，便會告訴夫人，只要夫人與總統講過，總統就會把那名武官調離。有一次

我奉先總統之命赴美進修，當我離開官邸後，按理已經離開這個圈子，故回國後我便繼續待在醫院任院長，沒有回官邸。沒想到二小姐與代替我職務的陳耀翰談不來，過後二小姐便對夫人說：「陳醫官一個人恐怕做不來，許多事都不周到，恐怕要再加個人，最好再把熊丸找回來吧。」夫人第一次聽到這些話時，也不覺得特別需要增加人手，但當聽到第二遍時，因覺得我與他們也熟，回來也很好，於是便對總統說，要總統接見我。見過總統之後，我自然又回官邸去，這段經過我事後才知道，可見二小姐在官邸的影響力確實很大。

然而一般來說，官邸裡的人幾乎個個都恨二小姐，因為她把總統及夫人分成一級，對他倆絕不冒犯；至於經國先生和緯國先生則是另一級，她對他們都客客氣氣，不遠也不近；但除上述兩級外，二小姐對其他人講話都是用毫不客氣的命令口吻，尤其對副官更是頤指氣使，處處找麻煩，很多小事不如她意便不行。因此副官們與廚房的人都恨她，但拿她也莫可奈何。所以由官邸出來的人若提及二小姐，從不會有一句好話。

然而二小姐的種種結怨作風，主要都是爲了夫人好，任何人只要有一點點不對，她一定追根究底。有一回夫人晚睡故想吃宵夜，廚子知道後，便拿重新熱過的東西給夫人吃，二小姐知道便罵廚子：「你爲什麼拿熱過的東西來？做新鮮的不好嗎？熱過的舊菜味道就不對了，炒點新的菜上來！」遇到這種時候，廚子往往就會恨二小姐，因為他們認爲：「夫人都不講話了，就妳一個人在講話。」另如花沒插好，侍衛官在樓下講話聲音太大，下人不站著反而坐著等等，二小姐都會嚴加指責。

二小姐乃上海滬江大學經濟系畢業，天賦相當高，英文也很好，只是中文差些。她對教會裡的東西懂得很多，因為她一直都在那樣的

環境裡長大。我到台灣以後開始與她接近，她在官邸裡與總統、夫人平起平坐，總統與夫人平常對她也優遇有加，她講的許多話都可以代表夫人。而且官邸由上到下的事她都管，佣人如果有事瞞她都是瞞不了的，因為官邸裡所有的人她都叫得出名字，所有的事她也一清二楚。

傳說她早期因為脾氣不好，時常拿槍打人，因為那時槍枝並未管制，她隨時都可以拿到槍。不過她拿槍嚇嚇人的事是有，真正打死人則不可能，倒是孝武曾經拿槍打死過人。她平常也喜歡騎馬、開車和打靶，她的槍法很準，小時候特別學過；車子也開得很好，喜歡開美國別克車 (Buick)。她開車有規有矩，從不違反交通規則，不過後來她自己也不開了，有專屬的司機為她開車。

她在財務、工程及醫學方面都極具天份，振興醫院的雙十字建築便是她一手創作，連藍圖都是她親筆所畫。二小姐確實是個人才，只可惜她是女性，又姓孔，總統與夫人不好正式用她。二小姐還曾經想要興辦醫學院，因為她對醫學很有興趣，有一度她還曾想買下台北醫學院，可惜後來沒有成功。但她終究還是把振興醫院擴大了，基礎也已建立，但她自己的身體卻不好，因為她煙抽得很兇。

正因為二小姐煙抽得兇，有一回醫生發現她生了乳癌，但她卻堅持不開刀，因她認為「肢體不能殘缺」。當時乳癌無藥可治，夫人勸她說：「妳如果不開刀，等到癌細胞擴散，就要了妳的小命。」二小姐說：「沒關係，死就死，我不怕！」夫人拿她沒辦法，便找我商量，她極擔心地說：「怎麼辦？令偉不肯開刀，將來她要是出了什麼事，她媽媽在美國，我也負不了責任。」當時我便對夫人說：「很簡單，雖然她喊妳『阿娘』，但她還有個親生媽媽在美國，妳把她送回美國交給孔夫人，孔夫人要她開刀她也沒辦法，那時再看她開不開？」夫人說：「好主意！不過我不忍心喊她走，我叫總統喊她走！」夫人將此事告訴總統後，總

統便對二小姐說：「令偉，你要是在台灣不肯開刀，那麼就回美國去，那裡也許有藥可以把你治好。」二小姐一看先總統那樣正起臉來講話，只好乖乖回美國去。到了美國，孔夫人便逼著二小姐開刀，經過藍道夫醫生（Dr. Landoff）的治療，她的癌細胞本來已經轉移，但因淋巴腺也一併拿掉，事後再沒發過病。她在美國也待不到半年就又回來了。

貳、孔二小姐與蔣夫人

夫人長住美國後，二小姐也跟著去美國，不過她還有夫人所屬的幾個機構可以遙控。經國先生也很有默契，二小姐遙控的那幾個單位，經國先生絕不去碰，免得傷感情。例如圓山，夫人寧可交給我，也不交給親人；振興也是由我介紹的人接管，所以他們兩邊仍是一種互相尊重的態度。

隨後二小姐在美國發現大腸裡有腫瘤，便住進醫院治療。那時醫生告訴她要開刀，因為可能是惡性腫瘤，她卻說：「我不開。」醫生說：「那不行，這樣很危險！」她竟說：「我要出院。」醫生說：「你不能出院，這樣生命會有危險！」她便簽字表明責任自負，把身上的幾根管子拔下就出了院。二小姐出院後立刻回台北，我還到機場去接她，一接到她後馬上送她入院，找了幾個她熟悉的醫生為她開刀，而她也答應了。中心診所的醫生為她開刀後，發現她得的是直腸癌，於是幫她把癌細胞拿掉，後來慢慢也好了。不過醫生表示她的癌症不能斷根，還要做化學治療，但她就是不肯，只願意繼續住在振興醫院裡，住院期間依舊上下瑣事均管。

過了一陣子後，夫人便要二小姐回美國，但她回去後依然遙控一切。到了美國不到半年，二小姐的身體又發現不對勁，所以再度回台，

夫人也沒法子阻止她。二小姐一直不太信任美國醫生，雖然世界上最進步的醫療科技（如腦部與心臟的開刀設備）都在美國，但一般來說，台灣的護理系統仍比美國來得好。二小姐很了解美國與台灣的情況，所以她寧可選擇回台治療。二小姐回台灣後又住進振興醫院，這次真的開始進行化學療法，打針、X光放射療法都來。那時二小姐為振興買了許多很好的醫療設備，連MRI的機器都是全台灣最好的，一點也不輸給台大。以後二小姐又把美國醫生請到台灣來為她看病，因為她已決定不回美國。她的病情起初還很平靜，我幾乎天天去看她，而她在那兒也過得快樂，一方面管管事，另一方面又養養狗和鸚鵡。

二小姐在振興住了七、八個月後，有一回突然對我說她很疲倦，想要暫時停止化學療法，不料話才說完的第二天，當我再見到她時，她便好像睡著一樣陷入昏迷狀態。之後夫人便趕回來看她，那時二小姐已經講不出話。我不懂二小姐當時是什麼心理，但只要是夫人坐在旁邊，二小姐就會把頭轉向另一邊，彷彿不希望夫人看到她的臉一般。夫人在台灣陪了二小姐三、四天，見她的情形大概也沒希望，於是又回美國，二小姐也維持不到一個禮拜便過世。她的一生也算極不容易，以一個女流之輩，一輩子在官邸裡生活，過世時也已七十多歲了。

二小姐影響夫人與總統很多，外界一直很不諒解她，但我可說知她甚深，如今蓋棺論定談她，我認為她這個人百分之七十是好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不好。我個人認為她真可稱得上是名奇女子，跟一般人不一樣。

當然，她有很多行為都是環境造成的。夫人曾對我說她對二小姐為什麼那麼好，是因為她覺得虧欠二小姐很多。夫人說二小姐小時候曾到夫人家玩，那時二小姐身上長了一種皮膚瘡，夫人便對孔夫人說：「你給她穿不透氣的裙子，所以皮膚瘡不容易好，不如給她穿一些寬鬆

的褲子、襯衫，讓她的膀子露在外頭，皮膚瘡比較容易好。」當時孔夫人聽了夫人的話，便給二小姐穿男裝，皮膚瘡果然很快痊癒。但從那時候起，二小姐便很喜歡那樣的裝束，從此不肯脫男裝。夫人對此每抱歉忱，因她認為此事無意中對二小姐個性影響很大。此後夫人對二小姐一直存有幾分歉意，許多地方都將就她，沒想到也因而寵壞她。二小姐也很懂得利用夫人對她的寵愛，所以她平常很喜歡管事，弄得大家都怕她。

夫人視二小姐如己出，二小姐喊夫人為「阿娘」，不過她們並沒有正式認女兒的儀式。二小姐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懂得利用夫人對她的寵愛做很多事。但無論她做什麼事，都是以夫人為主。她會不惜一切方法與手段為夫人做事，忠心不可置疑，但卻反而連累了夫人。然而她也為夫人做了很多正面的事，夫人有許多公益事業都是二小姐在執行管理。夫人宴客時無論要講話或應對，二小姐都會先幫她把客人背景弄清楚，然後適當地寫好一份底稿供夫人刪改。夫人到教堂，二小姐也會把同到教堂者的名單，甚至牧師會講的話都事前告知夫人，十分周到。夫人要作畫，二小姐也會把畫具、老師都安排好，一切毋需夫人煩勞，且用不著夫人吩咐。因此夫人有二小姐在旁，便感到有很多方便，二小姐也因此一直陪在夫人身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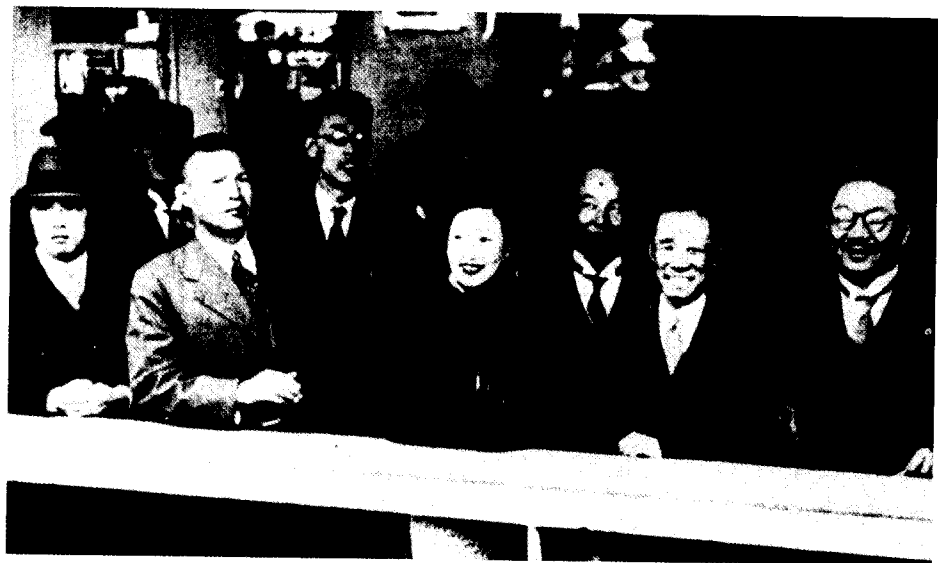
夫人是婦聯會主委，但實際上婦聯會裡的一切事項安排都是二小姐做的，只要是婦聯會主委該做的事，夫人都交給二小姐辦，二小姐甚至還可以不經夫人同意，逕自決定婦聯會的事情，事後再向夫人報告，夫人也多半會同意。當時夫人所辦的華興、振興、圓山等機構，若有客人來參觀，事前作業都由二小姐指揮安排，十分周到。

有一次夫人生病住榮總，因夫人對榮總醫生不太信任，便把美國的外科醫生請到台灣來，住在榮總為她治療。這位美國醫生確實不錯，

而且非常仔細，他爲夫人把子宮旁邊的瘰肉拿掉，夫人的病就好了。不過榮總那次也很特別，他們替夫人打消炎針，竟使夫人整個臉和手都腫了起來，他們說夫人得了皮膚病，皮膚科的醫生來看了也沒好。過後我便對他們說：「你們的消炎藥可能有過敏問題。」榮總方面的人說：「我們給夫人用的消炎藥是最好的，過去所有用過的人都很安全，更何況夫人的傷口一定要消炎，所以那藥絕對不能斷。」我仍覺得不對，於是便對二小姐說消炎藥一定要斷一斷，看看情況如何。二小姐聽了以後便囑咐醫生：「這件事由我負責，你把夫人的消炎藥停一停。」結果那藥才剛停，夫人的臉就開始消腫，原來她就是對那種藥過敏。

不過二小姐和夫人也不是沒犯過嘀咕，她有時也會與夫人賭氣，兩人便好幾天不講話。有一回二小姐又不知爲了何事與夫人賭氣，便獨自一人又吵又鬧地回仁愛路住，仁愛路的那棟房子是二小姐買給一位蕭太太的。夫人當時擔心二小姐這樣回去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便要我隔天陪她一起去看看。次日一早我陪同夫人驅車前往二小姐家，去時她家大門深鎖，蕭太太那天正好不在，沒人開門我們根本進不去。當時裡頭一點聲音與光線均無，夫人很不放心，深怕二小姐會尋短見，便問我怎麼辦？我看了看四周，發現圍牆很矮，便答道：「反正我們這一趟來，只是看看她好不好。不然我爬上車頂看看動靜吧！」於是我爬上車頂一看，二小姐的臥房正巧離我們車子停靠的牆邊不遠，我從車上就能看到她正躺著睡覺，而且還是側著身睡。一般來說，如果能側著身睡，表示一定沒事。所以我便下來對夫人說：「夫人，二小姐沒事，她正側著身睡覺呢！」夫人這才放心地笑笑說：「那好，我們回去吧。」回去後一、兩天，她們倆就又和好了。

提起這位蕭太太，等於二小姐的兩位太太之一，因爲二小姐總穿男裝，所以她們都自認是二小姐的太太，和二小姐生活在一起。這兩



民國廿六年，孔令偉（孔二小姐）於瑞士留影。前排左起：孔二小姐、桂永清、顧維鈞夫人、翁文灝、孔祥熙（本照片取材自《中外雜誌》第57卷第6期）。

位太太都對二小姐十分忠心，等於有點同性戀的味道，但至於是不是真的同性戀，我並不清楚。她們三人的歲數都差不多，蕭太太姓王，原本自己有家，有小孩丈夫，但她連家都不管了，除了兒女偶有來往外，一天到晚跟著二小姐。有一陣子蕭太太也在圓山工作，大家都喊她「王督導」，等於二小姐的代理人，夫人若對圓山有什麼指示，都要透過王督導傳達命令；至於另外一位小姐本身則未婚，姓什麼我已經忘了，如今已七十多歲，一直住在美國。

夫人有許多外文講稿，都是孔大先生擬的草稿，後經夫人精心修改才成定稿。孔大先生是美國大學碩士，英文極好，曾任國策顧問。他長住美國，只在夫人有事召喚時才會回來。他經常向夫人報告美國動態，同時也報告他對駐外使館的觀察督導情形。二小姐本人對美國

國會參議員們的情形也有諸多見地和了解，故也經常對夫人提出建議。可見孔家對我國當時的外交工作，實際上具有很大的幫助與影響力，只不過這些幫助與影響都在地下進行，而非公開的。

不過先總統卻從不與二小姐談公事，所以二小姐再怎麼管事，先總統的事她絕不去管。就算她向先總統表示一些她對公事的意見，先總統也始終只是笑一笑，點點頭，然後就算了。但是先總統會和夫人談很多重要的事，特別是外交方面的事情，而夫人有時會把事情告訴二小姐，二小姐也會針對事情表示意見，最後夫人又把二小姐的意見告訴先總統，所以二小姐對許多國家大事仍有間接的影響力。

外面的人都說經國先生與夫人處不好，但其實經國先生是與二小姐處不好，而非與夫人。因為經國先生有許多見解報告給先總統後，先總統有時會把經國先生的意見告訴夫人，而夫人又會把意見告訴二小姐，二小姐往往反對，夫人又把二小姐的反對意見告訴先總統，先總統有時也會修改經國先生的意見，造成經國先生心裡很不痛快。經國先生與二小姐兩人表面看來都客客氣氣，但暗地裡卻互不搭調，意見總是不合，讓夾在中間的我感到十分為難。其實他們倆也沒什麼過節，只是兩人的個性都強，經國先生又看不慣二小姐許多作風，二小姐對經國先生的許多意見也不滿意。但因二小姐有夫人撐腰，所以經國先生對她也莫可奈何。

先總統過世後，經國先生接任總統。當時他與夫人對外交的意見不一致，夫人便對經國先生說：「好，如果你堅持己見，那就全由你管，我就不管，我走了。」自此夫人便到美國紐約，一直都不回來。而經國先生的個性一直都很強，他決定的事情便一定要辦到，所以也不大管夫人的意見。

如今二小姐已去世，在紐約夫人身邊的是孔大小姐。孔大小姐是

個賢妻良母，在夫人身邊專管夫人起居，對其他事便不大管。夫人身邊另有位宋亨霖武官，在夫人身邊做事也已幾十年。此外，夫人身邊還有一些警衛人員，所以現在陪同夫人一起在美國者，大約還有二十多人。

參、孔二小姐與我

二小姐稱呼我為「Dr.熊」，我則稱她「總經理」。她喜歡別人叫她「總經理」，因為她是香港揚子公司的總經理。她最不喜歡別人喊她「二小姐」，因為她不願當女性，處處喜歡以男人自居，因此除總統與夫人叫她「令偉」外，連經國先生都叫她「總經理」。在官邸除夫人外，就屬我與她最熟，因她覺得和別人都談不來；加上她喜歡吃辣椒、泡菜等四川口味，還會四川、廣東、江浙等地之方言，而我是四川人，許多地方與她極為相似，故她與我最談得來。

二小姐因經常陪在夫人身邊，所以自己的時間並不多。但她一有自己的時間，如夫人出門或正在見客、畫畫時，便會溜出來找我吃酒。夫人自從不畫畫後，唯一的興趣便是下象棋，我陪夫人下棋的時間，二小姐往往就溜出去找一些武官、侍衛長打聽外面的消息。等到晚上十一點夫人睡了，便是二小姐自由的時間，她在那時往往會回到她的房間，不到凌晨兩、三點絕不睡覺。此時她便會來找我，把許多真正好吃的東西拿出來，和我慢慢地聊。她來找我的時候，往往會從官邸帶點菜和酒來，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甚至連一些醫學知識或外面的情況，她都會向我打聽，而她也會把總統與夫人的情況告訴我。當時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得陪她到一、兩點鐘，等我回去睡到第二天早上七、八點鐘時，先總統又會有事找我，因此我的睡眠常常不夠。

我們都把陪二小姐當成是件苦差事，但她來找你，你又不能不去。這種生活我差不多過了兩、三年，實在深以為苦，因為我白天要工作，如果睡眠不足，腦筋會不清楚，所以有時真的被搞得很煩。但二小姐又是個得罪不起的人，在官邸裡若與她鬧翻便很難做事。不過也因為那段日子和她親近，她對我也有諸多幫忙。我有一陣子白天還在醫院擔任院長，那時我們的婦產科主任徐千田醫師是很有名的婦科，他為人開刀無數，總不可能每一位都能治療好，有一回一位去世病人的家屬知道徐千田有錢，便故意跑到他的診所敲詐，事實上那位病人所罹患的病本來就治不好，但病人家屬不管這些，亂鬧一通，反正一定要錢，把徐千田搞得焦頭爛額。因為徐千田是我的婦產科主任，我有責任保護他，在這件事的處理上，二小姐正是一名極佳的人選，我便把這件事透露給她聽，而她又把這件事透露給先總統，先總統一聽便說：「這怎麼可以！叫武官打電話給警察局，要保護他們，不能這樣子。」警察局一出動，問題當然就解決了。

二小姐真是個難纏的人，很多人都不喜歡她，我想在官邸裡唯一沒和她吵過架、翻過臉的人，大概就只有我一個，一方面是因為她尊重我，另一方面我也很尊重她，因為我曉得她的脾氣，有些地方也不與她衝突。二小姐與我的關係好，大概也與我在外頭人面較廣有關，有許多事她自己不能出面，便找我替她辦，旁的人可能就沒那麼方便了。所以直到她病重時，我與她的關係都還很好，有好幾次她生命危急時，我還強迫她開刀，她也都聽了。所以她也曉得我幫她的時候很多，故有些事我看真是不對時，我會與她據理力爭，而她也會服我。她有時是服惡不服善的。我和她的淵源算是很深，她爸爸孔祥熙重病時，什麼醫生都不要，都是我去看的。許多淵源串連在一起，故她對我還是很尊重。

肆、孔二小姐與圓山

修建台北圓山大飯店，一開始時是先總統的意思，因為當時外賓很多，但卻沒一個像樣的地方能招待他們。可是當時既沒錢又沒地，更缺乏營建計劃，夫人不知從何著手，故過了很久這件事都沒下文，總統才指明要二小姐來辦。當初我們根本沒錢建圓山，只是總統的一句話，我便去找台灣銀行董事長徐柏園，向台銀貸款四億新台幣。當時因我是圓山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專門為夫人報告圓山情形，也處理許多對外情況，對外貸款便以我的名義出面質借。

圓山現址在過去乃台灣旅行社所經營之台灣大飯店，位置就在天文台旁邊。民國四十一年五月十日，老先生利用原來的台灣大飯店，將其擴大而成圓山飯店，正式成立圓山俱樂部。開始修建圓山時，總統還曾親自來看，出了很多意見。圓山的設計師是楊卓成，但他當初的設計藍圖，也讓先總統及二小姐改了很多次。圓山下面有兩個隧道，原為準備作戰而設計，以便在戰時用來疏散或辦公，當成臨時作戰指揮所。圓山底下修建隧道是先總統的意思，可見他真是個很有遠見的人。隧道裡面的通風很好，打掃得十分乾淨，一次約可容納數千人。這兩個隧道如今外面的人也都知道，連市政府方面都來看過。

剛開始時圓山只是幾間木房子，以後再把木房子拆掉修大樓。原本夫人並不贊同圓山修大屋頂，今日圓山的屋頂乃先總統堅持要修的。當時圓山只有金龍與翠鳳兩廳，是個馬馬虎虎的飯店，總統說要籌錢修大廳，建個大房子，也是催了好幾次後才開始動工。

二小姐在接到總統命令後，幾乎全副時間都全心投入，舉凡計劃要做的事，她一定全力去做。只要她在官邸得空，便溜到圓山坐鎮，

指揮開會並監工，決定一切事項。所以圓山興建的藍圖，等於二小姐做最後決定。圓山一樓大廳的圓頂上有九條龍，也是二小姐的構想，當初她跟建築師講的時候，建築師還說：「不行，這樣做不起來。」但二小姐說：「沒什麼是做不起來的。」於是工程師照著二小姐的構想，硬是把那圓頂做了起來，到現在大家都覺得那是台灣建築史上極難得的作品。

圓山的大屋頂在還沒燒掉^③以前，屋頂上的雕樑還有幾隻龍頭。那幾隻龍頭在開始動工時，工程師也說放不上去，因為重量不對。但二小姐說：「不行，一定要放。」舉凡她堅持的事，最後都讓她順利做到。她國外跑得很多，看過許多大建築；此外她本身對建築也十分有興趣，所以圓山的建築藍圖與其說是建築師所繪，不如說大部份是二小姐的心血。

圓山整個建設構想、發包、建築監工等，二小姐都事必躬親，最後以四億台幣價廉物美的價格，即修成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飯店。當初二小姐修建圓山時，確實為圓山省下不少錢，因為在她手下根本沒人敢貪污，她把所有細節都掌控得十分清楚與嚴格。直到如今，圓山仍是台北市獨一無二的優美建築，所有的建材都是真材實料。如今若要用四億台幣再修建一座大規模的飯店，根本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二小姐管理圓山用的是老式管理法，一切人事都由她安排。她確實誠心要採用好人才，可惜有才能者都與她處不好，與她處得好的都是些溫吞的人。早期圓山在她管理之下，開始創辦空廚事業，當時誰也想不到飯店可以經營空廚，就只有她想到，可見她確實有獨到眼光。

③ 台北圓山飯店屋頂，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廿七日，因施工不慎引發大火，燒掉近半屋頂。

直到如今，空廚仍是圓山最大的財源，不過圓山空廚雖然還算賺錢，但因華航與國泰打算自辦空廚，這兩個客戶如果流失，圓山的營業額便將減少百分之六十。圓山的台北本店如今每月都還有虧損，但因空廚對本店營業額尚有小補，收支還算平衡。待將來空廚業務流失，圓山便得自力更生。^③

所以真正說起來，圓山營業之初的所有組織與規劃，當時的經理徐潤勳幾乎沒有主動做過任何事，都是二小姐自己策劃的。二小姐怎麼說，徐經理便怎麼做，所以現在我們自己整頓圓山，才發現真到了沒人可用的地步，每個人都變得唯唯諾諾，要聽吩咐才會辦事，自己從不動腦。如今新的總經理上任便做得很辛苦，因為他學的是新的企業經營方式與新觀念，但因過去積習太深，大家都依吩咐做事，以致他想找人幫忙動腦都找不到。所以單拿圓山來講，二小姐在這方面也有功有過，她專制的領導方式確實為圓山做了很多貢獻，但同時也使得圓山員工變得不會思考。

台北圓山的地原本是台北市的地，不過那時因為台北市還不是直轄市，所以台北市的地仍屬省政府管轄。以後台北市在高玉樹任市長時升格直轄市，圓山的地究竟誰屬便引起很大爭議。那時我們就打算：因為台北市長是民選的，未來由誰當市長還不能預知，風險較高；而省府主席那時尚未直選，所以我們還是跟著省政府比較保險，免得日後發生一些囉嗦的問題。其實當初我們要是把圓山這塊地買下來便沒事，因為當時買地很便宜，現在再買就很貴了。

圓山設立之初因是獨佔事業，所以十分賺錢。後來雖有國賓與統

^③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起，中華航空公司已開始採用「華膳空廚」食品，故圓山飯店與華航間目前已無空廚業務關係。

一兩家飯店出現，但這兩家終究不能與圓山相比。圓山佔有先天優勢，加上過去根本不必繳付地租，營業利潤自是不少。不過，我們現在已繳付地租予省府達十五年，每年都要付一億五千多萬新台幣，省政府還嫌不夠。民進黨也吵著不將地租給我們，使得圓山出現一堆麻煩困擾的事。

圓山因屬財團法人敦睦聯誼會性質（詳見附錄二、三），所以賺得盈餘均不可拿來轉投資，一切用錢均需依照規定辦理，規規矩矩地做飯店生意。目前圓山所賺的錢還是放在銀行生利息，等將來屋頂修好後，就要拿這些錢來付款及付地租。且一旦哪天圓山的財團法人解散，一切獲利均需送交國庫。其實我們可以組織公司讓股票上市，但如此一來還有很多麻煩，所以目前尚無此打算。

過去圓山董事會是不管事的，真正管理圓山另有一個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省主席兼任。直到林洋港先生擔任省主席時，因省議員質詢他為什麼又兼圓山管理委員會主委，林先生便辭去圓山管理委員會的職務。當時我是圓山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委員會有任何決議，都經過我傳達給夫人與總統，我等於是橋樑角色。管理委員會下設經理，專管行政工作，經理之上還有個祕書，乃夫人的私人祕書，主要工作也是傳達夫人的命令。

過去圓山做得太順手，現在卻又太不順手，等於在台灣的政治風浪裡打轉。圓山如今已被台北市政府當成政治敵人，市政府對圓山待遇十分苛刻，凱悅、麗晶等飯店完全是外資經營，市政府對他們卻很優待。於是本國人的錢都讓外國人賺去，許多現象都令人感到寒心，真讓人有種前途茫茫的感覺。

第九章 我的家庭與幾點感想

壹、我的家庭

其實我在大學時代也有幾個鍾情的女朋友，但卻總是湊不攏。將屆卅時，家父急著要我結婚，那時家妹對我說，她有位同學的姐姐人很不錯，要約她到我們汪山的家裡來玩。於是家妹便約那女孩到我家，我們談過也覺得不錯，家妹便趁勢要我們倆去看場電影。當時重慶局勢還算安靜，我們下山看了場電影。回來以後，那天父親正好在家，一問之下才知家父認識女方叔叔，她叔叔開了一家很大的錢莊。巧的是那一、兩天父親正好與女方叔叔碰面，她叔叔知道此事後非常撮合，便說：「既然他倆都見過面，彼此印象也不錯，不如乾脆成了親，如此才更圓滿。」父親當場便同意了。父親回家後問我意見，我也同意了，當時我心想自己馬上就要離開重慶到南京，如果不快結婚，等到離開重慶也不知道要找誰，所以即使對對方仍不十分清楚，就這樣也答應下來。訂下婚姻後，正巧父親發表某地縣長，自己走馬上任去了，家裡只剩大哥一個男人，他當時在重慶地政處當主任秘書，故我的婚禮是由大哥主婚。

內人是遺腹子，岳父早逝，岳母一手將她帶大。她家裡人口多，因她自小管家，故對家事十分熟悉，我們婚後孩子均由她管。她對我的工作也沒什麼抱怨，當我要隨先總統到溪口時，她也未阻止我，還

送我到機場，非常體諒我的工作。

內人十分識大體，稱得上是位賢內助。我後來發現她有很多長處，例如有一次經國先生擬至青山休假，邀我與內人同往。那一次旅遊的所有事務均由內人打理，方嫂則協助內人，經國先生只負責決定目的地，其他瑣事都聽她倆安排。也因此，內人後來與經國先生一家變得很熟，多次出遊皆仰賴內人安排細節。

我有兒女各一，但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我因忙碌而與他們相處極少。其實在我們小的時候也是一樣，十四、五歲便離家，自己想辦法讀書，所以我也以為做人兒女都是這樣，豈料我兒子卻不是這樣。我的兒子名叫熊名琛，過去經國先生曾送我一部凱迪拉克，那車既大又耗油，我根本都不坐，內人也不坐，結果我兒子一天到晚把它開進



經國先生夫婦（左一、左二）與熊丸夫婦（右一、右二）合影。

開出。那輛車子的車牌是警察也不能干涉的，所以別人不能停車的地方他可以停，別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也能去，他一天到晚開著那輛車出去玩，因此讀起書來也特別費力。

不過他總算也是順利完成學業。自建國中學畢業後，他便考上國防醫學院，之後又直接到美國 Water Reed 及 Rochester 兩所醫學院進修。他在 Rochester 認識一位心臟科教授，那教授對他非常好，不斷地栽培他，使他也成為一位心臟專家。原來我希望他成為一位婦產科醫生，可以跟著徐千田，而他也曾經跟過徐千田一段時間，後因美國那邊的教授正好是心臟科醫生，所以他就跟著那位教授研究心臟科。如今我兒子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大學任職，專做超音波研究。他育有三子，我這三個孫子不但書讀得好，運動與音樂都好，讓我兒子十分得意。其中一個孫子曾經獲選為阿拉巴馬州的音樂精英，與其他各州獲選者共組一個交響樂團，民國八十五年曾來台表演，他在裡面拉大提琴。另外一位小孫子則擅長拉小提琴，也在阿拉巴馬州舉辦過獨奏會，所以那些孩子都還算優秀。

我的女兒則叫熊名敏，這是夫人為她取的名。她自景美女中畢業後，因我二姐在英國，便赴英國學習打字、速記等祕書工作，爾後考上英國 Richmond 大學，畢業後嫁給一位在英國認識的馬來西亞華僑。我女婿學的是光學，家裡是廣東人，開了間眼鏡行。女婿畢業後曾問我：「我還年輕，才三十歲，還想讀點書。現在便去工作會不會太早？」我說：「你過去讀的是光學，如今再去讀眼科不是很好嗎？」我女婿也很聽我的話，回到英國大學時校方說他成績很好，醫學院願意收他，於是他就在醫學院裡攻讀眼科，五年後畢業。之後他在愛爾蘭任眼科醫生，爾後又回馬來西亞擔任醫院的眼科主任。他們住在馬來西亞檳榔嶼，育有一兒一女。我女兒十分戀家，每年總要回台灣兩、三

次。兩個外孫比我孫子對我還好，所以我經常對我女兒開玩笑說：「你的兩個孩子都被我收買了。」因為他們要什麼玩具，我都會買給他們。

過去我女兒經常跟我到官邸，夫人知道後也十分歡迎，還叫所有警衛不要攔她，她高興到哪兒就到哪兒，並做她喜歡吃的咖哩雞給她吃。當時她就讀於再興中學，故週六下課後便到官邸來找我，吃過飯和點心再回家。

貳、半生官邸心得

如今回憶起來，當初我原不願到官邸工作，因我在學校時早已立志要做臨床工作。我的志向是外科，大一讀解剖時，因成績很好，一位外國教授 Cabolet 便曾在暑假時，給我一本他自己寫的《局部解剖學》，要我在暑期根據書中所寫，把一具屍體從頭至尾解剖一遍，證明他書中所寫是否正確，爾後把解剖結果向他報告，他再根據我的解剖結果更正書中內容以便出版。因此，我做人體解剖做得很詳細，以這樣的背景來說，擔任外科醫生是再適合不過。當時我們上解剖課，約要六人才能分到一具屍體，而我除了六個人一起分配到的屍體外，還有機會自己解剖一具屍體，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所以當時我一心想做外科，根本想不到官邸做事。

然而沒想到我進入官邸後，便終生與它結緣。當時國家的大環境極端惡劣，總統又喜歡跑來跑去，四處奔波，剿匪那段時間他還曾到最前線去。我還記得我們到太原，離開時總統座機才起飛，太原就丟了；到成都也是，總統離開成都的頭一天晚上，共產黨就進了成都；重慶也是共產黨到了南岸後我們才離開，離開時連飛機場都差點進不去。因此總統當時的處境可說十分危險，如今仔細回想，猶覺自己當

初何必去討那些危險景況。

有好幾次，我跟著總統東奔西跑，連家裡的音訊都斷絕。內人第一次生產，我連孩子的性別都不知道，只是不斷地在海外漂泊。類似西安事變那樣的事，在當時可說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如若真的發生，我們這些隨侍的人便隨時準備犧牲。有時想想，真覺得自己究竟所為何來？我又不是軍人，該做的也都做了。但那時候憑的就是一股傻勁，想著總統已經那麼辛苦，我們還想什麼？就是跟著走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總統對我們真的很好。古人說：「士為知己者死」，為此我便始終跟隨著總統。

我在官邸共曾三出三進，幾番有機會到國外去，擺脫多年的官邸生活，但過後總是又被找了回去。不過在這當中，總統有好幾次都是特地派我到國外進修，進修的學費也是幾千幾千地送，對我十分照顧，夫人對我的家庭也十分關心。正因為如此，我便一直留在官邸直到總統去世，可說窮盡一生的時間與精力。

其實若再給我一次機會選擇，我一定不會再選同樣的路。因為在官邸工作真的很辛苦，加之我有幾位在大陸的同期同學，如今在大陸醫學界都已卓有成就，常寄一些研究成果來給我。過去我的成績比他們都好，如果也走研究路線，成就必不遜於他們。但想起這一生，總覺得也是命中註定，大陸文革時期，我們也有好幾位同學因而犧牲，故若我的一生轉換成另一種情況，是禍是福也很難判定。

如今回想過去，也不能算是後悔，畢竟經歷過一些驚濤駭浪，也算成就一段豐富的人生。我後來曾在醫院擔任院長，任期內之所以能夠十分順利，正是因為我在官邸認識了很多朋友，他們給我許多幫助。許多朋友認為我很可靠，將許多責任交付予我，故直到現在我還不能自工作崗位上脫身，肩上揹著諸多責任。對於他們的信任，我也不好

辜負，只有繼續奉獻下去。

參、幾點感想

一、對兩蔣移靈^{③④}的看法

緯國先生提出移靈這件事，我想可能有點意氣的味道，因為他在陽明山的房子被台北市政府拆掉，李總統也沒出來打個圓場。此外，各地小學傳出把先總統銅像放在廁所的消息，報上也有很多報導對兩位老總統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種種事件加在一塊，也難怪緯國會有這種反應。

不過李總統把兩蔣移靈一事交予小組研究處理，這方式倒還是對的。但由這件事的發展看來，我個人認為這對我國未來的教育確實影響頗深。至少對現在的國小學生而言，報上對兩位老總統這樣沒禮貌，叫他們以後怎麼讀近代史？整個社會變得有些無情無義，這對下一代的年輕學子影響很大，他們看到大人們都只重視如何賺錢，怎麼高興便怎麼辦，國會殿堂可以打架，什麼話都可以講，任何事都可以做，幾千年來的儒家思想全都毀於一旦。殊不知總有一天風水輪流轉，總會輪到下一代來批鬥我們。人人都說「現在是民主時代，過去是威權時代」，但兩時代一比，你願意過哪種生活？

移靈這件事，緯國處理時並沒有經過仔細的思考。報上稱緯國是經過孝勇而得到夫人同意，這句話根本靠不住。夫人根本沒有透過孝

③④ 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八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蔣緯國，在中央直屬小組會議上建議成立「先總統蔣公及故總統經國先生奉安委員會」，研究將兩位總統靈柩移回大陸故居安葬事宜。

勇要緯國做這件事，因為夫人對移靈這件事根本覺得不可思議！緯國做事經常太過衝動，故兩位蔣總統都不將大事交付予他。

二、對賀伯風災^{③⑤}的看法

如今社會上有好多事我都覺得不可理喻。例如賀伯颱風的賑災，報上刊登總統只捐十萬元，行政院長也只捐六萬，這叫人做何感想？單是圓山就捐了四百萬，院長有那麼多財產，卻只捐了六萬，底下的人當然不能比他更多！他們的做法會影響到其他人的做法，否則就算他們真要捐十萬、六萬也可以，那麼就不要對外發布消息，再不然捐一個月或十日所得都可以。

從賀伯風災中也可看出官場爭權奪利的景象，真正要做事時就沒人做了。從前颱風也很多，但哪一次像賀伯風災一樣弄得十天沒水喝？如今社會經過這麼多的建設與防洪，卻有些什麼用？針對賀伯颱風的災情，也沒有任何人負起政治責任，完全歸咎於天災。這樣的處理方式，使得社會大眾發起的捐款活動，宛如鼓勵政府繼續犯錯一樣。官場風氣與社會風氣已敗壞至此，沒有是非，沒有責任，什麼都沒有了。

三、對中油漏油事件^{③⑥}的看法

這次中油發生漏油事件後，中油董事長還不斷推卸責任，實在很

③⑤ 強烈颱風賀伯於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卅一日晚間侵襲台灣上空，引發海水倒灌，造成台灣西部盡成澤國。滾滾海水一度沖垮堤防，使得魚塢鹽田嚴重流失，海、陸、空交通亦多停擺。賀伯風災總計造成全省四十餘人死亡、廿餘人失蹤、四百餘人輕重傷，農業損失達近兩百億元新台幣。

③⑥ 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位於桃園南坎的中油桃園煉油廠發生大火，起火原因乃因馬達幫浦軸封漏油所致。中油公司繼於台灣南部發生一連串污染事件後，又於該年八月連續發生數起重大意外事件，工安問題深受朝野各方重視。

沒擔當。假如這件事發生在兩蔣時代，中油董事長馬上就下台了。中油三番兩次地出事，當局對他們卻一句話都沒說，好像只要是他滿意的人，無論旁人怎麼講都無所謂。政務官對許多事都要負道義責任，才有政務官的風度。政府運作要靠法制，若不依法依制，又將如何統治人民？

四、對台北圓山飯店火燒屋頂事件的看法

針對這次台北圓山火燒屋頂事件，市政府的人一下子堅持屋頂要做成平台，一下子又說要把圓山的地收回去。其實我們都是依據建築法規來辦理，僅因一人的意見，便要圓山將屋頂改建成平台，還說自己是打擊強權。其實現在圓山哪來的強權？要打強權十年前去打，現在圓山有什麼強權好打？

人家都說現在是民主時代，過去是威權時代。如果是這樣分類的話，我倒覺得民主時代還不如威權時代。過去人民生活單純，鮮少憂慮；現在反而有一種前途茫茫的感覺，大家都不曉得我們的未來會被帶到哪裡去。所以我說，這根本只是一種名義上的民主，而非真民主。

第十章 漫談幾位人物

壹、吳稚暉

我在重慶時代就認識吳稚老，當時因稚老家離總統行轅很近，所以總統有時會請稚老上黃山乘涼。稚老不是個健談的人，只有問他話時他才回答，很少主動講話。他是個不修邊幅的人，往往穿著一件長衫，一雙布鞋，手上拿支大蒲扇。

有一回總統請他到行轅聊聊，他照舊衣衫襤褸地步行前往。到了行轅大門口，警衛見他穿著這麼邋遢，以為是什麼乞丐，便不讓他進去，稚老沒辦法只好回家。那天總統在行轅裡左等右等，等不到稚老來，於是派人打電話去問，稚老說：「我去過了呀，可是門口警衛不讓我進去。」於是總統便派車去稚老家接他。車子回到行轅門口，又見到原來那名警衛，稚老還特地搖下車窗，探出頭來對那警衛吐舌頭做鬼臉，真是不失赤子之心。他在自己家裡總是打著赤膊，僅穿一條短褲，拿把扇子不停地搨。因為當時沒有冷氣，重慶當地又熱，他的屋子又小，所以他總是那樣穿。

吳稚老也是我的病人，他有解不出小便的毛病，所以當時總統要他住進台大醫院檢查。當時他的主治醫師是台大內科主任宋瑞樓和我，駐院醫師則是現任國泰醫院陳楷模院長。我們替他檢查後，發現他的攝護腺肥大，膀胱裡都是結石。那時他發著高燒，我們天天到台大為

他醫治。他的血壓也高，卻又不肯吃藥，所以最後在台大住了幾個月便過世。

經國先生最敬仰吳稚老，稚老可說是經國先生的老師，經國先生有任何事都去請教他。吳稚老寫得一手好篆字，文章也寫得極好，但他平生不做官，就是一身布衣布鞋。老總統差不多每個禮拜都會請他到行轅坐坐，請他吃茶和點心，並同他談談話。談完話後，吳稚老總也不要車送，自己一人慢慢地走回去。只要是認識他的人，都對他十分尊敬；但不認識他的人，看到他一身穿著，都會覺得「這糟老頭是誰？」

貳、孔夫人宋靄齡

我與孔夫人也熟，覺得她是個智者。蔣夫人有時候還會耍點小姐脾氣，但對她的大姐卻像對母親一樣，很聽孔夫人的話。夫人也很聽總統的話，但若孔夫人對總統所說的話有意見時，總統往往也無第二句話。孔夫人過去是孫總理的機要祕書，中、英文都很好。她對每個人都很親切，沒有架子，卻有股自然生成的雍容華貴氣質。

以前孔院長病重時，我替他看完病後又送他回美國，便在他家住六天。那六天當中，每天早上的水果都是孔夫人親自削的，且不管旁邊有什麼客人，在用餐時她總把我放在最大的位子。我在她家頓頓都吃魚翅，所以從她家出來後，直到現在我還不喜歡吃魚翅。

參、楊森

四川人管楊森叫「楊蠻子」。他以妻妾成群聞名，太太多到有套哲

學。他的大太太老了以後，他又娶二太太，二太太始終在他身邊，卻不大管他的事。後來他娶了年輕的三太太，婚後把三太太送出國讀書，大學讀完後再給她一筆錢分手，隨後再找一位小姐結婚，然後再培養新太太。小姐們和他結婚的意圖就是讓他好好培養自己，分開後再各結各的婚，所以他一共培養了好多位太太。

但是最後一次他動了真情，他最後培養的是二太太丫頭的女兒。他和這位小姐結了婚，婚後生了個小女兒。這位太太書讀得很多，一女中畢業後考取台大，台大畢業又出國讀書。這位太太出國後便想法子把小女兒一併帶去，且一到國外便與楊森斷絕聯絡，讓他怎麼找也找不到。楊森從不曾拋棄這位太太，因為他很喜歡他的小女兒，但他卻被這位太太所拋棄，始終不讓他和么女見面，令他十分傷心。我與楊森很熟，對他很了解，他這個人做了很多善事，時常花錢修公園、球場和馬路。四川有句話說：「馬路一修成，看督軍何日滾。」所以他很喜歡修馬路。

肆、戴季陶

過去老總統到廬山時，也常找戴季陶先生一起去。當時因戴太太血壓高，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把血抽出來，讓血管內的血減少，血壓便會下降。而在廬山時除我之外沒有其他醫生，戴先生便請我替他太太抽血。我每天都去為她抽一罐血，血抽出來後，戴先生還把那些血混著朱紅與墨拿去寫經。一回他寫好經文以後對我說：「我送你一副對子。」我說好。寫好落款時他問我的字號，我說我只有名字沒有號，他便表示要替我取號。後來見他在紙上寫下「行圓」二字，我問道：「行圓是什麼意思？」他答稱：「萬行俱圓。」也就是諸事如意的意思。「熊

丸」及「行圓」兩個名字之四川讀音相同，我覺得取得真是好。爾後我把這副對子拿回家裡，家妹還說：「搞了半天，原來你是銀行的行員（行圓）呀？」

戴季陶是個和藹可親、十分健談的人。他常常一件事還沒講完，又接下去講別的事，且一講就一、兩個鐘頭。當他遇到不喜歡的人時，便一句話都不講；但遇到喜歡的人時，往往又會講個不停，算是性情中人。我因常在他那兒待得很晚，有一天在去之前，內人問我：「你每次去戴先生家，為什麼都要待那麼久才回來？」我笑說：「要不要你跟我一起去？」她問說：「我可以去嗎？」我說：「當然可以！戴先生會很歡迎的。」於是內人便隨我同往。那天她與我一起去，戴先生當然很歡迎，泡了茶之後又開始講話。談話過程中只見我內人在那兒聽得坐立難安，弄得一身大汗回來，第二天我問她要不要再去時，她便不去了。

伍、陳誠

陳辭公與吳國楨是雙雄不兩立。辭公後來肝硬化，火氣總是很大，非但對經國先生得理不饒人，對吳國楨也是一樣。陳與吳兩人雖然彼此搞不好，但他倆又一起對付經國先生，那時虧得蔣夫人與陳夫人（譚祥女士）經常居間溝通調解。陳辭公與陳夫人的婚姻，乃蔣夫人一手促成，所以辭公對夫人一直心存感激。辭公在年輕北伐時便很優秀，後來到台灣任省主席也一直很好，只是後來肝臟出了問題，以致心情大變，才惹出那麼多糾紛。

事實上如果不是辭公的身體出了問題，他應該會在經國先生之前便當上總統。我還記得高爾夫球在台灣剛盛行時，經國先生也想打高爾夫，便自己買了桿子和手套，為我也買了一套。隨後每天早上，經

國先生都到我家邀我一起去打高爾夫，但我記得我只陪他打了三天，因為據說第四天陳辭公便在行政院大罵：「你們這些高官要運動，馬路上和郊外都可以走，為什麼要用那麼大的地來建高爾夫球場，卻只拿一些小球在那兒打？運動就運動，幹嘛要這樣勞民傷財？真是不足為道。」陳辭公這麼一罵，經國先生從此便收桿不打。本來連一些軍人都不打了，但因老總統看得遠，他說：「高爾夫球是一種國際交誼運動，所以我們也有必要懂，否則如何與別人交往？」老總統這麼一講，陳辭公也沒辦法講話，此後其他高官照樣繼續打，但經國先生倒真是就此不打了。

陳辭公是個很會用人的人，李國鼎、黃少谷及蕭錚等都是辭公一手提拔的人才。他對文人很有禮貌，均以禮下士，包括家兄都曾受他提拔。家兄乃政大地政學院第一期畢業，在大陸上曾任武昌地政局長，後任台北市地政處長，屬於 CC 派，是蕭錚的學生。蕭錚擁護陳辭公，當時他們正準備土地改革計劃，也就是所謂的三七五減租政策。三七五減租計劃乃家兄所手擬，但最後掛的是陳辭公的名，家兄他們在整個計劃中都只是無名英雄。

陸、孫立人

孫立人看起來不像會叛變的人，但說他沒有叛變之意，卻又彷彿真有其事。孫那時有很多動作都不大合適，當時他的身份是參軍長，卻經常召見美國人，與美國人開會，所以總統對他的行動很疑心，覺得他似乎有圖謀不軌的企圖。當時其實是美國人支持孫立人，因為老總統有很多事不聽美國人的話，美國人一直希望有人能取老總統而代之。其實美國人對世界各國都一樣，喜歡在別人國家製造分裂。例如

在韓國，美國人表面上支持李承晚，但在李承晚背後又製造另一人來反抗李承晚，目的就是不希望韓國強大起來，要使他們自行分裂，好坐收漁利。現在他們支持台灣對付大陸，安的也不會是什麼好心眼。

當年孫立人因反對「政工制度」而得罪經國先生。「政工制度」乃依經國先生的意思所辦，大陸失據的原因，很多人都說是軍隊控制得不好。因此孫立人反對「政工制度」，便等於跟國家整體政軍勢力對抗。

我在省立台北醫院擔任院長時，孫立人很喜歡到台北醫院來，有時連一點小事他都會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喜歡台北醫院裡的兩、三個護士。他後來還曾公開宣布醫生診斷他不能生育的消息，所以在他公館裡舉行的諸多宴會中，他便經常把一些護士小姐請進去，大家都覺得和他一起玩很安全，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是妙的是，孫立人被軟禁後，又娶了一位姨太太，還生了三個孩子。所以之前他所說的，根本都是假的。

不過孫立人確實長得一表人才，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英文也好。尤其當他穿起馬靴，真是迷倒很多年輕女孩。他的命運最終如此，對國家而言，也真是可惜了一名人才。

柒、谷正綱與黃少谷

老總統下野至溪口時，谷正綱先生確實曾經痛哭流涕地反對總統下野。他總是以身作則，非但生活十分清苦，且不隨便講話，也不亂罵人，一切知無不言。谷家三兄弟（谷正綱、谷正倫、谷正鼎）都很傑出，但因谷正綱是大哥，待在國民黨的時間最長，他那種剛硬忠心的脾氣誰都曉得，講話的聲音又大，所以任何人都讓他幾分。

黃少老則與谷正綱相反，是一位仁慈的長者，做人做事均十分周



熊丸與黃少谷先生（坐者）合影。

到，從未得罪任何人，也從未對任何人失禮。少老曾經擔任馮玉祥的祕書長，故對國家而言，也是朝中元老。先總統要他擔任行政院院長時，他還對先總統說：「報告總統，現在不是我做行政院院長的時候，您應該找經國先生擔任院長，我在任何方面幫忙都沒問題。現在如果由我擔任院長，待我卸任再交予經國，便已經太晚。」先總統聽了少老的話，才提名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院長。爾後經國先生繼任總統時，許多過去先總統採用的人他都不續用，少老卻是例外。因為少老過去為經國先生做了很多事，經國先生對他十分尊敬。少老後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逝世。

捌、吳國楨

吳國楨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英文造詣極高。我對他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回到韓國去，我們先搭飛機到寧波休息兩天，然後坐船到普陀山遊憩，等李承晚準備好了再去韓國。在普陀山時，我與沈昌煥住一間房，吳國楨則自己住一間。某日，張其昀寫了篇稿子準備讓總統到韓國演講用，稿子最後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兩句詩收尾。張先生寫完後，沈先生便把稿子拿走，準備用打字機翻譯成英文，豈料譯至最後兩句詩時，沈先生因不知該如何翻譯，便找吳國楨幫忙。沈先生到了大廳，看見吳國楨正與聖芬對奕，聖芬總認為自己的象棋向無敵手，所以吳國楨便向聖芬挑戰。此時沈昌煥才剛叫了吳國楨，吳國楨便說：「慢來慢來，一定是那兩句詩要我翻譯。等我解決了聖芬，馬上來幫你。」那時聖芬已經快輸了，等到吳國楨打敗聖芬後，便立即跑進房裡，三兩下就把那兩句詩翻譯出來，可見他的英文確實有過人之處。

吳國楨個子不高，圓型臉，很喜歡講笑話。他自認會看天象算命，故常對著我們吹牛，吹得天翻地覆，委員長也很喜歡他。以後吳擔任台灣省主席，陳辭公任行政院長，兩人因職權難分，三天兩頭便吵到總統那裡，要總統排解，總統也常為他倆的問題為難。吳國楨也與經國先生暗鬥，後來到美國發表許多批評經國先生的文章。吳國楨這個人很可惜，原本是先總統那樣信任的人，出去以後卻那樣反政府，把自己的前途反掉不說，也在國際間為國家惹了不少是非。

玖、葉公超

葉公超和孫立人一樣，予人一種恃才傲物的感覺。他曾在不可一世時對美國人說：「國民黨是骯髒的政黨（dirty party）。」爾後他便爲了這兩個字下台。因爲老先生對黨十分尊重，葉公超講了這樣的話，對老先生而言是不可原諒的。葉是中、英文俱佳的人才，可惜處事太過驕傲。

葉公超的身體很奇怪，竟沒有味覺。有一天他和他的紅粉知己到我家吃飯，因爲他知道我家涼麵做得不錯，便向我們要求要吃涼麵。涼麵做好可以吃時，我發現他在涼麵裡加了很多醬油，便問他說：「你放那麼多醬油，麵怎麼能吃呢？」陪他來的小姐便說：「他不放那麼多，吃起來就沒味道。」那時我才知道他沒有味覺。沒味覺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天生沒有味覺細胞，而有的則可能是鼻子敏感所致。

拾、余南庚

余南庚此人十分傑出，先總統最危急時若不是他，恐怕先總統也熬不到六十四年四月才去世。他的著作甚多，學識與經驗均極豐富，讓我們十分佩服。先總統對他也很佩服，好幾次請他一起吃飯，還吩咐我們不許喊他「余大夫」，而要稱呼「余教授」。經國先生有一度想請他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及國防醫學院院長，但他不願意擔任國防醫學院院長。且後來他可能因爲被捧得太高，受到高官人士極大的禮遇，無形中便有些恃寵而驕。因此他後來只看重要人物的病，反而不大爲一般老百姓醫療。

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後，曾倡設幾個研究所，也發起多次募捐。慢慢開始有人對他的行徑不以為然，乃因他已逐漸染上官場惡習。其實假若他能好好繼續做研究，仍將很有前途，可惜最後他得了老年痴呆症，甚至連領帶都不會打了。

余先生和經國先生及二小姐都處不好。有一回經國先生到榮總看病，余先生對他說：「你這個情況要住院檢查才行。」經國先生說：「不行，我沒時間住院。」余先生便半開玩笑地說：「你在外面別人要聽你的，不過在醫院可要聽我的才行。」經國先生當時回答：「我就是不聽。」然後就走了。兩個個性強的人一碰頭，就是會有這樣的結果。

余先生很有才華，主要研究範圍仍在臨床，也曾於紐約羅徹斯特醫院擔任心臟科主任。他的太太也是一名小兒科醫生。

拾壹、鄭彥棻

鄭彥棻一年總要請兩、三次客，總是六菜一湯，但通常都是很精緻的菜。他常請我們吃蛇（廣東人愛吃蛇）、枸杞和荔枝，且他家蛋炒飯炒得很好。不過鄭彥老有時並不在他家請客，而是在陳七小姐（陳濟棠之女）家裡請。陳七小姐可說是鄭彥棻的紅粉知己，她在北投有一棟別墅，鄭彥棻有時也會在北投請客。鄭彥棻的太太是個好人，但自她知道陳七小姐的事後，也一天到晚和鄭彥棻吵來吵去，吵到七十幾歲了還在吵。

歷任總統府祕書長中，不大得人緣的是張岳公，而做得最好的該算是蔣彥士。我聽說蔣彥士很能體貼下屬，張岳公則是把錢算得較精，以致下面的人都怨聲載道。鄭彥棻在其中則算還好。

拾貳、魏景蒙

經國先生很討厭那種走他門路的人，他最喜歡像魏三爺（魏景蒙）那樣的人，說話說得很好聽，但卻不露痕跡。魏景蒙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才，他把經國先生伺候得眉開眼笑，卻從不覺得肉麻。他是個不露聲色、十分高段的人，有很多女友，我對他的印象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魏三爺過世後，他的“China News”也曾面臨辦不下去的窘境，而要求《中國時報》接手。當時余紀忠先生已經準備要買下“China News”，但經國先生說：「景蒙自己一手創辦報紙，我們應該把它留下來紀念他。」就這樣余先生便不買，而由魏三爺的女兒接辦，政府與《中國時報》亦另外出錢加以支持，否則“China News”早就易主。

附錄一
熊丸先生履歷

一、**出生：**民國五年五月九日（農曆四月八日）

二、**籍貫：**四川省石砭縣西界砭

三、**父：**熊福田 **母：**熊陳氏

妻：李忠慧

子：熊名琛 **女：**熊名敏

四、**學歷：**

學 校 名 稱	(民 入學年	國) 畢業年
西城小學（成都）	10	14
模範小學（重慶）	14	16
巴縣中學（重慶）	16	19
益州高中（重慶）	19	19
同濟大學附設高中（上海）	20	23
同濟大學醫學院（上海）	24	26
華西大學醫學院（成都）	26	28
同濟大學醫學院（昆明、敘府）	28	29

五、經歷：

職 別	(民 任職時間	國) 離職時間
重慶武漢療養院	29	30
同濟大學助教（鈺府）	30	32
蔣中正官邸醫官	32	64
台灣省立台北醫院副院長	37	39
台灣省立台北醫院院長	39	55
台北市立中興醫院院長	56	70
台北市立和平醫院院長	57	59
私立台北醫學院教授	兼	80
中國時報副董事長	70	86
圓山大飯店董事長	77	87

六、勳賞：四等雲麾、三等雲麾、二等景星。

附錄二

財團法人台灣省敦睦聯誼會捐助 暨組織章程修正總說明

交通部八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交路八十四字第〇一九〇三六號函

一、前言

近來國內新聞媒體一再針對圓山大飯店及其所隸財團法人台灣省敦睦聯誼會（簡稱敦睦聯誼會）為許多不正確之報導，其中有質疑敦睦聯誼會經營國際觀光飯店業務之合法性者，亦有誤認圓山大飯店未繳營業稅者，又有指稱圓山大飯店土地租金偏低及部份建築物未定租約者，更有關心圓山大飯店盈虧由誰負責者。諸此似是而非之論，非但誤導社會大眾對事實之認知，抑且對圓山大飯店及敦睦聯誼會所屬各作業組織二千餘員工數十年來克盡接待國賓、貴賓任務之昭昭事實，以及在提昇國內觀光事業水準及促進國民外交方面所作之鉅大貢獻，均予抹煞，實令人遺憾。

圓山大飯店及台灣省敦睦聯誼會之經營組織型態，因時代變遷，環境更迭，固須從速檢討、調整，惟為免社會大眾不察而滋生誤會，

不妨從根由底細說起，尙祈各方賢達明鑑。

二、圓山大飯店成立之任務與使命

我政府於中共佔據大陸，而播遷來台後，由於堅守民主陣容，勵精圖治，使得復興基地之國際地位日益重要，各國駐華使節、盟軍及外僑日增，盟國軍政首長訪華活動亦日益頻繁。當時，復興基地因光復未久，百廢待興，嚴重缺乏高尚而合乎國際水準之社交活動場所，不僅各國使節與盟軍駐台人員生活難以適應，而在接待外賓方面，尤感不便。

先總統蔣公有鑒於此，乃接納盟軍之建議，指示成立機構，專司服務外賓，促進國民外交及加強中外社會敦睦聯誼之責。蔣夫人銜命籌劃創辦，期於有成，遂於民國四十一年五月十日將原由台灣旅行社經營之台灣大飯店予以改組，正式成立圓山俱樂部。

初期，圓山俱樂部理事會係由盟邦人士會同組織，場所僅有一棟二層樓建築，包括房間卅六間及餐廳一間，房舍陳舊，設備簡陋，距國際水準相差甚遠，故經整頓環境，擴充設備，始勉強可供使用。嗣後圓山俱樂部又被賦予接待國賓貴賓之任務，於是進一步改組，擴大營運組織，而成立圓山大飯店，獨立經營。

三、籌建賓館、開發觀光事業

回顧戰後，國際觀光事業日漸蓬勃興起，各界期以觀光資源爭取國際友誼、增進文化交流及賺取外匯收入。圓山大飯店承政府之指示，除肩負接待國賓貴賓之任務外，尙兼負開拓國際觀光事業之使命，乃

計劃逐步興建具有國際水準，兼能代表固有文化特色之中國宮殿式房舍和庭園。所需創辦資金獲准向台灣銀行貸款，並以特種建築規劃，先於民國四十五年六月興建完成「金龍廳」平房一棟，有客房卅六間，又隨於四十六年底興建「翠鳳廳」平房一棟，有客房二十間，兩廳共有客房五十六間。完成後接待重要之國賓計有：四十七年五月接待伊朗國王巴勒維；四十八年三月約旦國王胡笙；四十九年五月菲律賓總統賈西亞、六月接待美國總統艾森豪及十二月菲律賓副總統馬加幅；五十年五月秘魯總統；五十一年四月馬拉加西總統、美國副總統強森及越南總統吳廷琰等盟邦正副元首。當時之接待服務備受讚譽，初創佳績。

此後，各國元首接踵來訪，客房不敷使用，需求甚殷，遂於民國五十二年四月興建完成鋼筋水泥加強磚造三層樓房之「麒麟廳」，有客房七十間，包括專設「總統套房」及宴會場所，首先接待泰國國王蒲美蓬，爾後陸續接待之國賓貴賓眾多，毋庸細述。

先後建築完成之「金龍」、「翠鳳」與「麒麟」三廳，總共有客房一二六間，使用土地面積三萬六千五百七十九點五平方公尺，房舍設施與環境庭園等，粗具規模。圓山大飯店在國際觀光業中聲譽日隆，首次於民國五十七年被評選榮獲世界十大國際觀光飯店之一，為我國觀光事業之啓軔發展，奠立良好基礎。

四、省政府收購三廳緣由與經過

自民國五十三年以後，國內雖有統一大飯店、國賓大飯店及中泰賓館等國際觀光旅館相繼開幕營業，惟因處於戡亂時期，凡國賓、貴賓駕臨，有關安全措施特別嚴格，其所採取之措施，包括限制同時接

待一般觀光旅客，亦即一旦有重要外賓蒞臨，須商請先住進之旅客退房或轉送至其他飯店住宿。由此可證接待國賓業務，不僅影響營收，甚或有所虧損。此所以其他觀光飯店同業，在當時均缺乏接待國賓之意願。祇有圓山大飯店一本創設目的，不計盈虧，克盡職責。

爲因應興建館舍庭園，圓山大飯店首先於民國四十五年向台灣銀行貸款六百五十五萬五千八百元興建金龍廳，四十六年貸款五百九十萬元興建翠鳳廳，五十二年貸款三千四百萬元興建麒麟廳，先後三次總計向台銀貸款四千六百四十五萬五千八百元整。迨至民國五十六年本金與利息彙計高達六千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元八角四分整，其中利息超過四分之一。當時圓山大飯店之營運盈餘，扣除維護費用以及添購設備所需，祇能維持平衡，當時之所以毫無償債能力，並非經營不善，實是筆路藍縷，創業維艱，一切以公益爲重之故。以今日企業投資觀光飯店而言，眾所皆知其投資金額龐大，且回收需時漫長，因此各國政府皆訂有獎勵與優惠發展觀光事業之各項措施。

政府爲接待國賓、貴賓及因應盟邦使節方便之需，如以國家賓館行之，其建築資金，自應由政府負責解決；若藉此發展觀光事業，亦應予獎勵與優惠。政府有關長官鑒於公營企業多疲糜不振，經營績效不彰；而圓山大飯店自民國五十一年隸屬財團法人台灣省敦睦聯誼會之後，其經營管理已躋入國際水準觀光飯店之林，況且敦睦聯誼會章程明白規定於依法解散後，其剩餘財產不得歸屬於任何個人或任何私人企業機構，應悉數交由台灣省政府接收管理，其符公益目的。因此，幾經磋商研究，政府乃允准就台銀超額盈餘編列預算，將圓山大飯店之貸款本息總額轉帳爲省府收購圓山飯店所建部份房屋之費用。

台灣省政府遂於五十六年以(56)財四字第三五五八〇號令核定：以現使用之金龍、翠鳳、麒麟三廳，中西廚房、員工餐廳、游泳池設

備等為範圍，由省府收購列為省有財產，並由台灣銀行以(55)年度以後各年度決算超額盈餘為財源，每年編列預算辦理，其收購全部資金核定為六千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二點八四元（即貸款之本金與利息總額）。惟因要求編列收購房屋設備接管清冊，尚須檢附財產獲得時之原始單據發票，而由於收購金額內，其中利息部份（占四分之一強）無法檢具單據發票，難符「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之相關規定，經研商結果，決定將圓山飯店自有資金購買添置之設備列入抵沖，此包括庭園佈置設施、大牌樓兩旁佈置設備、車輛（汽車）八輛以及台北松山機場餐廳中央系統空調設備等，俾以其支付之單據為憑，沖抵利息金額。清冊所列財物之品量單據齊全，毫無草率與浮濫之處。

參與辦理前項房屋設備收購手續之有關單位計有：財政廳完成接管，主計處監交，審計部台灣省審計處驗收等，並由台灣省政府於 59.12.17 府財四字第六四七三二號函致審計部台灣省審計處，請予備查在案。在報備函中特別指明本案房屋設備接管後，其處理方式未決定前，仍同時交由該飯店負責保管經營。當然，其目的仍為提供接待國賓之用。又規定今後各項房屋設備，如有毀損，應隨時函送財政廳登記。若非為接待國賓，又由財團法人組織經營，不涉私人所有，焉能如此。衡情度理，既無不法，更無所謂利益輸送。

關於折舊方面，政府機關房屋不辦理折舊，但財政廳要求，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概由圓山飯店負擔。按金龍廳係加強磚造瓦屋頂平房，建於四十五年，翠鳳廳同樣是加強磚造瓦屋頂平房建於四十六年，麒麟廳係鋼筋水泥加強磚造三層樓房建於五十二年，當時係以特種建築規劃，未辦理建物產權登記，應不算是違建，目前台灣省政府財政廳亦已補領有建物所有權狀。依照行政院所規定之固定

資產耐用年限，金龍與翠鳳兩廳使用已超過三十五年之規定年限，應可依規定申請報廢，是否可將固定資產備抵折舊全部金額，報繳省府，以予報銷，迄無法令與政府指示可循，希望有關單位能予定奪核示。但事實上，圓山大飯店已克盡保管之責，歷經數十年來，每年花費在維護整修方面之資金，已比市面租金還要多，否則，將近四十年之加強磚造房屋，如何能繼續保有煥然一新之面貌。至於金龍廳因不堪使用，已經由圓山大飯店投入鉅資三億餘元，在原有基地，就其原有外貌，予以重新整建，其產權本應歸屬出資者，但實際上仍然歸屬省府所有，圓山大飯店毫無怨言，何有利可圖？

五、敦睦聯誼會一向依法繳納租稅

敦睦聯誼會所屬作業組織，均遵照政府有關規定繳納營業稅、房屋稅、土地租金、房屋租金，以及特許營業費等。以去(83)年為例，全年繳給政府之租稅金額計有五億三千九百萬元，佔營收百分之十五點八七，換句話說，每百元收入內，就要繳給政府十五元九角七分。再以圓山飯店一個單位為例，去(83)年曾繳營業稅一千四百萬元、房屋稅一千三百萬餘元、土地租金七千三百萬餘元，舊館房屋租金二百餘萬元，所繳租稅佔營收比率為百分之十五點六〇，較國內一般五星級飯店之負擔為重。由此可證，本會為誠實守法之機構，外界誤以本會所屬作業組織未盡納稅之義務，純屬訛傳。

六、關於土地租金計算方面

按省有房屋金龍、翠鳳、麒麟三廳使用土地面積為三萬六千五百

七十九點五〇平方公尺。正樓係將原台灣大飯店舊房拆除並填土擴大基地，而於民國六十二年國慶日落成開幕，使用土地面積三萬三千九百四十六點五〇平方公尺。台北聯誼會之用地為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九平方公尺，原係國防部營區遷移轉撥而來，於民國六十四年落成，以賡續辦理以往圓山俱樂部之業務，促進中外人士與工商界之聯誼。以上總面積為九萬四千二百零五平方公尺，其中尚包括大部份山坡樹林草地，俾以符合建蔽率之規定。由於先後取得使用面積不同，以及歸為省有房屋之用地，自不應由本機構再予承租，在情、理、法兼顧之原則下，逕與省府研商結果，自七十五年十月一日起合併上述全部面積簽訂租賃契約，並依政府所訂一體適用標準計算租金，確無偏低或特別優惠。每年繳納租金七千三百萬餘元，負擔沈重，外界不察，實有欠公允。

七、省有部份房屋以租賃方式辦理

有關金龍、翠鳳、麒麟三廳房屋，其興建及省府收購之原因與經過，前已說明，毋須再述。嗣後經敦睦聯誼會主動向省府要求，乃於七十七年八月簽訂租約，並依照政府一般規定，以簽約當年房屋課稅現值百分之十計算租金，追溯補繳五年租金至七十二年九月，一切符合法令規定。

八、合法經營事業，無違非營利之創設宗旨

本會組織章程業經呈報政府主管機關核准許可，並經台北地方法院依法登記公告在案，凡所經營之事業自有其合法性，應無庸置疑。

惟外界常就本會章程斷章取義，以致誤解而為不必要之指責，茲特臚列章程第三條，藉以宣示本會創設宗旨之真諦。

第三條原文「本會宗旨並不營利，在經營臻於國際水準之旅館餐廳及附屬事業，以開發國際觀光事業，並便利招待外賓暨國際貴賓；發揚利人之服務精神，促進國民外交敦睦聯誼，及中外社會之公益」。

首句「本會宗旨並不營利」，應與其下文脈絡一貫，始能瞭解其真正意義。直言之，本會目的確實不為營利，而是為策劃達成具有國際水準之旅館餐廳及附屬事業，以開發國際觀光事業，並且便利接待國賓、貴賓為首要任務，並進一步發揚利人服務精神、促進國民外交敦睦聯誼及中外社會公益。

有謂既為財團法人組織，而從事營業行為，却享受免納所得稅待遇，殊有不是云云。其實不然，蓋財團法人與營利事業組織最大不同之處在於：

1. 財團法人經營事業所得盈餘及基金孳息收入之運用，僅限於與創設目的有關之事項。
2. 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應不低於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八十。
3. 捐助人、董事或其他人均不得分取任何盈餘或財產。

營利事業組織並不受上述限制，故本會所屬圓山大飯店與一般觀光飯店性質迥然不同。單就接待國賓、貴賓之安全限制，外送餐點之人力成本等，即非一般觀光飯店可與比擬。個中艱辛，政府有關接待單位知之甚稔。

至於免繳所得稅方面，因本會所屬各作業組織之營運，符合政府各項有關法令規定，始准予免納所得稅，其他財團法人亦均如此，若單獨指責本會，豈非薄我厚彼。何況行政院現已修正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自八十四年度起，本會仍將秉持一貫之守法精神，按規繳納所得稅，絕不逃避法定納稅義務。

關於盈餘由誰負責一節，本會組織章程第十三條明定：「本會所有財產非經董事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依法核可後，不得變更。所屬各事業單位經營所得之盈餘與有關資產基金暨事業上孳息收入之運用，除為符合本會創立目的而為必要之支出外，不得移供本章程第三條規定以外之用途。凡捐助人、董事或其他人員，均一概不得分取。本會財產每屆年度終了，如有增減應向政府主管機關報備。」因此本會歷年來均委請信譽卓著之會計師審查營運狀況及財務資料，並依法向主管機關交通部及台北市國稅局等有關單位呈報，所有盈餘涓滴用於目的事業，從未挪作其他不法用途。有關本會所屬作業組織之盈虧責任與處理權責，章程已有明白規定，毋須多贅。

有關資金之調配處理方面，本會向依照行政院修正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五款規定：「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或購買公債、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公營專業銀行發行之金融債券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及經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市之第一類股票、公司債者」辦理，並無任何情弊。

九、對國家社會之奉獻

本會所屬圓山大飯店自民國四十一年創設以來，歷經艱困，慘澹經營，克盡職責，不辱使命。四十多年來，國內外多少顯赫聞名國際之觀光大飯店，從燦爛輝煌而趨於沒落，具見創業維艱，守成不易。

圓山大飯店遵循既定政策規範，在全體員工辛勤耕耘之下，自強不息，日新又新，為我國觀光事業發展，奠立堅固基礎；同時，為配合政府政策，奉獻良多，且已克盡社會責任，凡此種種，彌足珍惜。茲謹略舉大端，以供參考：

1. 四十多年來為政府接待國賓、貴賓，完成所賦使命與責任，前曾細述，不另多贅。若以當前情勢言，其他觀光飯店接待國賓之表現，究竟如何，不便爭論，但不宜抹殺圓山飯店四十多年來之重大貢獻。
2. 台北松山機場於民國五十三年擴建完成，為我國唯一國際空港，當時應民航局要求，須設國際水準之餐廳，提供中外旅客最佳之服務。在當年艱苦之環境中，確無人敢冒投資風險，祇有圓山大飯店聽從指示，配合政府政策，不計盈虧投資經營。直至六十八年中正機場啓用時，始予結束營業，且無利可圖。桃園中正機場係我國十大重要建設之一，為配合政府建設，須投入設備資金八千餘萬元，而於民國六十八年二月開幕營運，歷經九年虧損纍纍，迨至七十六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及經濟發展步入佳境，始漸轉虧為盈。高雄機場餐廳於民國六十一年開業，因係國內機場，營業不佳，直至八十二年擴建為國際機場後，有關裝修及設備，亦曾投下巨額資金，目前始漸獲薄利。花蓮機場餐廳亦係應政府要求而於五十九年開業，每年均有虧損，由於需求不大，截至民國八十一年七月經民航局同意予以結束。台東機場餐廳於八十二年二月開幕，原不願投資經營，以免有人誤以為特權所使，惟民航局再三要求，實屬礙難推却，故不惜投資經營，每月均有鉅額虧損。以上所述乃為經營各機場餐廳之緣由與概況，在當時無人願意冒投資風險之環境中，圓山

大飯店毅然配合政府政策需要，不計盈虧得失，苦心經營，從未有人提及公平競爭問題；如今桃園與高雄兩處營運漸有改善，所謂公開競標及開放競標之議四起，甚至誣指圓山大飯店特權壟斷，歎此昧於歷史緣由，抹煞圓山大飯店之長期貢獻，實有欠公允。

3. 關於「空廚」問題：首先須從民國五十年代前後說起，當時在台灣飛行國際航線之客機，最早為美國西北航空公司(NWA)，隨後有汎美航空公司(PAA)及民航空運公司(CAT)等，其飛行途中旅客所需用之餐點，開始要求圓山大飯店專業訓練生產，自「圓山」製作裝入餐盒，以乾冰保鮮，而後運送至機上備供旅客食用。日後飛航班機數量逐漸增加，圓山大飯店所供餐點品質、衛生及服務，深獲各航空公司好評與信賴。民航局於擴建松山機場時，未曾規劃興建「空廚」，但基於各航空公司之迫及需求，促使「圓山」逕向政府申請於機場旁原為空軍用地範圍內，撥地興建空廚，藉以配合政府發展觀光事業，此乃我國初創「空廚」之來歷。如今這棟鋼筋水泥造兩層樓房之空廚建築，業經圓山飯店無條件捐獻給政府，即目前為台灣省公路局所使用者。民國六十八年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啓用開航後，松山機場改為國內航機用，所有供餐業務亦遷往桃園，各航空公司仍然依合約要求「圓山空廚」繼續供應。民航局乃於桃園機場內興建房屋，採租賃方式供「圓山空廚」使用，惟其所建房屋僅徒俱四壁之空殼而已，所有區分隔間、固定設施以及生產設備等，由圓山大飯店投下數億資金始堪使用。當時因祇有「圓山」一家空廚能與各航空公司簽訂供餐合約，所以民航局祇有租供「圓山空廚」使用；何況圓山飯店當時係為配合「十大

建設」，並非爲其營利之目的，豈能苛責民航局未辦理公開競標，有所謂利益輸送之嫌。按現在復興航空公司購地自建之「復興空廚」，乃在台灣設立之第二家空廚，僅開始有營業競爭，尙無廠房需求之競爭。十數年來，圓山空廚繳給政府之房租與費用累計高達十四億餘元，超過其經營應獲之報酬。又民國五、六十年代國家亟需外匯之際，圓山空廚所收受各航空公司之付款均列計爲外匯收入，爲數至鉅，不能不算爲對國家貢獻之一。還有今日各航空公司，有關空航餐點供應方面，紛紛在機場外自行購買土地，不惜投入數十億鉅資，自行籌建「空中廚房」，除復興航空公司已有「復興空廚」外，中華航空公司與國泰航空公司已合資興建「華膳空廚」，而長榮航空公司，亦正在積極籌建中。市場供需關係已全操縱在航空公司手中，業已嚴重威脅「圓山空廚」生存外，至於現行使用民航局所有廠房，在將來是否能充份利用當成問題。若仍採短期租賃契約，而不改爲二十年以上租賃期，試問誰願在公有廠房內，投下鉅資而無任何保障，此乃企業經營問題，值得主管機關三思。

4. 敦睦聯誼會多年來之經營管理完善，採行現代企業管理方法，建立制度，所獲盈餘則全部歸爲本會所有，任何人均未分取分文。本會因此能聚沙成塔，積年累月儲集資金，用之於開創發展本會之目的事業。民國六十年在高雄澄清湖畔興建宮殿式之高雄圓山飯店，期能促進南部觀光發展。六十二年在台北將原台灣大飯店舊有房屋拆除更新，興建十四層宮殿式大廈，乃世界上唯一能代表我國固有文化傳統，具有中國宮殿特色之觀光大飯店。各國觀光人士絡繹不絕前來參觀，已經形成爲台北市觀光點之一，廣受讚譽。尙且於台北市建城百十週年，由建築

師公會票選為台北市之「地標」。以後又陸續於民國六十四年興建台北圓山聯誼會，七十七年興建高雄圓山聯誼會，藉以促進南北兩地中外人士與工商界之聯誼，並提供高雅正當之休閒場所。凡此皆顯示本會確實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截至民國八十三年度本會總資產負債共計：淨值四十九億餘萬元，負債十億餘萬元，另外流動資產有四十二億餘萬元，固定及其他資產十七億元，財務結構健全，有利日後賡續推展章程所訂目的事業及社會公益。

5. 本會所屬作業組織圓山大飯店、空中廚房暨各機場餐廳等單位，員工總共有二千四百人，若加上賴以維生的眷屬人數，總在萬餘人，已為社會就業與安定貢獻一份力量。

十、結 論

本會所屬作業組織圓山大飯店及附屬事業，一向正當合法經營，未有絲毫逾越法令之處，歷經四十餘年，對國家社會貢獻頗多。茲為適應社會環境變遷，配合現行法令規定，允宜修訂章程，調整經營結構，期能適應當今之社會環境，更進一步體現本會創設之始初目的。

政府於民國五十八年訂頒「發展觀光條例」，繼於六十九年增訂限制觀光旅館必須以公司型態經營之規定，立法院第二屆第四會期交通與司法委員會聯席會議審議「發展觀光條例」修正案時，更特別考慮以立法手段協助圓山大飯店於一定期間內，轉化為公司型態經營。本會因此擬仿照財團法人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與中華航空公司之組織結構及其經營型態，修訂捐助及組織章程（詳見附錄三）。至於使用土地方面，亦擬參照台北市凱悅大飯店或麗晶大飯店（現改為晶華大飯店）

使用公有土地之租賃辦法，一切依照目前民間現成事例辦理，既無厚此薄彼之虞，又可符合現行法令規定。謹請政府輔導玉成，實為德便。

附錄三

財團法人台灣省敦睦聯誼會捐助 及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五十年三月四日訂，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登記處登記。六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六十九年九月一日、七十三年四月十二日、七十六年六月卅日、八十四年十月廿六日，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董事會議修訂。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財團法人台灣省敦睦聯誼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一巷一號。

第三條：本會為非營利性組織，以發展國際觀光事業，培育國際觀光人才，推展國民外交及促進中外社會之敦睦聯誼為目的。本會得從事下列各款業務。

1. 對國際觀光服務事業之研究發展及其新知之引進。
2. 國際觀光、餐飲人才之培育。
3. 與國內外觀光事業從事現代化管理與知識之交流。
4. 從事觀光事業之教育與文化宣導與推廣事宜。
5. 促進國民外交與中外社會聯誼事宜。
6. 促進空廚及機場餐廳服務之品質與技術改進事宜。

第 四 條：本會基金由尹仲容、黃仁霖、董顯光、周宏濤、俞國華等五位先生，一次捐款新台幣共伍拾萬元創立之。嗣後財產得由以後歷年累積餘絀增置，並依法辦理財產變更登記。

第 五 條：本會以董事會為「決策」執行機關。

第 六 條：本會設董事九至十一人組成董事會，第一屆董事由捐助入及其遴聘具有聲望之社會人士擔任之。第二屆以後之董事，由董事會聘任之，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之董事，應具有從事交通事業之工作經驗，並持有證明文件。董事相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不得逾董事名額三分之一。外國人充任董事，其人數不得逾董事名額三分之一，並不得充任董事長。

第 七 條：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1. 基金之籌措、管理及運用。
2. 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行。
3. 對本會所屬事業單位推展業務之監督、指導。
4. 對本會所屬事業單位預算、收支及決算之審查。
5. 董事之改選及補選。
6. 其他與本會目的事業有關事務之處理。
7. 內部組織之訂定與管理。
8. 重要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9. 其他章程規定事項。

第 八 條：本會董事會設董事長一人，由各董事中推選一人擔任，對外代表本會。董事長及各董事之任期均為三年，期滿改選，連選得連任。董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 九 條：本會全體董事均為無給職，不支取待遇及津貼。董事任期

屆滿改選或因故出缺舉行補選，應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補選之董事以補足原任者之任期為限。

第十條：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於開會前十五日通知各董事，必要時得依二名以上董事之請求，召開臨時會議。

董事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最多之董事召集之。每屆第一次董事會應於改選後十五日內召集之。但董事係於上屆董事任滿前改選者，應於上屆董事任滿後十五日內召集。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議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出席並表決，但每名董事以代理一人為限。

董事會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人數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左列事項非經董事名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為之：

1. 章程修訂之建議。
2. 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3. 法人之解散或目的之變更。
4. 申請貸款。
5. 董事之任免。
6. 投資相關聯事業。

董事會議紀錄應於會議後一個月內送政府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項但書之決議事項，應報請政府主管機關核備，並依民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向法院完成變更登記。

第十一條：本會董事會因發生重大糾紛，或無法召開會議時，如政府主管機關限期命本會整頓改善，本會逾期不為整頓或整頓

改善無效時，政府主管機關得依捐助章程所定資格選派新任董事補足原任期，完成整頓，或申請法院變更本會組織，或爲其他必要之處分。

第十二條：董事會之決議及行政事務，由本會所屬事業單位台北圓山大飯店負責處理，不另設機構及人員。

第十三條：本會所有財產，非經董事會決議並報請主管機關依法核可後，不得變更。

本會所屬事業單位經營或轉投資所得之盈餘與有關資產基金之孳息收入，於抵補以前年度虧絀後，如有餘額時，一部份備供發展本會業務有關事業之用，另一部份撥作研究發展觀光事業及促進國民外交之用。以上兩部分之數額，由董事會定之，並報請政府主管機關核備。凡捐助人、董事或其他人員均一概不得分取，本會除支持所經營之事業外，不得將資金貸與他人或供作任何保證，亦不得以財產爲他人設定抵押擔保；非經董事會決議，亦不得申請貸款。

第十四條：本會財產之運用，以維持本身存續並發展公益事業爲原則，但符合左列規定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得投資相關聯之事業：

1. 投資事業與本會設立目的或業務相關聯符合有關法令者。
2. 投資收益供本會業務使用者。

第十五條：本會係永久性質，如因重大事故，致本會設立目的不能達成，經本會董事會決議解散，依法解散後之剩餘財產，不得歸屬於任何個人或任何私人企業機構，悉數交由台灣省政府接收管理。

第十六條：本會定於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為會計年度。本會應於年度開始前，將下年度之業務計劃及預算書，送政府主管機關備查；並於年度結束三個月內，將上年度財務及業務情形編製決算書，送政府主管機關查核。

前項預算書及決算書應包括資產負債表、餘絀計算表、資金運用表、財產目錄及有關附表。

第十七條：本會會址、董事、財產如有變更，均應提董事會通過後，函報政府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董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經管轄法院完成登記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索 引

三畫

于豪章 / 69
于鳳至 / 107

四畫

孔令侃(孔大先生) / 111,147-8,155
孔令晟 / 50
孔令偉(孔二小姐) / 77,120,138-9,144,
147-61,180
孔令傑(孔二先生) / 147-8
孔令儀(孔大小姐) / 148,156
孔祥熙(庸之) / 9,64,112,147-8,155,158,
172
尹仲容 / 200
巴勒維 / 187
方怡智 / 126
毛福梅 / 112
牛惠霖 / 86
王允默 / 57
王心滌 / 12-3,17
王世和 / 76-7
王世杰(雪艇) / 71
王正誼 / 129,139-40

王永樹 / 142
王叔銘 / 50
王師揆 / 83-4,118-9,125
王惕吾 / 47,54
王造時 / 25
王陵基(方舟) / 10-1
王雲五(岫廬) / 24
王撫洲 / 75
王學仕 / 119

五畫

史 良 / 25
史大林 / 103
田炯錦 / 133
白 楊 / 39
白崇禧 / 94

六畫

伍誠仁(克齋) / 51
冰 心 / 18,23
朱自清 / 23
艾森豪 / 187
衣復恩 / 90,129,133,142

七畫

何北衡 / 7
 何思可 / 31
 何應欽(敬之) / 64,71,104,106
 余 達 / 49
 余宗玲 / 31-32
 余南庚 / 119-20,179
 余紀忠 / 31-2,80,181
 吳廷琰 / 187
 吳忠信(禮卿) / 71
 吳國楨(峙之) / 64,89,94,102,111,174,
 178
 吳順明 / 50
 吳嵩慶 / 71,132
 吳稚暉(敬恆) / 55,62,64,89,95,131,171-
 2
 吳經熊 / 102
 吳齡深 / 48-9,90,116
 宋子文 / 75,106,112,148
 宋亨霖 / 157
 宋承緒 / 137
 宋長志 / 94
 宋美齡(蔣夫人) / 74,81,85,97,108,124,
 144,151,172,174,186
 宋楚瑜 / 140
 宋瑞樓 / 171
 宋慶齡(孫夫人) / 27,109
 宋靄齡(孔夫人) / 77-8,83,99,147-8,
 150-3,172
 李公樸 / 25
 李宗仁 / 69,71,94,132

李忠慧 / 72,81,135,142,183
 李承晚 / 176,178
 李國鼎 / 175
 李惟果 / 53,94
 李登輝 / 52
 李麗華 / 93
 杜月笙 / 7-8
 沙千里 / 25
 沈 錡(春丞) / 54,103
 沈昌煥 / 26,54,69,103,178
 沈鈞儒 / 25
 沈劍虹(瑞文) / 54,102-3
 汪精衛 / 124
 谷正倫 / 176
 谷正鼎 / 176
 谷正綱 / 72,176
 貝倫子 / 29

八畫

周至柔 / 95
 周宏濤 / 53-5,58,67,69,72,90,116,132-3,
 200
 周菊村 / 69,75
 周應龍 / 53,140-1
 周聯華 / 99,103
 林和鳴 / 119
 林則彬 / 137-8
 林洋港 / 95,162
 邵幼軒 / 102
 邱吉爾 / 103

九畫

- 俞大維 / 79,131
 俞飛鵬(樵峰) / 50
 俞國華 / 53,200
 俞揚和 / 131
 俞瑞璋 / 119
 俞濟時 / 49-51,54-5,68-9,87,90,94-6,
 132
 俞鴻鈞 / 75
 姜必寧 / 123
 姚冶誠 / 112
 施覺民 / 49,90
 胡 炘 / 50,81
 胡 笙 / 187
 胡 璉 / 79
 胡 適(適之) / 24
 胡旭光 / 133
 胡宗南(壽山) / 32,50,147
 胡崇賢 / 140
 范紹增(海廷) / 43
 茅鍾琪 / 81-2
 郁達夫 / 23

十畫

- 唐 哲 / 28
 唐 堅 / 17
 唐 縱(乃建) / 50
 唐振楚(弘亮) / 53
 夏功權 / 53-4,69,73,81,90,132-3
 孫立人 / 175-6,179
 孫多慈 / 102

- 孫義宣 / 53,55,90,137
 徐千田 / 82,158,165
 徐志摩 / 23-4
 徐柏園 / 75,110-1,159
 徐國燦 / 36,41-2,44
 徐潤勳 / 161
 秦孝儀 / 53,57,123-4
 秦良玉 / 3
 翁 元 / 100
 郝柏村 / 50,143
 馬加幅 / 187
 馬歇爾 / 75,103
 高玉樹 / 161
 高逸鴻 / 102,136

十一畫

- 崔之道 / 93
 張 飛 / 14
 張 群(岳軍) / 3,7,71,73,180
 張大千 / 102
 張其昀(曉峰) / 40,56,133,178
 張治中(文白) / 71,94,132
 張紫葛 / 100
 張資平 / 24
 張道藩(衛之) / 26,94
 張厲生 / 75
 張學良(漢卿) / 104-7
 張學思 / 107
 張豐緒 / 80
 強 森 / 187
 曹聖芬 / 53-4,59,67,72,90,132-3
 曹聚仁 / 18,25

章乃器 / 25
 章孝慈 / 145
 章孝嚴 / 145
 章亞若 / 145
 陳 方(芷町) / 49,53,55,58
 陳 琇(細兒) / 57
 陳 誠(辭修) / 72,75,77,79,94,110,174-5,178
 陳 遂(積明) / 57
 陳 過(積臬) / 57
 陳 遠(積樂) / 57
 陳 儀(公俠) / 64,69
 陳 毅(仲宏) / 71
 陳 璉(憐兒) / 57
 陳 適(積皓) / 57
 陳 遲(積泉) / 57
 陳 邁(積皚) / 57
 陳布雷(訓恩) / 49,50,55-8,62,64
 陳立夫 / 96
 陳希曾 / 49,90
 陳叔同 / 53
 陳果夫 / 49,96
 陳勉修 / 81,99
 陳師孟 / 56-7
 陳訓正 / 57
 陳訓念(叔兌) / 57
 陳訓慈 / 57
 陳善周 / 67
 陳舜珩 / 133
 陳楷模 / 171
 陳潔如 / 112
 陳濟棠 / 180

陳耀翰 / 83-4,118-9,149
 陶百川 / 17,27
 陶希聖 / 50,55,58-9

十二畫

傅秉常 / 26
 曾平治 / 119
 焦鴻英 / 132
 程天放 / 91
 馮玉祥 / 177
 黃 杰(達雲) / 139
 黃仁霖 / 104-5,200
 黃少谷 / 64,72,81,175-7
 黃君璧(君翁) / 102

十三畫

楚崧秋 / 53
 楊 森(子惠) / 7,43,172-3
 楊卓成 / 159
 楊虎城 / 104-5
 葉公超 / 102,179
 葉聖陶 / 25
 董玉京 / 119
 董顯光 / 200
 賈西亞 / 187
 鄭 堅 / 50,97
 鄭祖琛 / 76
 鄒韜奮 / 24-5
 鄒繼勳 / 79

十四畫

熊化蓮 / 5

熊名敏 / 113, 165, 183

熊名琛 / 164, 183

熊盛鴻 / 5

熊鼎盛 / 12

熊福田 / 3, 183

端 納 / 104

蒲美蓬 / 187

裴毓芬 / 133

趙一荻 / 107

趙任安 / 68-9

趙彬宇 / 119

趙聚鈺 / 137, 142

十五畫

劉 斐(爲章) / 75

劉 湘(甫澄) / 7, 10-1, 42-3

劉文輝(自乾) / 7, 43, 59, 67

劉紀文(兆銘) / 113

劉師亮 / 42

劉航琛 / 7

劉瑞恆(月如) / 67, 115

潘文華(仲三) / 7

潘昌猷(文義) / 7, 8

蔣中正 / 7, 35, 47-64, 66, 69-72, 74-7, 79,
81, 85-90, 92, 94-6, 100, 103-6, 108,
112, 115, 119-21, 123, 125-6, 129-33,
135, 137-42, 145, 149, 151, 156-9, 163,
168, 172-3, 175-9, 184, 186

蔣方良 / 130-1, 137, 141-2, 164

蔣孝武 / 78, 150

蔣孝勇 / 110, 126, 135, 143, 168

蔣孝章 / 131

蔣孝鎮 / 91

蔣彥士 / 180

蔣經國 / 49, 52-3, 69-71, 73, 75, 77-80, 88-
9, 91-2, 95-7, 112, 119-24, 126, 129-
45, 149, 151, 156-7, 164, 168, 172, 174-
81

蔣緯國 / 52, 112, 121, 123, 149, 168-9

鄭不非 / 118-9, 122, 125

鄭天錫(弗庭) / 31

鄭彥棻 / 133, 180

鄭曼青(曼髻) / 102

鄧小平 / 7

鄧述微 / 83-4, 119

鄧穎超 / 107

鄧錫侯(晉康) / 43

魯 迅 / 18, 23, 25

黎玉璽(薪傳) / 72, 125, 132

十六畫

盧 漢(永衡) / 73-4

盧光舜 / 83-4, 118-20, 125

盧守中 / 141

盧作孚 / 7

盧致德 / 79

蕭 錚(青萍) / 13, 175

蕭自誠 / 53

蕭來華 / 53

錢 復 / 54

錢大鈞(慕尹) / 49-50, 64

閻錫山(伯川) / 69

霍寶樹 / 75

十七畫

戴 笠(雨農) / 54,76-7,96

戴戎光 / 71

戴季陶(傳賢) / 7,55,62,64,89,95,112,
173-4

鍾湖濱 / 137

十八畫

藍道夫醫生(Dr. Landoff) / 151

魏景蒙 / 181

十九畫

羅成中 / 14-6

羅斯福 / 103

羅澤閩 / 75-6

譚 祥 / 110,174

譚延闓 / 110

譚柱光 / 119

二十畫

嚴 俊 / 93

嚴家淦 / 125

寶 隆 / 29-30

二十一畫

顧維鈞(少川) / 111,15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目錄

書名	訪問者	紀錄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臺幣)	平裝本 (新臺幣)
1. 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能士 藍旭男	71. 3	250元	200元
2. 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林 泉	72. 1	200元	150元
3. 徐啓明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賈廷詩	陳存恭 賈廷詩	72. 5	200元	(缺書)
4. 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 上、下冊	馬天綱 陳三井 陳存恭	馬天綱 陳三井 陳存恭	73. 5	550元	500元
5. 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三井 陳存恭	73. 6	200元	150元
6. 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	李毓澍	陳存恭	74. 4	200元	150元
7. 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74. 5	250元	(缺書)
8. 王奉瑞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存恭	74. 6	250元	(缺書)
9. 于潤生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75. 4	250元	200元
10. 石 覺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張 力	張 力	75. 2	(缺書)	450元
11. 張式綸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官曼莉	75. 2	300元	250元
12. 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	張玉法 沈松喬	沈松喬	75. 6	(缺書)	250元
13. 劉景山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存恭	76. 2	170元	120元
14. 白 瑜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張朋園	馬天綱 陳三井	76. 4	250元	200元
15. 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陳三井 陳存恭 林 泉	陳三井 陳存恭	76. 6	(缺書)	200元
16. 袁同疇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馬天綱 陳三井	陳三井	77. 6	250元	200元
17. 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	黃嘉謨 陳存恭	陳存恭	77. 9	250元	200元
18. 盛 文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張俊宏	張俊宏	78. 6	210元	(缺書)

19. 於 達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張俊宏	張俊宏	78. 7	200元	150元
20. 鄧家彥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王聿均 謝文孫 謝文孫 劉鳳翰	謝文孫 劉鳳翰	79. 6	250元	200元
21. 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官曼莉	79. 6	300元	250元
22. 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張朋園 劉鳳翰	張朋園 劉鳳翰	79. 6	280元	230元
23. 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	王 萍	官曼莉	79. 6	250元	200元
24. 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	熊秉真 江東亮	鄭麗榕	79. 6	250元	(缺書)
25. 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林忠勝	林忠勝	79. 8	(缺書)	350元
26. 楊文達先生訪問紀錄	熊秉真	鄭麗榕	80. 3	250元	200元
27. 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	劉鳳翰 張 力	毛金陵	80. 5	270元	220元
28. 龍繩武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鄭麗榕	80. 5	250元	200元
29. 金開英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黃銘明	80. 5	(缺書)	220元
30. 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	張玉法 陳存恭	黃銘明	80. 6	450元	(缺書)
31. 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	張 力	張 力	80. 6	350元	300元
32. 丁廷楣先生訪問紀錄	劉鳳翰	劉海若	80.10	300元	250元
33.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訪問紀錄	黃俊傑	黃俊傑	81. 3	350元	300元
34. 張法乾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鄭麗榕	81. 2	250元	200元
35. 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沈雲龍	謝文孫 劉鳳翰	81. 3	300元	250元
36. 阮維周先生訪問紀錄	楊翠華	楊明哲 萬麗鵬	81. 4	300元	250元
37. 馬超俊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王聿均	劉鳳翰	81. 4	300元	250元
38. 潘宗武先生訪問紀錄	黃嘉謨 朱宏源	鄭麗榕 丁素湘	81.10	400元	350元
39. 黃 通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鄭麗榕	81. 6	450元	400元
40. 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	王 萍	洪慧麗 蔡說麗	81. 6	350元	300元
41. 吳修齊先生訪問紀錄	謝國興	蔡淑瑄 陳南之	81.12	400元	350元

42. 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	陳三井 許雪姬	楊明哲	81.12	300元	250元
43. 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	陳慈玉 莫寄屏	陳南之 蔡淑瑄 潘淑芬	81.12	350元	(缺書)
44. 尹國祥先生訪問紀錄	劉鳳翰	劉海若	82. 2	300元	250元
45. 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謝文孫	82. 2	300元	250元
46. 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賈廷詩 周道瞻 夏沛然 陳存恭	82. 5	500元	450元
47. 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羅久蓉	82. 5	300元	250元
48. 趙正楷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陳美惠	82.10	300元	
49. 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 訪問紀錄(1940-1962)	許雪姬	官曼莉 林世青 蔡說麗	82.10	400元	
50. 任以都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楊翠華 沈松僑	潘光哲	82.12	300元	
51. 劉真先生訪問紀錄	胡國台	郭瑋瑋	82.12	450元	400元
52. 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 職業婦女訪問紀錄	游鑑明	吳美慧 張茂霖 黃銘明 蔡說麗	83. 2	500元	
53. 羅友倫先生訪問紀錄	朱宏源 張瑞德	蔡說麗 潘光哲	83. 8	450元	400元
54. 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 訪問紀錄〈上〉〈中〉〈下〉	許雪姬 方惠芳	吳美慧 丘慧君 曾金蘭 林世青 蔡說麗	84. 2	1000元 (套)	
55. 藍 敏先生訪問紀錄	許雪姬	曾金蘭	84. 6	450元	
56. 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	陳三井 朱宏源 吳美慧	吳美慧	84. 9	450元	400元
57. 陳湄泉先生訪問紀錄	許雪姬 沈懷玉	曾金蘭	85. 1	300元	250元
58. 菲律賓華僑華人訪問紀錄	張存武 朱宏源 潘露莉	林淑慧	85. 5	400元	350元
59. 朱立民先生訪問紀錄	單德興 李有成 張 力	林世青	85. 4	300元	250元

60. 王 微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張俊宏	張俊宏	85. 6	300元	250元
61. 張知本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謝文孫 胡耀恆	85. 6	250元	200元
62. 汪崇屏先生訪問紀錄	王聿均	劉鳳翰	85. 6	250元	200元
63. 柯台山先生訪問紀錄	許雪姬	曾金蘭	86. 6	350元	300元
64. 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	王聿均	謝文孫	86. 6	350元	300元
65. 關德懋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張朋園	林能士	86. 6	250元	200元
66. 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	劉鳳翰	李郁青	86.10	300元	250元
67. 劉承漢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86.12	500元	
68. 池孟彬先生訪問紀錄	張 力 曾金蘭	張 力 曾金蘭	87. 4	300元	250元
69. 熊丸先生訪問紀錄	陳三井	李郁青	87. 5	300元	250元

口述歷史期刊目錄

第一期 定價200元

收錄吳大猷、趙恆惕、向構父、雷殷、李毓萬、蔡崇文等六位先生口述訪問。另有專文介紹新加坡、香港兩地口述歷史概況，及書評一篇。

第二期 定價250元

收錄何成濬、田培林、熊斌、陳肇英、聶其德、李鴻文、林長城、林衡道、艾世勛等九位先生口述訪問稿。另有〈牛津大學的香港研究與口述訪問計畫〉、英國國立有聲檔案館之介紹，與鍾少華撰之口述史工作經驗談，及書評兩篇。

第三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之一) 再版中

本期主要刊登台灣南部地區，包括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澎湖等地二二八事件期間相關人士訪談紀錄共三十二篇。

第四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之二) 定價400元

本期刊登台灣全省各地二二八事件相關人士訪談紀錄共四十三篇。

第五期(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專號之一) 定價450元

本期共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為日據台灣時期，以不同身分，在不同時間赴大陸的台灣人士訪問紀錄，共十六篇。第二部份為彭孟緝、李天民、侯吉定等三人對戰後台灣的回憶。

第六期(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專號之二) 定價200元

本期共分兩部份，第一部份延續第五期之專題，為台灣人赴大陸之訪問紀錄，共九篇。第二部份為日本群馬大學助教授所澤潤先生的訪問經驗談，由政治大學黃紹恆教授翻譯。

第七期(地方軍系與民國政局) 定價200元

收錄九篇訪問稿，包括劉景健、賀國光、胡宗鐸、龔浩、李文斌、張廷諤、余漢謀、董彥平、張喬齡等先生訪問紀錄。各篇內容均披露一些民國史上鮮為人知的事件成因和人物個性。

第八期 定價200元

收錄五篇訪問稿，包括張維翰、劉士毅、吳開先、吳思珩及徐康良先生之訪問紀錄。對了解清末到民初之軍政發展和抗戰期間上海的敵後工作、昆明學潮的成因及民國空軍之發展，均有其價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69)

熊丸先生訪問紀錄

訪 問／陳三井

紀 錄／李郁青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話：(02)27822916・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27898208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94 號 11 樓之 5

電話：(02)27054251

初 版／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定 價／精裝新台幣 300 元 平裝新台幣 25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精裝) ISBN 957-671-586-5

(平裝) ISBN 957-671-587-3

Oral History Series No. 69

The Reminiscences of Dr. Shong Wen

Interviewer: Chen San-ching

Recorder: Li Yu-chi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8

